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六、七、八分册(下)

(美)包华德 主编

沈自敏 译

赵 杰 校

瞿昭旗

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六、七、八分册(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16 · 10³/4 印张 · 156 千字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700 册

统一书号: 11018 · 1477 定价: 1.85 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李仪祉	(1)
李根源	(2)
李光前	(5)
李烈钧	(7)
李 铭	(11)
李石曾	(13)
李书华	(16)
李叔同	(18)
李大明	(22)
李德全	(23)
李宗仁	(25)
黎元洪	(31)
梁启超	(35)
梁鸿志	(41)
梁实秋	(42)
梁士诒	(44)
梁漱溟	(47)
梁思成	(50)
梁思永	(53)
廖仲恺	(55)
廖 平	(58)
林长民	(59)
林献堂	(63)
林可胜	(65)
林 森	(66)
林 纾	(70)
林文庆	(74)

李 仪 祉

字：协

李仪祉（C.1882—1938），中华民国水利事业的首创人。在德国受过训练的水利工程师，曾为陕西设计经办过八项灌溉系统的工程，主持过黄河淮河水利事宜，1931—1938年任中国水利学会主席。

李仪祉，陕西蒲城人，他父亲李同先（译音）（1860—1932），是一名教师，后任陕西省议会副议长。李仪祉1899年中秀才，奉父母之命结婚后，去泾阳崇实书院读书，1905年获得陕西省官费入北京京师大学堂，主修德语并学了一些科学课程，又担任高年级班长。1909年毕业后，由陕西西潼铁路局遣送去德国留学，他离国前，剪去了忠于清朝标志的发辫。他到德国后进了柏林大学工学院，学习两年回国，投身民国革命，不久他认为只要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和水土保持的专家，就可以大有利于国家。因此1913年又去德国，在但泽大学从著名水利学家学习了三年。

1916—1922年，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教水利工程及其他有关课程，这是一个由冀、鲁、苏、浙四省合办培养水利工程人员的学校。1922—1927年，李仪祉任陕西省水利局长，他一上任，就对陕西自公元前1136年到公元1912年自然灾害的发生做了一次详尽调查，发现陕西省每十年就遭到一次严重旱灾。因此他竭力为该省棉麦产地渭河北岸平原设计了现代化的灌溉系统。李仪祉于1928—1932年任陕西省建设委员，1934—1937年任渭北水利局总工程师，他设计修建八项灌溉系统，其中最重要的工程是沿着渭水的泾惠渠及渭惠渠和沿着洛河的洛惠渠。1935年，他又从事一项以根除陕西旱灾和饥荒为目的的十年水利规划。

在此期间，李仪祉还担任了外省的许多水利职务。1927年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任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1932—1935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立，他任第一任会长，一直到1938年春他去世时为止。

李仪祉的著作于1956年由台湾“中国水利学会”收集在台湾出版《李仪祉

全集》。他对水利问题的全面探讨，都在他的报告中说明，并包括在关于泾水的第一、二阶段的工程的概略中——《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处引泾第一期报告书》，《第二期报告书》。这些报告论述了水利工程的历史概况和方法，工程的准备工作，测量的安排，地貌、雨量，水流，及可供灌溉的水量。在这一文集中有关于黄河，长江的有价值的论文。

李仪祉作为一名水利工程师，他主要关心和经常考虑的是利用水利，通过适当供水管理以改良土壤的具体问题，他开始期望中国是一个可以不必用政治改良而用农业改良就可以得救的农业国家。他认为治水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在《重农救国策》一文中发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古代中国的伟大领导人对农业都是非常懂行的。从历史上看，凡是重视农业的，社会就安定繁荣，忽视农业社会就遭灾。为了要实现这项救国计划，他主张重视农业，把一国元首称为“农首”，各省长官称为“司农”。他还草拟了《农宪》，为这个新农业国家规定一个组织结构。选举、教育、军事、工业都要以农为基础；并由农业出发，国民有义务充当经常的农民（常农）或充当非经常的农民（隙农）。军队要改为农军。李仪祉认为这样的规划会给中国带来国家富强和社会安定。

李仪祉的水利工程改善了许多中国的农民的命运。1938年春，他安葬于泾阳时，有五千多农民赶来追悼，国民政府于3月28日发布一道特殊命令表扬他。他的成就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承认并尊敬。

李 根 源

字：印泉

雪生

号：黎贡山人

李根源（1879.6.6—1965.7.6），1913年参加过二次革命，1918年2月到1920年10月指挥过驻粤滇军的云南同盟会和国民党领导人。1921年11月到1923年6月，曾任北京政府农商部总长，以后退出政界。1928年后，他通过政学系的联系对1928年以后的政府政策起着影响。

李根源，云南腾街人，他父亲李大茂是一名千总。1884年李根源六岁时，他从祖母就学，被授以旧学，以后从有名的塾师多人授业，1899年二十一岁时与徐宝庄(译音)结婚。同年，生长子希泌。1904年李根源在昆明新式学校上学一年后，由省官费派去日本留学。他到东京后准备从军，进了振武学校。

1905年，李根源与孙中山相遇，同年后期同盟会成立，加入该会，他又发展其他学生参加这个革命组织，并以一名学生领袖而闻名。1906年选为留日滇籍学生会会长。1906年，他自振武学校毕业在军队中见习一年，后又进了士官学校第六期，他同期毕业同学中有孙传芳、阎锡山、唐继尧、赵恒惕、李烈钧等人。他在日本军队中进一步受训后，1909年回到云南，在讲武堂任监督，兼步兵科教官。

1910年，滇缅边境发生事故，李根源被派前去增强边防并与英国当局交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帮助策划云南起义，12月1日，新政府在云南成立，蔡锷任都督，李根源任军政部长，李日垓、唐继尧任付职。1912年国民党成立，李根源负责云南国民党党务，1912年10月提升为中将，1913年1月选入国会。虽然当时总统袁世凯为争取李根源的支持而授以高等顾问之职，李根源拒而未受。1913年4月8日，国会开会，李根源选为国民党国会俱乐部主任。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李根源去上海与孙中山、黄兴会商。

1913年6月，袁世凯免去江西、广东、安徽各都督职务，公开反对国民党。李烈钧与其他一些都督起而进行二次革命，当时李根源也被袁世凯免职。他和岑春煊去广州帮助该地的革命派。8月，龙济光率部进占广州，李、岑逃往澳门后又去香港，最后在东京避住。龙济光派特务前去追捕以期取得袁世凯的奖赏。李最后去日本避难。9月1日，南京失守，反袁活动停止。一大批国民党人逃到日本。

李根源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1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要求党员向他个人宣誓，黄兴及另一些国民党员加以拒绝，李根源、居正从中调停而无结果。1914年8月，李根源等人组成“欧事研究会”，这是政学系的前身，其成员有李烈钧、程潜、熊克武等人。1915年，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准备发动他的称帝计划，革命党人回国再发动一次反袁斗争，李根源于10月到上海参与其事。

1916年，他去广西在梁启超手下任职，组成以唐继尧为首的军务院，由岑春煊代理，梁启超为政务总裁，李根源为北上讨袁军的参谋和在上海的联络官。5月8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宣布在袁世凯去职以前将代行政府职务，恢复宪法，召开1913年成立的国会。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于1916年6月任总统，李根源去北京呼吁选岑春煊或陆荣廷为副总统，使南北双方利益在政府中都有代表人物，当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时，李根源等人乃组成政学系，以他本人及谷鍾秀，张耀曾，钮永建为秘书，李退出了国会。1917年2月20日任陕西省长，但由于他拒绝参加北方督军支持段祺瑞等人驱逐黎元洪的主张而为陕西督军陈树藩拘捕。10月被释，当时黎元洪下野去天津，冯国璋任总统。

1918年2月，李根源去广州任独立的驻粤滇军总司令，在孙中山军政府参谋长李烈钧手下任职，成功地击退了企图夺回广东的龙济光部队，此役结束后，任北江十五县南韶连镇守使。1920年初，李烈钧，唐继尧等人想控制驻粤滇军。当时，由广西军人控制的广州政府令李根源去海南岛，他在那里留驻了六个月。1920年10月，陈炯明击败桂军及其支援部队，驻粤滇军逼李根源辞去司令之职。10月24日，他和岑春煊，程潜去上海。12月29日，刺客谋刺李根源，误中访客。

李根源有一年多未在政界活动，1921年11月在汪大燮内阁中任农商部代总长，1923年1月，张绍曾继任内阁总理，李才得到正式任命。不久，李指派一个委员会制订农商法，拟出二十九项法律，包括商标保护法。他又帮助创办编译局，1923年张绍曾被逼辞职，内阁阁员于6月6日总辞职。6月11日黎元洪就任总统，派李根源在唐绍仪未就任前暂代内阁总理，不久直系首领曹錕等人起而驱逐黎元洪，李根源陪同黎元洪去天津、上海。

李根源退出政界住在苏州寓邸，1927年他母亲去世，李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大家都知道李根源通过他和政学系的联系，间接为国民政府效力。政学系由较年轻的如张群、张嘉璈、熊式辉、陈仪、吴铁城等人的领导，在党政事务中都有很大影响。这些人经常向李根源请教。

1949年，国共内战行将结束，李根源那时已七十一岁了，他由苏州迁住老

家云南昆明。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和政学系头目张群和李的侄儿李游，经李根源努力后释放。卢汉宣布效忠共产党后，李根源回到苏州。1954年，1958年，李根源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65年7月6日去世，年八十六岁。

李 光 前

李光前（1894—1967、6、2），福建籍的实业家，新加坡的百万富翁，他在马来亚、泰国、印尼都有产业，五十年代中他的李氏橡胶公司握有全世界天然橡胶贸易额的八分之一。

李光前，福建南安人，他父亲到新加坡经商，把儿子留在南安受旧式教育。1904年，他到新加坡与父亲一起，进了英国人和中国人办的学校，学习新式课程。1908年，他得了清政府的公费去南京，进了培养华侨学生的暨南学校，毕业后，又以官费生进了唐山工学院。但辛亥革命中断了他的学业而回新加坡。

他在新加坡担任了五年见习测量员的公职之后，决定从事橡胶业，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旺起来的企业，他进了1915年陈嘉庚创办的橡胶公司任职员，李光前的个性和才能为陈嘉庚赏识，就把大女儿嫁给了他，并让他当了陈嘉庚企业的总经理。

1927年，李光前创办了李氏橡胶公司，到1939年又在印尼、泰国设有公司，并促成了中国商业银行，和丰银行，华侨银行的合并，组成华侨银行合股公司，任董事长。由于1928年陈嘉庚的主要橡胶工厂被火焚毁，1929—1930年间世界经济萧条，马来亚橡胶业受到打击，陈嘉庚的经济地位衰落下来。1934年陈的企业进行清算，李光前购进其中一部份，因此在这些企业中仍有他们家族的实力。李还对陈嘉庚所爱护的厦门大学给与一大笔捐款。从1921年成立起，陈是这个学校唯一的经济支助人，后来又有李光前及陈嘉庚亲属陈乐西（译音）大量捐赠，厦门大学维持到1937年，由教育部负责该校经费。1939年李光前被选为新加坡华侨商业局主席任期两年，这说明陈嘉庚的经济地位由李光前继承了。

1941年李光前作为代表，去美国讨论维持东亚地区对美国的橡胶供应。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决定留在美国。他住在纽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课并作为经济事务的咨询专家。战争结束后，他回新加坡重建他的企业。虽然他在马来亚、印尼的工厂设备都在日军占领期间被毁，但到1948年，他设法将这些工厂全都恢复生产。

五十年代中期，李光前掌握了世界天然橡胶八分之一的贸易额。他的李氏橡胶公司有十五个工厂，李氏橡胶园有一万五千英亩土地，此外还有李氏菠萝公司，李氏锯木厂，加工棕榈油的李氏榨油厂，李氏饼干厂，李氏印刷公司，李氏物产公司。他在国外还拥有1932年在印尼成立的合东（译音）公司，1934年在泰国开业的暹百泰（译音）公司，1938年在纽约设立的南亚公司。此外，他在华侨银行、大东人寿保险公司、弗纽（译音）公司、西达（译音）公司、《海峡时报》公司都有控制权或占有大部份股金。总之，李光前已远远超过了作为中国实业家或东南亚投资者的身份了。

李光前虽力求避免引人注目，他对新加坡的公共事业和教育事业很热心。1939—1954年，担任新加坡游泳俱乐部会长，这个职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欧洲人消遣娱乐的场所都不接纳亚洲人，这个组织的建立和维持可以和排外的欧洲人的俱乐部比美，因此这是对新加坡华侨的一种荣誉。1931—1957年，他又担任了新加坡华侨中学董事会董事长，该校成为东南亚最好的一所现代化私立中学，虽然该校的一些激进活动使他不免受到攻击。李光前对教育事业直接的或通过李氏基金的捐献，数额达到数百万美元之巨。1958年，李光前任新加坡社会服务理事会主席，领导并协调社会服务、慈善、救济等工作，作为新加坡的公民，他支持新加坡政府对华裔居民的马来亚化。1961年，新加坡政府和马来亚联邦政府同意把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改名为新加坡大学，并为吉隆坡创办国立马来亚大学创造了条件。1962年1月25日李光前被任新加坡大学第一任校长，他于6月12日到职，1965年11月因病辞职，1967年6月2日死在新加坡。

李光前一生平易朴素，把事业发展看得比财富的追求为重，称为实干家当之无愧。

李烈钧

原名：李烈训

字：协和

号：侠贵

李烈钧(1882—1946年)，同盟会的军事人才，1911年革命时，统领驻九江、安庆、武昌各军。曾任江西都督，1913年发动国民党的所谓二次革命，1915—1916年，与蔡锷、唐继尧共同反对袁世凯，1917—1923年任孙逸仙的参谋长，以后大力支持蒋介石，1927年在南京任要职。

李烈钧的先辈是赣北地区的农民，太平天国时，他父亲和叔父加入了太平天国的军队。太平天国后，他家在南昌九江间贩运茶叶而致富，李烈钧幼年时生活因此相当优越。他在受了一些旧式教育后，决定从军，第一批进入1902年创立的江西武备学堂，1904年毕业后去日本深造，进了东京振武学校，同班同学有李根源、唐继尧等人。他在日本结识了一批中国革命党人，于1906年6月加入同盟会。他在振武学校受训完毕后，在日军炮兵见习一年，1907年进士官学校第六期，同期有后来军界首领如孙传芳，阎锡山，及老同学李根源，唐继尧等人。

1908年，他从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驻赣五十四团营长。1910年去昆明先后任该省军校教官和主任，那时李根源、唐继尧也在该校当教官。他和同盟会云南分会会长李根源竭力争取支持革命的人士。1911年，李烈钧被派参加清军在太湖的秋操，他在武昌起义前三天到了汉口，调查了汉口的形势后去北京与曾在日本留学的革命党人会见。

1911年10月底，李烈钧响应革命，由北京回九江，任马毓宝的参谋长，马毓宝不久辞职由李继任。李烈钧经吴铁城等人协助，与清军水师提督黄钟瑛谈判，接管了他的船舰。九江都督马毓宝任李为该地区海陆军司令。当时民军在安徽内争，吁请李烈钧维持秩序，他派出水师和陆军，到安庆，被举为安徽都督，但未就任，即往武昌援助被清军冯国璋所袭击的民军。

李烈钧在武昌，1913年3月任江西都督，他去南昌接任，恢复该省秩序，改编赣军。

1913年5月，国民党首领宋教仁被刺，他和广东、湖南、安徽督军胡汉民、谭延闿、柏文蔚起而公开谴责北京袁世凯政府。6月9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督军。不久，又免去胡汉民、柏文蔚之职，并派北洋军队南下进入长江流域，对李烈钧江西基地采取军事行动。段祺瑞的北洋第一军和冯国璋的北洋第二军两路向九江、南京进军。李烈钧去上海和孙逸仙商量，坚决主张对袁世凯宣战，孙逸仙同意后，李烈钧于七月初回江西动员部队。当时九江也为袁军所佔，李率军由九江开往湖口，宣布江西独立，自任讨袁军总司令，开始了二次革命。

广东、安徽、福建、湖南、南京、上海、重庆各地的国民党首领，先后随同李烈钧脱离袁世凯政府宣布独立，但是他们对李烈钧却无力援助或者并不乐于援助，因此李烈钧在湖口的部队和国民党在南京的军队遭到北洋军的猛烈攻击。李烈钧无力阻止数量既多装备又好的北洋第一军的进袭，1913年7月25日从湖口退到南昌，8月19日，江西讨袁军被击溃，南昌也落入袁军之手，李烈钧逃到湖南，躲在一只轮船上驶往上海，又从上海到了日本。1913年9月1日南京失守表明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胜利。

1914年初，李烈钧去法国，在巴黎郊区张继家里住了几个月。10月，他希望重新组织反袁活动回国，以云南省为目标，因为他的老朋友同学唐继尧当了云南省将军。李烈钧到印度支那，法国当局阻其上岸，他不得已到新加坡住了几个月。1915年夏，他得悉袁世凯筹备帝制，他派人到云南，与唐继尧取得默契准备在云南组成反袁势力，他又与前云南省都督反袁主力的蔡锷取得了联系。

1915年11月，李烈钧获准取道印度支那，12月17日到了昆明，两天后与蔡锷会见。他们两人与唐继尧的部属向袁世凯发出通牒，要他取消帝制，处置帝制的附从人员，袁未予答复，12月25日，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云南军界首领成立军务院，组织护国军，其中包括蔡锷的第一军，由云南进入四川，李烈钧的第二军经两广入江西，唐继尧的第三军（实际上由戴戡指挥）进入贵州。

1916年初，第一、第三军由昆明北上，李烈钧的第二军东向广西，广西都督陆荣廷准其通过，袁世凯亲信的广东将军龙济光的兄弟龙翼光率军奋力阻击，李烈钧的军队还是攻克了广东北部和中部的不少城镇，进而东向广东边境的南雄。

1916年3月底，贵州，广西宣布独立，陆荣廷和李烈钧会合进入广东，4月，迫使龙济光宣布独立，不久，又有各省响应。袁世凯宣布放弃帝制以谋平息反对势力，但对护国军毫无效果。四月中旬，李烈钧、蔡博、唐继尧要袁世凯辞去总统，由黎元洪继任并恢复1913年的国会。袁未予接受，5月8日，护国军在肇庆组成军务院，宣布在袁世凯辞职与黎元洪继任之间将代行政府职权。

1919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护国军结束，7月14日军务院解散。但李烈钧和龙济光仍在粤北争斗，李通龙退出广州，接着与龙济光有关的北洋军人联合向李进逼。李烈钧抵挡不住北洋军阀曹錕内阁总理段祺瑞的压力，解除驻粤滇军司令职到了上海。

1917年，孙逸仙在广州成立军政府，李烈钧任参谋长。1918年春，龙济光企图攻进广东，李兴师讨伐，五月击败龙济光军。不久，广州政府因驻粤桂系军阀之请改组，孙逸仙退居上海。李烈钧虽然仍任参谋长，但由于他与孙逸仙联合因而受到桂系的挟制。

1920年6月，国民党和桂系破裂，孙逸仙和李烈钧去云南与唐继尧会商，唐意在扩充势力于四川，授李烈钧二营军力，由四川进入贵州，驻留约有一年。1921年5月，孙逸仙在广州重建政府，任李烈钧为参谋长，令其率黔、湘军队进攻桂北，1921年夏攻桂林，陈炯明率军攻占广西中部南部地区。

1921年12月，孙逸仙到了桂林，率师进攻湖南，陈炯明在广州另有密谋，1922年春，孙逸仙由湖南回师，在粤北韶关设立大本营，准备向广西进军。5月底6月初，李烈钧任参谋长，率军进入湖南，北洋军阀的将军张敬尧辞职逃走，但因陈炯明攻广州推翻了广州政府，这次行动乃于6月中旬搁置。孙逸仙令李烈钧回广东驱逐陈炯明，7月在粤北被击溃，李逃往湖南，后又去上海。他在上海和孙逸仙会见后，又去香港与滇、桂军界首领代表商议征讨陈炯明。

1923年2月，陈炯明被滇桂联军击败，孙逸仙回到广州。李烈钧去潮州收编

陈炯明残部，7月去广州，在孙逸仙大本营任参谋长。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烈钧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孙逸仙因北京政府之请商议另立新政府，他派李烈钧去日本试探其是否支持。孙逸仙继到日本后，李烈钧陪同他回天津到了北京，1925年3月，孙逸仙在北京逝世。

李烈钧于1925年春离北京到张家口充当冯玉祥的顾问，1926年冯去库伦，李与冯玉祥部队驻于南口，然后撤往绥远，又去库伦会见冯玉祥，不久辞去职务到了香港。

李烈钧到香港时，蒋介石的北伐军遭到李烈钧的老友老同学孙传芳的坚强阻截，李与孙通讯并于12月到上海争取孙传芳投向国民党，但未成功。1927年1月，李烈钧到南京蒋介石行营。

1927年初，国民党分裂为两大派，李烈钧支持蒋介石的保守派，因此，左派国民党政府解除了李烈钧江西省主席的职务。李投向南京政府，成为五人政府常务委员中之一人。8月，蒋介石辞职，留在南京的常务委员李烈钧、蔡元培、主持党政事务，他召请党政军领袖开会，其中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人，组成军政院，李烈钧任主席，并力求国民党的重新团结。8月底，孙传芳、张宗昌联军突然进袭南京，他们的活动更加紧张，李烈钧在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中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一个筹备在南京成立新政府的机构，李成为新政府的五个常务委员之一。

1927年11月20日，南京驻军向庆祝李宗仁击败武汉军的群众开枪，中央特别委员会有从中唆使的嫌疑。12月，蒋介石回南京，特别委员会被责参予其事，其成员，包括李烈钧在内解除了职务。1928年初，李离南京去上海，1929年再次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李烈钧虽然与中央党部的首领人物很疏远，但他从不支援蒋介石的敌手。1930年的扩大会议，1931年广州的分裂政府中，虽然都有他的名字，但他从不参予其事。1931年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改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2年后，他居于国民政府顾问的地位，在党政界不再有实权，悠悠然在上海住到1937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是张学良案的审判官。

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后，李烈钧迁到昆明，又到重庆，在国府会议任职，

1946年初死在重庆，年六十五岁。

李 铭

字：馥荪

李铭（1887—1966.10.22），银行家，在中国首创银行投资业，促进中外经济合作。曾任不少银行、企业的董事，1922—1946年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

李铭是一名银商的儿子，生在绍兴，他初受旧式教育后，于1902年到杭州进了美国浸礼会办的蕙兰学堂。1905年去日本进了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主修银行业和商业。1910年回国后去浙江省实业银行当稽查，1911年任上海分行经理，他在筹设分支行时显示了他的才能。1917年协助成立上海银行同业公会，1920年任中国银行董事。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企业，难以拒绝省政当局的需求。李铭认为银行难以在这种情况下兴旺，他以私方股东与省政府协商另行成立两家银行替代浙江省营银行，1922年协定成立浙江地方银行，纯由省当局经营，又成立浙江实业银行，系私人经营，总行设在上海，自任经理。集中资金，现货流通，谨慎投资是他的三种主要经营方法。浙江实业银行只有两个分行，一在汉口，一在杭州，他认为在政治不稳定的地区设立分行易于受累不易积财，又认为国内无集中的银行制度，因此对信贷严加控制维持库存以备不时之需。在李铭的经营下，浙江实业银行首创经营外汇和国际贸易，设立了外汇部，聘请外国专家培养从业人员，使浙江实业银行成为五家主要的私人银行之一。

1926—1934年，1946—1949年李铭先后任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主席。1926年，因为中俄双方都已经经历了一次革命。他负责清理华俄道胜银行帐目。1927—1940年，李铭任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管政府债券与国内公债。这个委员会包括了银行家、财政家、政府官员，对发行公债维持政府收支平衡起很重要作用，担当着债券持有者的信托人，使公债能在上海自由流通。但预算赤字，公债发行超量，储存基金短缺，政府举债，李铭终于无法避免国债信用的

破产。

1928年11月，中国银行成立 李铭任董事长，张嘉璈任总经理，1935年中国银行成为国家银行，两人均辞职。1928年，李铭任交通银行董事，又协同创立中央银行，任监事会主席。他兼任各职到1949年，竭力加强和革新国内的银行制度。

1932年1月，中日在上海作战，不少银行受害。不少银行投资地产，因此缺少流动资金，同时地价降落。李铭发起成立上海市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任主任。加入这委员会的银行，将其地产、保险、动产投入，共有资金约一亿元的数目，然后以此发行债券，供在各行中充代现金，支票流通使用，其他各行则以票面额的四成接受。这一措施，避免了财政危机。1933年1月，李铭又在委员会下设立上海结帐局，1936年3月又设收税局。

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1932年又设立了国民实业银团，投资银行购进了杭州电厂，组成杭州电力公司，在钱塘口岸用近代装备创办电站，架设电缆枢纽，这一座新式高效能的电力系统，为杭州市民争取了光亮，提供了方便，李铭任杭州电力公司经理，一直到1949年。

他又努力促进中外经济合作，他认为要加快经济发展的效能，必须接受外资和国外技术，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有联合的投资，还要减少外国侵占所带来的困难，因此，在三十年代他参加中美合作购进上海公共租界的电力公司和电话公司。1929年，上海工部局决定出售电力公司，乃由美国及其他电力公司和纽约的一家公司联合购进，李铭以华方代表人参加。上海电力公司由霍柏金主其事，李铭为该公司顾问。购进这项企业需资金一亿两千万，改建和扩充设备另需资金。但因美国经济不景气，该公司向上海市市场标卖，李铭为中国的九家银行，一家英国银行，一家美国银行和一家美国经纪商筹发债券收购上海电力公司股票，李铭由此而在中国银行界运用了西方银行投资的各项办法。不久，上海电话公司售给万国电话公司，李铭又为那家美国经纪商筹划，对中外联合的企业作了贡献。1933年—1949年间，李铭任上海电话公司董事。1934年，以李铭为董事长、霍柏金为主任的沪西电力公司获得国民政府批准，向沪西地区供电。中日战争后，南京成立了汪精卫的敌伪政府，逼李铭合作，否则即予拘捕。

1941年3月，李铭突然逃出上海去美国，他留在美国直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1942年任上海电力公司驻美国董事，1944年是协和医院纽约托事局成员。李铭曾任在新罕布什的波尔顿园召开的联合国货币财经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和纽约莱伊召开的国际商务会议中国代表。他与陈光甫、莱曼公司、赖赛公司、洛氏股份公司组成中国实业公司，以发展战后中国的经济。李铭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但因国内发生内战，这个公司未能有所活动，1949年解散。

李铭于1946年回国，辞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但仍任董事长，1947年任文化教育促进基金会董事长、全国银行公会主席、并任中央银行进出口管理局长两个月。1947年国民政府通过一项银行法把银行按业务性质分类定名，因此，浙江实业银行于1948年改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1949年中国共产党势力越长江而过时，李铭去香港。

李铭在香港集中了少量资金设立了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自任董事长，他儿子李某任经理。李铭于1946年10月22日死在香港，年七十八岁。有儿子两人，女儿两人，孙十人，曾孙三人。他的一个女儿与施肇基的儿子结婚，在联合国当医生。

李铭一生，曾担任过三十多家银行，实业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公务事务的董事。他在国内创办银行从事投资的事业，促进中外的经济合作。

李 石 曾

原名：李煜瀛

李石曾（1881—），在法国创办勤工俭学运动，是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

李石曾原籍河北高阳，出生在北京。他父亲是同治朝军机处的军机大臣李鸿藻，早年就倾向于维新。他的塾师是齐如山的父亲齐老先生，是一个维新改良派，一位有名的学者。李鸿藻死后，清廷授其子袭承世荫。

1901年，李石曾遇见张人杰成为毕生好友，这两个青年有共同的兴趣，想一起去国外求学。1902年，孙宝琦任驻法公使，他们充任孙的随员。李石曾去

法国之前，六月间到上海遇见了吴稚晖、蔡元培，也都成了他毕生好友。以后，李、张、吴、蔡成了国民党的“四大元老”。

李石曾到巴黎后，进了巴斯德学院学生物。1905年遇见孙逸仙进了同盟会巴黎分会。1905年底，吴稚晖到巴黎与李石曾、张人杰组成“世界社”，这是一个革命的文化组织，并附有印刷厂。张出资创办《新世纪》，1907年7月创刊，1910年因亏空停刊，共刊出121期，李、吴都为无政府主义思想所吸引，为杂志写了不少文章。

1907年，李石曾和同仁创办了一个“远东生物学会”。他曾在巴斯德学院中研究大豆，1908年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他准备创办一所豆制品工厂，1909年回国采办原料征聘工人，以后在哥伦比亚设立了一家豆制品工厂。有三十名工人在工厂挣得工资以后在法国上学。他们由齐如山率领，齐如山的哥哥齐寿山是该豆制品厂的经理。李石曾研究大豆，发表了《大豆的栽培及其营养价值与在工农业上的用途》一文。

1911年10月，革命的消息传到法国，李石曾及张继等人立刻回国，他到北京后，被选为同盟会北京分会副会长，汪精卫为正会长。1912年1月，他与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信奉人组成“进德会”，其基本信条认为社会的改良必须随同政治的改革，会员要信守：不食肉，不饮酒，不嫖妓，不纳妾，不赌博，不做官。

1912年4月，李石曾与吴稚晖、张人杰、汪精卫、张继、齐如山等人创立“留法俭学会”，拟定勤工俭学章程，每年以六百元供应一个留法中国学生。齐如山在北京负责预备学校，教法文，六个月为一期。1913年1月，有三十名中国学生到法国，李石曾安排他们进了巴黎南郊的蒙旦学院。勤工俭学计划可以供一百名学生到法国留学。

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不少国民党首领逃离中国。吴稚晖到美国，蔡元培全家到德国，汪精卫、曾仲鸣和李石曾全家到了法国。汪精卫和李石曾同住在蒙旦，并为勤工俭学学生讲课。1915年春，李、吴、蔡、汪在土伦相会，讨论筹备出版物。同年底，法中教学学会在巴黎成立，蔡元培任中方主席。正值欧洲缺少劳工，因之创办勤工俭学会。这个计划与早期俭学会有所不同，是以

学生本人在工厂或企业中劳动所得维持上学，参予此运动的前后有二千多学生，大多来自湖南、四川。

1916年，蔡元培当了北京大学校长，请李石曾当生物教授。李石曾的豆制品工厂因值战争时期而停办，1917年回国。他竭力争取法国退回庚款用于文化教育事业。经长期谈判，1925年签订中法协定。1920年，李石曾在北京创办了中法大学，在里昂创办了法中学院，李任中法大学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法中学院位于里昂的一所堡垒，系法国政府捐赠。因此，在法国的中国学生首先希望能进入该学院。当时，李石曾等得到广州政府的经济支助，选取了一百名两广籍学生进第一期，汪精卫陪送他们到了里昂，并任该学院院长。1921年9月，另一批由共产党学生组成的勤工俭学生一百人，也到了里昂要求入校。他们因未被允于进入第一期而表示反对，结果，有103名学生遭到逮捕驱逐，其中有陈毅、蔡和森、李立三。该学院为里昂大学输送学生，又负责中法大学海外分校的任务。该学院一直维持到1949年，实际上它不过是中国留法学生的一所宿舍而已。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石曾和吴稚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张人杰、蔡元培亦成这个重要的党的机构里的委员。

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军入北京，控制了北京政府，决定驱逐溥仪出宫，李石曾以民间代表11月5日参予其事，任故宫财产清理保管委员会主席，1926年成立北京故宫博物院，李任主任，易培基任管理。1925年，李石曾获得勋章，以表彰他对中法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当时，孙逸仙到北京与段祺瑞等人商讨，任李石曾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25年3月12日孙逸仙逝世，遗体暂放在中法大学的校址碧云寺中。

1926年3月8日，大沽口事件和3月18日北京示威游行，死伤四十多人。段祺瑞下令逮捕徐谦、梁启超、顾孟馥、易培基、李石曾等人，说他们指使游行并为共产党进行宣传，李石曾躲在一家法国医院，随后逃到广州。

1927年国民党分裂，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张人杰竭尽全力支持蒋介石保守派，他们和其他中央监察委员四月间在上海开会，通过决议要求将共产党清除出国民党，支持四月八日在南京成立与武汉政府对立的蒋介石政府。

李石曾又与吴稚晖、蔡元培一起筹创大学院制替代教育部，蔡元培为主席：这是模仿法国的制度，在全国划分大学区。1928年成立了三个大学区，北京区主任是李石曾，副主任是李书华。但这种制度对中国不适用，1929年蒋梦麟当教育部长时把它取消了。李石曾又于1928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1929年又创办了北平研究院，同年十月，成立故宫博物院，李石曾任院长，任职到1932年。

1932年，李石曾去日内瓦，组织国联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中国代表团，他在日内瓦创办了一所中外图书馆。李石曾回国后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他在南京参加了党政活动。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李石曾在欧洲，来往于巴黎日内瓦之间。其间曾回国，1941年又离开了为战争所困的祖国去纽约。他和一个美国人海里南合作，创办了《自由世界》中文版。他一直留在纽约，战争时期曾多次回重庆。

1945年，李石曾回国，与杨家骆合编四库学典，第一卷在1946年出版。1948年9月，他去北平举行北平研究院成立十九周年纪念会。当中国共产党势力逼近故都时，他离国去日内瓦。1950年瑞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携带中外图书馆的珍藏迁往乌拉圭住在蒙得维达城。1954年后，台湾是他的第二个寓邸，任蒋介石的政策顾问，中央评议会委员，中央评议会替代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务。

李 书 华

字：润章

李书华（1890—），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1929—1948年任北平研究院副院长。

李书华出身富农家庭，生在河北昌黎，有一个弟弟。自1896年起从塾师受旧式教育。1905年他应科举名列前茅，可望晋身仕途，但这一年科举取消。1907年，他进昌黎高小读书，1908年去保定进直隶高等农校。1911年革命后，该校改名为直隶高等农业技术学校，1912年毕业时名列前茅，获得省官费每年五

百元供去日本留学。当时，李石曾等人在法国举办勤工俭学，为李书华取得名额每年捐给一百元。

李书华在北京学了六个月法语，与同伴一起去法国，1913年1月到巴黎，又到蒙他系吉，经李石曾设法进了蒙他系吉学院。二次革命失败后，不少反袁的国民党首领逃走，汪精卫逃到蒙他系吉，每星期日上午为中国学生讲课。

1915年秋，李书华进了土伦大学农业研究所，1918年毕业。当时，他对李波曼的磁电学理论和居里的放射学感到兴趣，1919年进了巴黎大学，1920年获物理学硕士学位，又继续在让·佩里实验室撰写学位论文，1922年6月，通过论文答辩，成为第一个获得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他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1922年8月，李书华回到北京，拜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该校执教，任职前曾去故乡探望双亲。他除在北京大学教物理课外，为该大学开设了一些理科课程。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试行“大学院”制，李书华在李石曾手下任北平区副主任，后因大学制施行不便，于1929年夏停止。1929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北平研究院，李书华任副院长，一直到1948年。

1930年，蒋介石任李书华为教育部政务次长，立法委员。李书华和总务次长陈布雷掌教育部实权，因为代部长蒋介石实际上无力兼顾。1931年初，李书华任中英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中法文化基金委员会，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委员，二月，任教育部长，不久因九一八事件后学生示威游行而辞职。

李书华去北方致力于北平研究院，院长虽系李石曾，但实际上由李书华负责，北平研究院成立了物理、化学、生物、动物、植物、地质、历史、考古等研究所。1936年日本威胁加重，北平研究院的设备迁往山西，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李石曾及其他在北平的教育界人士支持抗日统一战线。日军占领北平时，李书华躲在一家法国医院里，他的妻儿逃往天津，10月间到了上海。李书华在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筹备把北平研究院迁往昆明，又在香港设办事处。物理、化学、动物、历史各研究所不久迁到昆明。1935年在南京设立的地质研究所，先迁到长沙，以后迁到四川北碚。

1945年11月，李书华去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会议。回国后又游历欧美，拜访了爱因斯坦。此后，他在1946年于巴黎、1947年于墨西哥市先后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1947年他又访问了美国和日本的主要研究机构。

1948年3月28日，李书华出席了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官员，会后，在台湾考查研究机构。9月9日，北平研究院迁回北平后，召开十九周年纪念会。12月中旬，李书华仍在北平，当时北平已为中国共产党军队包围。12月20日，国民政府派飞机前来接运著名学者，他们大多数人都愿意留在北平，但梅贻琦，袁同礼，李书华等少数人趁飞机离开了北平。

1949年7月，李书华去巴黎，接受勋章。他出席第四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后，接受了吉拉德的邀请利用其研究设备研究巨分子，吉拉德曾在巴黎大学物理、化学、生物研究所所长佩林指导下进行研究。1951—1952年，李书华在汉堡大学讲授中国语言文学课程。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参加第七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后于11月到纽约，他应梅贻琦之请，利用哥伦比亚大学实验设备，及该大学远东图书馆资料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1953年写了关于指南针的论文获得好评，继而又写了《指南车与指南针》一文，用中英文在台北发表，他还写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文章，《中国印刷术起源》一文1962年在香港发表。

李叔同

法名：弘一

李叔同（1880—1942.9.4），中国近代音乐，近代戏曲的创导人，后出家为僧，法名弘一。

李叔同，出生在天津，是1847年科进士李筱楼侍妾所生之子。他父亲酷爱理学，王阳明学说，又信奉禅宗。他父亲去世时，李叔同年仅四岁，由年仅二十多岁的母亲抚养。

李叔同幼年时的教养是异乎寻常的，他在堂兄辈的鼓励下读了些儒家典籍而且进步很快，又学绘画篆刻。他又能背诵摩诃罗婆多经和家中建醮祭佛时听到僧侣所念的经文，他似乎生来就倾向于此。据他的朋友们的记述，说他冥思这世界的暂短、空虚、和不幸，常常情怀凄凉。他在堂兄辈和家中女眷的爱抚下，熟练了主要的佛家经典和对佛经的一些理解，最后终于皈依佛教。

他身出名门，出生时就与余氏订婚，于1897年与她结婚，1900年，1904年前后已有二个儿子。关于他的妻子和儿子的情况不详，此后，李叔同即使并未遗弃他的妻儿，他也认为他的婚姻不过是尽孝道而已。1897年，他热心维新，那时清政府内也出现了维新派，他参予康梁的维新到何等程度还无法说明，但无论如何他是自认为维新派的一员，他刻有“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图章。因此，1898年9月21日到22日慈禧取消百日维新，杀害六君子时，李叔同不得不由天津逃到上海，此行只有他母亲一人陪同。

李叔同为谨慎起见，住在上海法租界，此时，结识了一些上海文人。他的文章三次在沪学会获奖，得到创办人徐蔚园的赏识，请他和他母亲迁居到沪南别庄，李叔同自称这是他隐居生活的开始，别庄古樾小溪，地处郊区僻静之地，他和他母亲及数人舒适度日。绘画作诗过了六年，以后又组成了“上海书画公会”，由李叔同主编刊印了几年《书画报》，印制十分精致，又刊印了用新技巧所作的国画。李叔同本人的诗画书印于1900年出版的《李庐印谱》，其中有他收藏的珍贵古印和他本人的篆刻，不久又出版了他的诗集《李庐诗钟》。1902年初，李叔同进了南洋大学，他和邵子力是蔡元培的得意门生。

李叔同住在自己的别庄期间，结识了当时的一些著名歌女，与她们诗书往还，这些诗书直到他出家后还被饰起来精装保存。1901年，李叔同与以三寸金莲歌喉动人而闻名的妓女杨翠喜来往。杨翠喜后来成了奕劻的儿子载振的小老婆，他们的关系记述在传奇式的《杨翠喜二三事》之中。

1905年，李叔同的母亲突然去世，这给他很大刺激，他在天津亲自为之殓葬后，去日本学音乐美术，另一个去日本的原因是因为维新派旧友自1898逃往日本后还有一些在那里。

1905年，李叔同到日本，进了上野美术学校习油画，后来进音乐学校，专修钢琴。他在绘画音乐方法的学习进步很快，熟练了西洋技巧。他的木炭画《处女画》，其技巧情态为当时所重视，后来收集在丰子恺所编的集中。李叔同以自己年龄和时间的关系，不可能再成为第一流钢琴家，所以转而学音乐理论和作曲，他的几首歌曲收集在《中华民国五十曲》中。1906年，李叔同主编介绍西洋音乐的半年刊《音乐小杂志》。李叔同在日本几年中最闻名的活动并非绘画和音乐，而是戏剧。他在南洋大学时曾客串演出京剧，他在日本时见到日本舞台上演出的西方自然主义的戏剧感到很有兴趣，因此与欧阳予倩等人组成“春柳剧社”用中文演出西方戏剧。此后几年中，接连演出《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悲惨世界》等剧本，李叔同扮演女角，他扮演的茶花女，在国内和日本获得了好评。

1910年，李叔同和与他同居了几个月的日本妇女回国，把她安置在上海，而把自己原来的妻儿安置在天津，自己则在直隶模范公学教绘画。1912年，李叔同的私人财产及股票因革命军起而大受损失，他迁往上海，在城东女校教音乐。这时，革命的热潮促进一些充满新活力的文学团体的出现，其中有柳亚子创办的“南社”，1912年4月，李叔同参加了首次聚会，成为其中著名人物。

李叔同在上海当记者与编辑。1912年陈其美创办《太平洋报》，朱少屏任主编，叶楚伦任社论主笔，邀请李叔同任文学主编并副刊《太平洋报》的主编。这份画报，在国内系属首创，由于李叔同想像丰富，内容隽永而获得很大成功，他主编的文学部份，首次刊出了一些优秀的年青作家如苏曼殊的作品。李叔同又另组文学团体“文美会”。出版《唯美杂志》，《太平洋报》和“文美会”破产，李叔同离上海去杭州。

1913年初，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教美术音乐，该校不久改名为浙江第一师范。1915年任南京高等师范美术教师，与他同事的有夏丏尊、马叙伦等人，他的学生有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曹聚仁等人。他教书口齿清楚，态度认真，为人严肃正直。他在杭州时沉默寡言、生活俭朴。他善于把美术音乐的感情传授给学生，他对丰子恺的赏识和鼓励，使丰子恺终于把艺术当作他的毕生

事业。

李叔同自日本回国后，生活在疑虑之中，他后来对朋友说，他从未体会过真正的幸福，每当感到万物瞬息他就十分悲伤。1884年他父亲去世、1898年政治上一场幻梦，1905年他母亲去世，他的毫无感情的婚姻，复杂的家庭遭遇，1912年的破产，使他重新探索生活及其自处之道。起先，他倾心于他父亲所学习的理学，后又习信道家，穿道袍守道规。1917年1月他去大慈山断食十七日，开始时减食，继之以水代食，最后逐渐恢复，断食使他身心愉快，他乃取名为“婴”以志纪念，并决心穷其究竟。当时，他虽仍致力于道教，但也涉猎佛经，开始有出家为僧的念头。有一次，他的朋友马一浮要他为彭某找一处静修之所，李叔同介绍他去大慈山，彭某是净土宗，当李叔同去大慈山时，彭某准备出家当和尚，这使李叔同很受影响，从此皈依佛教，拜了悟和尚为师，念经茹素。1918年4月15日，他把书籍印章衣物书画赠送给朋友学生，出家当了和尚，取法名为“弘一”，当时他的妻儿和日本侍妾去大慈山劝阻但未成功。他的妻儿乃去天津，侍妾回日本，1918年9月他剃发皈依佛。

弘一由他自身的盛行虔修而悟佛道，他的断食虔修为不少居士所称誉。他善于作短偈，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贡献并不在他对净土宗增订演释，而在于他的僧徒的改革。他认为佛教之所以衰落是由于僧徒的败坏，因此需要改进。这与仰光的虔信阿弥陀佛潜修顿悟大不相同。太虚主张在佛教中渗杂些西方的社会主义，相对主义的观点，使僧徒回到现世，因此被称为“革命和尚”，弘一则主张僧徒的道德修养。

弘一自设戒律，律已甚严，他研究佛教的演变，尤注意唐代一时盛行而后衰落的律宗，律宗式条，曾由高僧道宣编集，对僧尼各有250条和348条戒律，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弘一认为佛法的宏大，需要从重振僧徒开始，而重振之道已在律宗各各例中规定。以后，弘一就专精于律宗，1924年集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为全国万千僧侣所遵行。弘一并为此撰文，作《南山道宣律祖略谱》，《南山年谱》，因此有人称弘一为“重兴南山律祖第十一代祖师”。1929年，他和学生丰子恺编佛教书画《护生画集》，第一卷弘一撰书，丰子恺作画。第二、三卷先后于1940年，1950年出版。

1937年中日战后，弘一的居地为日军占领，他仍继续讲经，旅游，著述，他生活极其艰苦，只带一席一袍随处游历，有一次夏丐尊曾为他的素食中多加了一点盐，他说：“算了吧，盐总是盐味，这已经足够了”。作为一个僧侣，是为了“救世”，他坚不迁往安全地区，以示对日军侵略的抗议，他书写“念佛不忘救国”的联屏。战时的匮乏和他经常断食，使他的身体很衰弱，1942年更为严重，9月，他将所存各件移赠夏丐尊、刘质平，9月4日，死在福建泉州。

他卜葬后，他的朋友学生为纪念他举行了各种活动。1952年，他逝世十周年，在泉州立了石碑柱，一年后由丰子恺、叶圣陶在杭州立石碑柱，在近代中国音乐史上，他是介绍西洋音乐的首创人。1958年他的歌曲由丰子恺编《李叔同歌曲集》在北京出版。

李大明

原名：李帝明

李大明（1904—1961.3.18），他在中国和美国曾任报纸发行人和编辑，宪政党首领，他长期和伍宪子在旧金山编《中华世界》报。

李大明在夏威夷考爱岛出生后，全家迁到檀香山，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他父亲是一个盲人。1906年李大明六岁，全家迁回广东石岐老家两年后，他的长兄在那里去世。他在家乡初受教育后，于1918年去檀香山，出版中文杂志《晨曦》，那时，他虽只有十五岁，但是杂志上的大多数文章是他写的。1919年回国，在广州，香港读了两年书。

1921年，他在香港协同创办了《大同日报》，与徐勤，伍宪子结识。伍宪子和康有为长期合作，因此李大明立即成了康有为的支持者。1926年前，他一直为《大同日报》写文章，成了一个知名的政治评论家，一时曾与共产党的首创人陈独秀进行过辩驳。

1926年，李大明应徐勤之邀，去檀香山，美国、欧洲，从事宪政党活动，从事反对国民党的宣传。1927年3月回香港，着手为康有为起草宪政党纲领，3月11日，康有为死在青岛，这一计划中止了，但仍为宪政党工作。1928年去

旧金山，协助伍宪子出版《中华世界》，并任该地孔教会分会会长。

1932年，李大明回国在香港成立东方出版社，1934年，该出版社破产，他去上海，任孙记百货公司顾问。1936年，他去华北，1937年在上海出版了一本颇为闻名的《北游印象》。1938年去夏威夷任宪政党机关报《新中华日报》编辑，又在檀香山懋隆学校教历史、哲学。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美国当局禁止出版中、日文报刊，经李大明抗议后，禁令取消。

1944年，李大明应宪政党之请，去旧金山继伍宪子编辑《中华世界》报。当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时，他遇见了张嘉森 商讨合并宪政党和国家社会党。11月，宪政党成员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会，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宪政党，伍宪子为主席，李大明为副主席兼美国海外分会主席，这个新改名的政党宣称渊源于保皇党的思想。

1946年，李大明回国，8月，在上海开会，合并民主宪政党和国家社会党为民主社会党，张嘉森任主席，伍宪子任副主席。当时，国民政府为了要削弱共产党扩大自己的势力把一些政府职位让给小党派，任李大明为不管部长，李未接受，他和原宪政党的一些人对民主社会党不感兴趣而退出，于1947年回檀香山，不久又回南京任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又去旧金山重新主持《中华世界报》，这是当时在美国销售最大的一份中文报纸，又首创出刊英文版，1950年准备出纽约版而未能成功。

五十年代中，伍宪子退出政界，李大明成了民主宪政党的主要发言人，他继续反对共产党，批评台湾的国民党，他死于1961年3月18日，遗有1946年在旧金山结婚的妻子郭淑珍，两个儿子保罗、约翰。

李 德 全

李德全（1896.7.1—），冯玉祥夫人，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妇女界的重要人物。1949年10月到1964年12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长。

李德全生在河北的一个义和团后残存的基督教家庭，他父亲是一个富裕农民后来成了基督教士，李德全出生三个月后就受洗入教。她有一个兄弟，两个

妹妹，1912年到北京进美国公理会办的贝满女校，毕业后，获贝满奖金进汇文女校。

她从汇文毕业后，到贝满女校教生物，并兼任美国传道会灯市口教堂的妇女工作，和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秘书，此后工作日有增加。1923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秘书普林斯顿全美足球会干事盖莱把她介绍给基督将军冯玉祥，他们于1924年2月19日结婚。

为了报谢俄国教官及其军事援助，冯玉祥于1925年同意国民党在国民军中进行政治工作，李德全代为拟定部队教育计划，着重基督教义而少注意政治训练。1926年，李德全陪同冯玉祥去库伦，莫斯科。他们回国时，于1926年9月16日发表长篇声明，表示效忠国民党。

1930年，所谓反蒋的扩大会议失败后，冯玉祥退隐，1933年他和李德全住在张家口，1936年前住山东泰山，后去南京，任水利部长，最高国防委员，李德全则在妇女组织中居首领人物，在全国妇女救济会中极为活跃，后任该会和基督教妇女节约会主席，重庆中苏协会妇女部主任。战后，她协同组成中国文化福利促进会。

1946年，李德全任政治协商会议军事部委员，后又选入国民大会，但在国大开会前，国民政府派冯玉祥率代表团去美国考察水利灌溉，9月底，他们两人离开上海。李德全于10月在纽约出席国际妇女大会，她与冯玉祥，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住在加里福尼亚州。在完成水利考察之前，他完成了美国政府为他安排的巡回游览的三分之一。1947年，他发表演讲抨击蒋介石及国民政府。12月，国民政府召他回国，他公开拒绝回国，他说回到国民党统治地区将丧失生命。1948年1月，冯玉祥因反对国民党而被开除出国民党。不久，他成了在香港由李济深发起组成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

1948年7月，李德全和冯玉祥趁俄国船“胜利”号去奥德赛。9月1日，该船在里海航行时船仓起火，冯玉祥身死。该船于奥德赛靠岸后，李德全由苏联回东北，1949年2月到已为共产党占领的北平，任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又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保卫和平大会。回国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9月，代表妇联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任全国委员。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任卫生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理事。1950年任人民救济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主席。1951年，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主席。在五十年代中，她代表上述机构，出席国际红十字会及其他卫生机构，并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她又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巴基斯坦、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地出席国际妇女大会。她又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1953年3月斯大林的丧礼。

1953年，1959年，她被选为政协常委，1954年以河北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年，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1956年任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科学规划委员，先进工作代表会议主席团成员，1958年任中朝友好协会会长，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5月，被选为古巴红十字会名誉会长。1964年12月免去卫生部部长之职。她为公共卫生事业尽了很大力量，作出了成绩。她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21名副主席之一。

李宗仁

字：德邻

李宗仁（1890—），白崇禧、黄绍竑等人，是桂系的首领，1948年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1948年代理总统，1949年12月退休去美国，1965年7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居住。

李宗仁生在广西桂林，他初受教育后，进了广西初级陆军学堂，白崇禧、黄绍竑、夏威、黄旭初、李品仙、叶琪是该校同学。此时，他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武昌起义，李宗仁辍学回家。1913年各式军校重新开学，他在桂林进了广西短期陆军学堂。1913年毕业后，在家里住了六个月，以后在桂林地区当了几个学校的体育教员。

1916年，他在林虎手下当排长，隶属陆荣廷的部队。他参加了护国、护法之役，在广东湖南两次受伤，因作战英勇于1918年升为营长。1920年陆荣廷退出广东回广西，李任后卫。升为副团长。

1921年，粤军侵入广西击败陆荣廷的军队，林虎所率一团投向粤军。李宗仁率部一千多人，退入玉林山区，在博罗一带自立成军，后来，他又投向陈炯明的粤军。1922年，陈炯明反孙逸仙，粤军受命回广州，李宗仁脱离陈炯明，以玉林为基点自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司令，不久又脱离自治军，对粤桂之争采取中立，黄绍竑和他在玉林会合，由陆荣廷任命，编成第五独立旅，黄绍竑任第三团团长。1923年，黄绍竑由孙逸仙任命为广西讨逆军司令，李宗仁编成广西省防军第五独立旅，黄绍竑为参谋长。

1924年初，广西政争的主角是陆荣廷和沈鸿英。李宗仁和白崇禧、黄绍竑会同一起与沈鸿英联合驱逐陆荣廷而统一广西，6月，攻克南宁，两月后又建立驻桂讨逆军联合司令部，李宗仁任司令、黄绍竑为副司令、白崇禧为参谋长。7月中旬，李逼令陆荣廷辞职解散军队，沈鸿英和他们一起行动，8月24日攻克桂林，9月底，战争结束。

1924年11月，孙逸仙任刘震寰为广西省长，未就。11月11日，李宗仁自任广西复兴委员会主任，黄绍竑为副主任，反对刘震寰，不久，胡汉民、许崇智请李宗仁去广州商讨两广统一事宜，李派黄为代表前去，商谈结果，任李为广西绥靖主任兼桂军第一军军长，黄绍竑为副主任。12月1日，李加入国民党并就职。

1925年初，沈鸿英突然沿南江一线进袭李宗仁，李以力量悬殊，求援于在广东控制第一师的李济深，李济深派陈济棠率一旅军队入广西，把沈鸿英驱逐到湖南。不久，云南督军唐继尧准备派军队经广西去广州，意在继承已于3月12日逝世的孙逸仙。唐军入广西占南宁，沈鸿英趁机由范石生之助进入桂北。唐军失败，残部退入广西。1925年底，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控制了整个广西。

1926年3月，粤桂在广州谈判数日，双方同意，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白崇禧任参谋长，黄绍竑任党代表。3月24日，李就职，他在一月间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委候补委员。李宗仁等人又鼓动湘南第四师长唐生智反对赵恒惕而与国民革命军联合。3月，唐逼赵下台，但是吴佩孚在岳州打败了唐生智，4月，唐由长沙退到衡阳，李宗仁支持唐生智提早进

行北伐，但俄国顾问鲍罗庭不赞成。五月，国民革命军一部份进入湖南，唐生智在衡阳得到了支持，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

1926年7月1日，蒋介石下动员令开始北伐。7月17日，李宗仁率夏威部进入长沙，8月11日蒋介石到长沙与唐生智李宗仁商谈，决定在与孙传芳交手前先打吴佩孚。8月15日下令进攻武汉，李宗仁率第七军，第四军担任右翼作战，李所率部队与刘峙第二师攻克汉阳，汉口。孙传芳通牒北伐军撤回广东，刘峙所部进入江西前线，第七军亦随之前往。10月10日武昌攻克后，第四军亦开往江西，赣境战争历时七十天，李宗仁的部队起了重要作用，11月7日攻克南昌。

1927年因国民党内部分裂为国民党左翼的武汉政府和支持蒋介石的南昌政府，北伐一度中断。汪精卫从欧洲回国后，李宗仁于4月6日出席了上海的会议，决定在南京召开会议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分歧。汪精卫离开上海后，又进行了另一次会议，与会者决定把共产党员及左翼人士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清除。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李、白的支持，对蒋介石采取上述两项活动起重作用。6月2日，李宗仁任司令的第三路军攻克徐州。6月19日到22日又参加了蒋冯会议，双方取得协作。8月，蒋介石为国民党的统一而辞职去日本。胡汉民离南京到上海，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留在南京掌握大权，又打败了越长江进龙潭企图攻南京的孙传芳。

1927年9月15日，南京的首领和武汉的一部份首领及西山会议派的代表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政府职权，在武汉的唐生智反对统一计划。10月底，以李宗仁为司令，白崇禧为前线总指挥兴师讨伐唐生智，唐撤离武汉，李率第七军及胡宗铎的第十九军于11月中旬攻占武汉。李宗仁任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胡担任武汉警备司令。这时，李宗仁控制了两湖，他已经把势力从广西伸展到长江流域了，同时也在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任职。

1927年12月广州公社运动中，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的地位削弱了。李宗仁等人请蒋介石复职，1928年1月，蒋又重新上台。2月，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再行北伐，6月最后进入北京，第四集团军参予其事。蒋、李、冯、阎于7月商议编遣军队，最后延搁未实行。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李宗仁任国府委员，1929年1月，李出席编遣委员会，但白崇禧并未出席，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桂系势力已从广西进入到北至河北，东至江苏的广大地区。编遣令毫无结果。

1929年2月19日，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下令解除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位，军队从武汉开进湖南，鲁涤平率部撤到江西，武汉分会任何键继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3月13日，中央政治会议下令两日内解除各地分会。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同时，华北地区反对白崇禧，白所率第四集团军落入唐生智之手。3月21日，蒋介石发表声明，谴责军人跋扈及武汉分会的所作所为，同一天，李济深因调解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争执而被拘留，3月26日，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武汉，宣称李、白背叛政府，撤消其一切职务，3月27日，开除李、白国民党籍。

李宗仁到香港和白崇禧，黄绍竑会合，1929年11月，三人回广西，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李任司令，黄任副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任前敌总指挥，李同时任广西军事委员。

1930年1月，桂军和张发奎第四军进攻广东，一个月內被击败退回广西。他们乃与北方联军合作进军湖南夺取武汉。5月间，初步获胜，但因出兵解救衡阳的黄绍竑后路为粤军所断而失败。桂军在洪桥全军溃败，孤军退回广西结集。此后，黄绍竑因反对继续内战而与桂系破裂。

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被捕，粤桂双方又重新联合。5月，政界首领如汪精卫，陈友仁、陈济棠反对蒋介石，在广州组成政府。5月中旬，李宗仁去广州讨论成立两广军事联盟，协定后，9月初进军湘南。九一八事变发生，国民政府呼吁全国统一应付日军侵略。广州政府坚持在解散前必须释放李济深、胡汉民，蒋介石必须辞职，两个条件获得同意。不久蒋介石重又上台，协议尚待执行。1932年3月，陈济棠、李宗仁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黄旭初继黄绍竑为广西省主席，广西仍维持其实际上的独立地位。4月，李宗仁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

1932年到1937年7月，李、白以“三自主义”建设广西，以“三卫主义”建军。广西受战乱较少乃能发展其工业和教育事业。

1936年胡汉民死后，国民政府打算结束广东的半独立地位，陈济棠得到李宗仁的支持，先发制人，桂军在白崇禧统率下进军湘南，宣布两广动员，因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乃自称抗日军北上保卫国家，陈济棠自任第一抗日救国军司令，李、白为副司令。7月初，因广东空军投向国民政府，广东事变失败。

1936年7月25日，国民政府任李、白以广西地区外的职务，李、白拒而不受，五天后，自行组织广西军政府，李济深任主席，后经黄绍竑、程潜调停，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取得协议，广西承认国民政府，李任广西绥靖主任兼改编桂军而成的第五路军总指挥。

1937年8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一个月，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其地区包括江苏、皖北、鲁南。10月10日，李宗仁离广西就任，又兼任安徽省主席。第五路军开到北方，分成两个军团。李在徐州设立司令部，统率桂军五个师。

1938年初，日军在徐州附近进攻，3月25日，日军两个支队进攻徐州东北的台儿庄，经五日激战，击溃日军一个支队。双方增援后，5月中旬在徐州外围展开激战，5月19日，李撤离徐州，率军去皖西豫东，在鄂北老河口设立司令部。李仍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则另由桂系廖磊继任。

1939年4月，日军从汉口出击，攻占新野、唐河，包围了驻桐柏山的六个师，李宗仁于5月10日开始反攻，5月16日，救出桐柏山被围部队，克复了新野、唐河。

1945年初，李宗仁任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战争结束后，任北平行营主任。东北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极可能战胜国民党，蒋介石请李宗仁主持东北战局，李仍任北平行营主任。1948年4月29日，李宗仁击败孙科被选为副总统，1949年1月21日，任代理总统。但是李宗仁并不能指挥国民政府，因为蒋介石仍以总裁名义继续发号施令，军政委员又都是忠于蒋介石的。2月5日，孙科未得到李宗仁同意，把行政院迁到广州，因此，国民政府事实上已分裂为三个部分，各由蒋、李、孙命令行事。孙科于3月7日辞去行政院长，由何应钦继任，情况略见缓和。

李宗仁和以武汉地区为据点的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议，以海军军力防守长

江一线，并将驻守上海地区的汤恩伯所部西移与白联系。李宗仁请蒋介石批准这个建议，但蒋介石已把部队开到海岛上去，拒绝批准这一计划。

李宗仁经蒋介石同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1949年3月26日，共产党用无线电通知国民党，已派周恩来为首的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在4月1日于北平开始谈判，规定国民党于4月20日前决定是否接受，否则即行渡江。据说，倘能签字，李宗仁在新的联合政府中将继续担任副总统。李拒绝签字，并要求延期。4月20日，共产党开始进攻，渡过长江。4月23日，国民政府逃离南京，迁往广州。当时，李宗仁已疲于与蒋介石及共产党的争执而到桂林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代表请他回任，5月7日，李宗仁被劝服后回广州。

云、贵、川仍为国民党和白崇禧的军队所把持，李宗仁进而想以广东、海南岛为战略据点。1949年7月14日，蒋介石到广州与李宗仁等官员会商，结果成立了一个以蒋介石为首席，李宗仁为副主席的特别委员会，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间的联系。

1949年10月，国民政府被逼迁到重庆，11月11日，李宗仁飞到桂林，与白崇禧、夏威、李品仙、黄旭初商议防守广西的计划，又飞往海南岛与陈济棠会商，几天后回广西。他胃病复发，需要手术治疗，广西又无此条件。11月20日，李宗仁飞往香港安排去美国治疗。11月22日，蒋介石派居正、朱家骅请李宗仁暂留，李未同意，代表撤回。12月5日，李宗仁飞往美国，在纽约的医院里住了两个月，1950年3月2日，曾在白宫拜访杜鲁门总统。在此前一天，蒋介石在台湾宣布总统复职，李宗仁对此加以谴责，认其为非法，但亦无能为力。

李宗仁在美国安静地住了三年。1954年1月3日，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公开信，反对蒋介石在台湾进行国大重选，宣称必须依宪法条文行事。而台湾方面，亦谴责李宗仁，1954年3月10日投票撤销李宗仁职务，3月22日，蒋介石重新当选为总统，两日后，陈诚继李宗仁而当选为副总统。

1965年7月，李宗仁和他妻子郭德洁离美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两个儿子李亦龙、杰克逊·李仍在纽约。李宗仁在北京受到著名的代表人物的欢迎，其中包括周恩来。9月26日，他在访问东北两个月后，召集了中外记者开会两小时，赞扬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

剂的一部分，抨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吁请在台湾的国民党旧人，像他一样“回到祖国怀抱”。1966年3月23日，郭德洁死在北京，李宗仁仍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黎元洪

字：宋卿

号：黄陂

黎元洪（1864—1928.6.3），是唯一两次担任北京民国政府总统的人，任职时间为1916年6月—1917年7月，1922年6月—1923年6月。

汉口北面的黄陂是黎元洪的生地。他的祖辈先在安徽经商后在湖北务农。太平天国时，他父亲黎朝相是清军练军游击，退职后，受恩俸在天津投北洋军，其家属不久到天津同他会合，黎自1879年在私塾正式受学，五年后，入天津水师学堂，1889年3月毕业后，去广州舰艇见习六个月，取得一些航海经验后，1894年为广甲舰管轮驻上海，1894年中日战争开始，该舰奉命调往旅顺，途中触礁，又被日舰击沉，黎不谙水性，靠救生圈漂浮三小时后被海浪冲上海岸，他转到旅顺，住在该地一直到中日战争结束。

北洋舰队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中被日军击溃，黎放弃了从事海军事业的任何打算，去上海由两江总督张之洞（管辖江苏、浙江和安徽）委派他修筑南京炮台，他指导该项工程于一年后竣工。1896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湖北和湖南）总督去武昌，委黎为管带（军事幕僚），张计划组织和训练一支近代化军队“自强军”，1897年、1899年、1902年三次派黎去日本考察军事，黎由是成为张之洞训练鄂省新军的最得力助手之一，并得以稳步递升，1906年受任新组成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

1911年革命前，湖北成了革命活动的重要中心，武汉地区的军队，成为革命宣传和革命力量渗透的主要目标。1910年秋，黎发觉其军队中已有革命党人渗入，乃采取措施，破坏了一个秘密的军官组织“振武学社”，他虽作了这些努力，但是革命运动继续在湖北增涨。1911年秋，蒋翊武（死于1913年）为首

的“文学社”和孙武（死于1940年，原名保仁，字耀庆）为首的“共进会”，实行秘密联合，准备在10月6日于武昌起义，后又改为10月16日。10月9日，同盟会在汉口的秘密军火库发生意外爆炸，以及清政府随即进行的搜索迫使革命党人将起义时间提前到10月10日，革命党人起义后成功地赶走清人总督瑞澂，和武汉地区提督张彪。

起义由于事发仓猝，公认的领袖人物如孙武、蒋翊武都不在武汉，因而民军呈现紊乱，亟需军事方面的领导。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党人和湖北咨议局会商，推定尚在该地的高级军官黎元洪为新的革命政府首领。黎本人与革命活动从无联系，不愿从事反清活动，匿居不出。经搜查出之后，在暴力胁迫下同意去咨议局，勉强答应当武昌民国政府首领，担任湖北都督职。五天之后，10月16日，又兼任湖北民军总司令。

起先，黎元洪对被通接受的职务缺乏热情，对新政府无甚贡献。组织革命政府的工作交由汤化龙、屠正等负责，军事行动则由孙武、蒋翊武，后由张振武担任，张死于1912年。黄兴到武汉后，11月3日，黎元洪辞去总司令职由黄兴继任。

革命起义正在各省取得成功，并将在全国获胜，黎元洪将自己的命运与新政府相联结的志愿亦随之加强。11月9日，他致电各省革命政府派代表到武昌商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各省代表于11月间到达武昌，12月中旬，因武昌军事局势的关系，迁到南京开会，1911年12月29日他们选举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孙逸仙让位于袁世凯后，2月20日，黎仍被选为副总统。

民国政府迁往北京，黎元洪以鄂省都督仍留在武昌。袁世凯为了加强其政府以控制全国，用调离的办法削弱革命党人及地方势力，虽有某些领袖人物去北京就任诱人的职位，黎元洪却一再拒绝离开湖北去新首都任职。他在湖北与当地军界人物，特别是与同盟会首领张振武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他催促他们去北京接受袁世凯之聘担任顾问。1912年夏，张振武及其他湖北首领去北京。不久，黎元洪密电袁世凯称张振武准备兵变，应加处决。8月15日，袁世凯枪决了张振武并公布了黎元洪的密电作为自己枪杀张的依据。此举使黎元洪

在湖北的声誉大大减低，他与湖北军界首领及新成立的国民党的关系亦大为削弱。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前，黎元洪总算保持住了他在湖北的地位，但是他声名狼籍又很无能，声望下降而又找不到新的同盟者，使他越来越难抵挡袁世凯所施加的军事政治压力。在袁世凯与国民党军队的冲突发生前，黎元洪已屈从袁世凯，允其军队通过湖北去打湘赣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二次革命后，北洋势力已伸入长江流域，黎元洪的地位岌岌可危。12月，袁世凯派亲信段祺瑞到汉口要黎元洪去北京就职。12月9日，黎元洪登上段祺瑞为他提供的专车，去了北京。

黎元洪到北京时，受到袁世凯的迎接，并得到了作为副总统应得的各种礼遇，袁委任他为参谋，又娶黎元洪的长女为媳。虽有这些礼遇和殊荣，但黎元洪不久发现他在北京毫无实权。1913年12月，黎元洪的名字被用来领衔一批军人，要求取消国会，1914年5月，任代理无实权的参政院院长，1915年袁世凯筹备称帝，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请求辞职，退休回湖北，但为袁世凯所拒，他既不能离开北京，乃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的政治软禁始告结束。6月7日，黎就任总统。不久他发现政府的全部实权都操在内阁总理段祺瑞及北洋军人手中，他们只把他当作一个傀儡罢了。他既无军事后台，又与国会中主要派系毫无联系，因而无力反对段祺瑞。他对段祺瑞的专横十分不满，经常引起两人间的冲突，更因徐树铮的跋扈而加剧。国会中由内务总长孙洪伊为首的反段势力企图利用黎元洪挟制段祺瑞，黎元洪经常采用拒绝在段及其支持者的文件上签字的方式来反对段祺瑞。

当时北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是否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黎元洪并不反对对德宣战，但他反对段祺瑞为此所采取方法。1917年3月段祺瑞要黎元洪在致驻日公使宣布对德绝交的电报上签字，黎以未得国会同意拒绝签字，段继续施加压力，因此与黎元洪及国会的关系不断恶化。4月，段祺瑞召集北洋军阀开会，谋求对他的参战政策的支持，但此举以及行将采取武力的暗示只是更加强化了黎的反对态度，并激怒了国会，以致议员们提出要段祺

瑞辞职。由于国会的态度为其壮了胆，加上张勋保证给予武力支持，黎元洪遂于5月23日解除段祺瑞的内阁总理职务。

在任命新的内阁总理时，黎元洪为了安抚北洋军阀，1917年5月28日，任命前袁世凯的亲信李经羲继任段祺瑞之职。于是，北方各省督军，除张勋外，立刻宣布脱离北京政府而独立。段祺瑞及其亲信策划此举的目的是逼使黎元洪求援于张勋。张勋梦寐以求的却是清廷复辟，因而必然会赶走黎元洪和国会。黎元洪果然请张勋来京调解这一政治危机。张遂率军五千人到北京。张勋占领北京后，6月12日，逼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7月1日，黎元洪对恢复清廷的命令拒不签字，此时他认为，要保存民国，非依赖段祺瑞的势力不可，7月2日，他下令再任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并要他率部驱逐张勋，同时下令副总统冯国璋在危机期间就总统职。7月3日，黎元洪避居日本使馆，一直到7月14日段祺瑞推翻了保皇派。不久，段祺瑞要黎元洪辞职，由冯国璋任大总统，1917年8月27日，黎元洪离京去天津。

据黎元洪儿子说，从1917年8月到1922年4月，是黎元洪生活中最为愉快的时期。他安安静静地住在天津的别墅里，和一切政治活动都脱离了关系，但这种闲适的生活到1922年中期又结束了，直系首领吴佩孚、曹锟战胜了奉系张作霖，一些军界政界首领想恢复1912年宪法和1913年国会以及黎元洪的大总统职而统一南北两个政府。支持这倡议的人有些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加强直系势力并驱逐总统徐世昌，但黎元洪并无这种用心，他同意在军人缩减其军事力量以及取消督军制度两个条件下出任总统。直系首领同意这两个条件，黎元洪乃于1922年6月11日到北京任总统。

直系首领虽同意这些条件，但黎元洪在北京仍不过是一名傀儡，内阁和国会操在直系手中，每当黎元洪想依宪法行使总统职权，他不是被置之不顾就是为人所制服。曹锟及其支持者不久又决定驱逐黎元洪，选曹锟为总统。1923年6月，一个收买而成的“公民团”游行示威反对黎元洪，北京市警察以及卫戍区的士兵，声称抗议欠饷，包围了黎元洪的住宅，切断其电话和水源，实行罢工。这些刁难措施迫使黎元洪离开北京，6月13日，他的专车在天津附近被曹锟的部属扣留，直至他被迫签署退职声明并交出总统印章。

1923年9月8日，黎元洪离天津去上海，希望联合张作霖、唐继尧及其他反对直系势力组织反对派政府。但这一计划失败了，黎元洪因糖尿病加重去日本别府温泉休养了六个月。1924年5月回国后，他完全脱离政治活动住在天津别墅中，1928年6月3日，因脑溢血死去，遗有妻吴氏（死于1929年），二子绍基、绍业，二女绍芳、绍芬。黎绍芳于1914年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钦结婚，黎绍基以爱德华·S·G·黎的名字，1925年在天津出版了《黎元洪的一生》一书。

黎元洪的公文书信已有一些编成集子出版，其中有：1912年出版的《黎副总统书牒》，1914年出版的《黎副总统书牒汇编》、《黎副总统政书》，1916年在上海出版的《黎大总统政书》，1923年在上海首次出版的《黎大总统文牒类编》。

梁 启 超

字：卓如

任甫

号：任公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康有为的弟子，二十世纪初二十年间最著名的知识界领袖。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是家中的长子。他的先辈十世务农，其祖父唐他家第一个秀才，曾任县督学，他祖父和父亲教他学习中国古籍。梁启超幼时聪颖，十一岁即成秀才。1887年进七十年前阮元创办的学海堂，习语言学及古代经典，1889年十六岁时应省试中举人，主试李端棻对他极为赞赏，以妹李惠仙嫁给梁启超。他于1890年去北京会试未中，回广州途中过上海，读到徐继畲的《瀛环纪略》及江南兵工厂主译的西方著作，这些书籍给了梁启超深刻的印象，他从此热心宣扬“西学”。

他回广州后，与一名学海堂同学访问当时上书朝廷请求实行改良而闻名的康有为，他们对康的学识深为敬佩，成为康在广州的第一批弟子。据梁启超自称，他在1890—1894年与康在一起对他思想的发展极其重要，他透澈地了

解康有为学说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佛学及以公羊学派的古文经学为基础的维新哲学思想和西方学术知识，1893年，他成为康的万木草堂的一名讲师。1892年、1894年他两次进京会试均未中。

1895年，他与康有为进京，会试又未中，当时与日作战失败，订立了马关条约，逼迫清廷付给日本大量赔款并割让台湾，梁启超联合应试广东举人，上书请求拒绝签订和约，并协助康有为起草著名的“公车上书”，请求皇帝拒绝和平条件并进行变法。1895年夏，梁与康有为等人创立的强学会书记员，并为鼓吹维新的报纸《中外纪闻》撰稿。1896年初，清廷禁强学会，梁启超个人财物被抄没，以致一文不名，无家可归。

1896年春，梁离京去上海，会见黄遵宪、汪康年等维新派，共同出资办《时务报》，汪为经理，梁任主笔。该报自1896年8月创刊起到1897年秋，梁每期都撰文或写社论，讨论教育、历史发展、维新、西化等问题，甚为全国读者所欢迎。他虽然主要的是宣传康有为的观点，但也反映了从其他在北京遇到的知识界人士如谭嗣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所受的影响。他在上海则与黄遵宪、马良、马建忠兄弟联结，还与天津任《国闻报》主笔的严复经常通信。梁与上海的朋友还办了一个禁止缠足会、一所女子学校和一个印刷企业《大同译书局》。

1897年秋，他应思想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请去长沙在新设的时务学堂任主要讲师，在那里他与维新派唐才常（唐也在该学堂讲学）以及省按察使黄遵宪会合，和他们一起办了一个维新组织南学会，但梁的大部分时间用在时务学堂及其四十名学生身上，其中有未来的军界首领蔡锷，梁向他们灌输君主立宪，民众主权等政治观点。这些在当时被认为是过激思想，传授这些思想遭到了湖南保守学者的强烈反对。

1898年初，梁因病离长沙去上海，3月去北京协助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再次联合公车上书时的考生，抗议政府将旅大租借给俄国，并参与组织新的维新团体保国会。由于维新改良活动盛行，他被人推荐给了皇帝，并于1898年7月3日受召见，皇帝授以六品官，要他经办新设的大学堂译书局事务。百日维新时期，梁启超为译书局拟订译书计划，筹款并物色译书人员；1898年9月21日，慈

慈禧太后重新执政，取消新政，下令逮捕梁启超，他逃到日本使馆，由使馆官员帮助他逃往东京，与日本著名的支持中国维新运动的人士如大隈内阁的文教大臣犬养毅等相友善。1899年他创办了一份杂志《清议报》，要求还政于被拘的光绪，并抨击慈禧及其支助人荣禄、袁世凯等人。该报在海外华侨中迅即得到好评，虽由清廷查禁，但仍能在中国国内一些城市流传。

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其政治哲学有所改变。这时，他开始学日文，读西方著作的日文译本，穆尔《论自由》，卢梭《民约论》《社会契约》的观点对他的著作有明显影响。他对共和的思想随着孙逸仙的代表们争取维新派的努力而同时增长。但在1899年夏，梁启超同意支持康有为成立保皇会，他与革命党人就完全分道扬镳了。此后几年中，他四出游历，在华侨中为保皇会募款。1899年12月，他离日本去夏威夷，1900年8月，急忙赶回上海准备参加由唐才常领导的汉口起义以推翻慈禧，但他到达时，得悉起义失败，即离上海去新加坡投奔康有为，又从新加坡到澳大利亚募款，后又经菲列宾于1901年春回日本。1903年初，应保皇会美洲分会之请，他离日本去加拿大，美国，在一些大城市中给华侨演讲，并在华盛顿访问了罗斯福总统和海约翰国务卿，11月又回到日本。

梁启超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观察及其对国人在国内外的政治活动所得的印象，更使他认为中国对实行共和制度所带来的自由远未作好准备，要使中国人获救，国人的觉悟远较政治制度的改革更为重要。他的这些观点，在1902年于横浜出版的著名的期刊《新民丛报》上首次发表。为了向中国人民介绍新思想，他在这份新杂志上刊登许多生动有力的文章向国人介绍西方哲学家、历史人物、政治理论，还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更新等问题。1906年，《新民丛报》拥有一万四千多个读者，在国内外中国人士中发生了相当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表明他的思想已开始与康有为的观点有分歧，例如，康有为强调必须保存儒家学说作为中国文化完整性的基础，梁则开始认为儒家学说是在中国实现思想自由和发展新观念的障碍。他们之间，虽有这些分歧，但梁启超在受到革命派刊物的攻击时，仍与康有为一起维护君主制度。日俄战争后，清廷的一些要员主张模仿日本进行改革，1905年，端方率官

员出国考察宪政，梁启超与端方私相往还，并为考察团起草了几个条陈。他在《新民丛报》中，加紧反对留日的革命派，那时，他们已组成了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从1905年到1907年夏《新民丛报》停刊之间，该刊与《民报》进行了长期激烈的笔战。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梁启超于1907年秋在日本组织了一个新的政治团体政闻社以促进国内的立宪运动，它的成员们散发请愿书要求颁布宪法并召开国会。1908年初，政闻社迁往上海，以马良为总务员，出版《政闻》，与清政府要员秘密往还并计划开办学校培养立宪政府中的人才。这些行动，为袁世凯等要员所反对，他们于1908年夏封禁政闻社。但是梁的同事们于1909年底已与各省諮议局有联系，想以此推动在北京早日召开国会。1910年初，梁创办《国风报》，他希望用具体讨论代议政治的文章向国人进行有关立宪政府的教育。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梁去沈阳，希望北方军人能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实行君主立宪，但他的活动失败了，转而支持康有为的“虚君共和”思想，但是那时共和革命运动已无法阻止了。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梁与康有为的政治联合宣告结束，他不仅接受了新成立的政府，而且积极参与新政府的政治事务。他在过去十五年间办报活动，使许多人认为他是近代中国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之一。许多支持议会制政府的人希望他指引大家建立共和制国会，因此，他于1912年9月回国后各种不同政见的人都要他参加他们各自的组织。他新办的杂志《庸言》一万份一出版就销售一空，这反映了他当时的声望。梁在回国之前，已与国内友人张嘉森、林长民、汤化龙有联系，商议组织政党。1912年10月他参与成立了民主党，1913年2月又加入了共和党，该党早已把他作为自己的思想领袖。

1913年初的国会选举中，孙逸仙的国民党获胜，共和党居次。为了在国会中形成一个反对孙逸仙国民党的有力反对派，梁及其同人联合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组成进步党，反对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及其向国际银团进行善后大借款的计划。1913年夏二次革命失败后，进步党取代了国民党成为国会中最有势力的政党，梁的维新派老朋友熊希龄组阁，梁任司法总长。不久，袁世凯不仅于

1913年11月4日解散了国民党，而且于1914年1月10日解散了国会。梁随同熊希龄一起辞职，但不到两个月，又由袁世凯任命为币制局总裁，1914年6月，又充任袁世凯新设立用以代替国会的咨询机构参政院参议员。

梁自接受了这些任命之后，舆论因他与袁世凯合作对他进行抨击，这使梁深为苦恼。他的政敌中，有被禁的国民党人士，责他为可鄙的投机分子，他的朋友则指斥他轻信和有错误的理想主义，他不久也觉得要和袁世凯合作而实现改造中国的美好理想是不可能的。他的统一和稳定币制的建议，他的国民义务教育和军事训练的计划，不是被认为不切实际就是被束之高阁。因此，他转去天津并于1915年初就聘为《大中华》主要撰稿人，他在这份刊物上写文章反对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1915年夏季前，梁启超在名义上仍是袁政府成员，但早在此时以前，他对袁世凯的野心已深有疑懼。年初，袁世凯的追随者之一杨度曾一度劝说梁列名支持袁世凯称帝。梁于1915年在南方过了几个月，6月去北京，袁世凯向他保证决无称帝的意图，但是到8月间，袁世凯称帝的活动已属公开，梁此时已在天津，遣责保皇组织筹安会企图以帝制替代民国。梁与旧日学生蔡锷常有联系，参予制定蔡锷反对帝制活动的计划，他们得到蔡的朋友云南都督唐继尧的支持。9月中旬，蔡得到云南不久，梁离天津到上海，活动两个月，策动军政界首领反袁。1916年3月初，他经香港、海防到广西，争取广西将军陆荣廷的支持，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参加反袁。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位恢复总统名号，梁启超等人要求恢复1913年国会，袁世凯断然拒绝，梁帮助组织西南军界首领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成军务院，宣布在袁退位之前暂行合法政府的职务。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军务院解散，梁转而又致力于进步党的活动。

国会在北京召开时，进步党分裂，梁启超等人另组“宪法研究会”，通称为研究系。梁作为研究系首领，希望能在决定修订宪法，组织内阁、外交政策等方面起重要作用。1917年春，他支持内阁总理段祺瑞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7月，又支持他粉碎康有为、张勋发动的复辟清室活动。是月，他任财政总长，转而再次注意币制改革问题。但是段祺瑞因国内军费需要，秘

密向日借债，这使梁启超稳定币制的希望完全破灭。11月中旬，他与其他阁员一起辞职。此时，他已相信在现行的政治条件下谋求中国的新生是愚蠢而无望的。1918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已退出了政界，从事研究、著述及筹划各种教育工作。

梁启超很久就想增加自己对西方的知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以巴黎和会中国方面的非正式代表身份与张嘉森、蒋方震、丁文江一起去欧洲。1919年2月到伦敦，又遍访西欧国首都。这次旅行的结果之一是改变了他早期对西欧文化的敬慕心情，梁启超认为欧战及其后果清楚地表明西方在社会和思想方面存在着重大弊病，这些弊病是由盲目信仰科学所带来的。他反对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与儒教一样是一种思想束缚。他认为每个人都应有发展思想的自由，“思想解放”的目标是他作为自己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为了研究怎样才能在中国实现思想与文化的复兴，他和在欧洲及在国内的朋友，于1919年9月组织了一个“新学会”，与张嘉森、张东荪、蒋方震等人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1920年9月改名为《改造》），刊载了许多文章，广为介绍西欧与俄国各种大为分歧的新思想。

1920年1月，梁离欧，两个月之后回国，立即从事实行许多关于文化和教育的计划。其中，组织“共学社”以促进西方重要哲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又组织“讲学社”，计划邀请罗素、泰戈尔等著名外国思想家到中国讲学。这种种复兴文化的活动，与五四运动的思想酝酿相吻合，并对五四运动多少起了一些作用，当然并非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胡适、陈独秀等青年人物已替代了梁启超这一辈人，成为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了。

1920年，梁应聘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中国历史，这种学术生活，断断续续，一直到他临死之前几个月，他还到清华、燕京、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以及对一些哲学家、历史人物的研究著作。梁不断地写作和教书，后因肾疾加剧而中止。1929年初死在北京协和医院，年五十五岁。

梁启超的主要文集是《饮冰室合集》，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内收文集

十六册，专集二十四册，这个文集足以证明他是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间中国最先进的思想界人物。

梁启超和李惠仙有儿女五人，次子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三子梁思永是有名的考古学家。李惠仙死于1924年9月13日。

梁 鸿 志

字：众异

梁鸿志（1883—1946.11.9），皖系，安福系中的重要人物，日伪政府中的要员，1946年以卖国罪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梁鸿志，福建长乐人，出身于仕宦之家，他的曾祖父梁章钜，是著名学者，政绩卓著的福建巡抚。梁鸿志六岁时，祖父任长崎领事，全家随同去日本两年。他在日本及在长乐时开始读中国典籍，1903年中学人，后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其活动情况不详，据说曾在山东任职，又在奉天高等师范教书，又有人说他曾在段祺瑞手下做事。

1911年革命后，曾在北京民国政府任秘书、高级助理、法制局参事，该局负责草拟和审核政府的律令。1914年任职于督察院前身的庶政局。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权，为梁鸿志开辟了晋升的前程，他成为皖系、安福系中的重要人物，1918年任国会秘书长。1920年，段祺瑞被直系曹錕、吴佩孚击败，梁逃到日本使馆，1922年又迁居上海、沈阳。1924年，直系被张作霖、冯玉祥击败，段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梁任执政内閣秘书长，1925年11月27日辞职去天津。

1925年，梁鸿志进了日本经办的远东文化事务委员会，可能由于他的亲日思想，他于1928年迁居大连，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攻占沈阳后，他又迁居上海。他在三十年代中出版了他的诗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仍在上海。1937年底，华中日军在占领区决定成立类似华北的北平临时政府的中央傀儡政府，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包括江、浙、皖日占区的维新政府，劝梁鸿志主持。南京维新政府中有三个主要机构：梁鸿志为首的行政院，陈群为首

的立法院，温宗尧为首的司法院，国务院由三院正副院长及行政院各部部长组成，是一个最高决策机构，维新政府宣布实行反共，不承认国民政府，与日紧密合作的政策。

1938年秋，北平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的代表在大连开会，9月22日，他们同意由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朱深及维新政府的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一起组成在华各政府的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轮流在北平、南京开会，有权管理运输、交通、邮电、税务、教育、外交事务。会议结束后，梁去东京，11月15日到17日会见了日本官员。

当时，汪精卫离开重庆去河内，1938年12月29日在河内要求与日本实行和平解决，1939年5月到上海与日方当局谈判，经决定由汪精卫主持日占区的中央政府，北平临时政府则在新体制内保持自治地位。9月18日到20日，汪精卫与梁鸿志、王克敏相会后，中国境内各政府联合委员会发表声明，支持成立由汪精卫主持的中央政府。1940年3月30日南京新政府成立，梁让出行政院长之职由汪精卫继任，退而任没有什么实权的监察院院长之职。

梁鸿志好收藏珍本名画，他利用战时不少人被迫出售珍藏品的机会，收集了三十三种宋版书画。1940年他主持出版《明史略》，这书的稿本得之于江苏国学专修馆图书室的壁龛内。

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梁躲到苏州，由国民党特工人员发现后押送到上海受审，他在狱中写了两部诗集以及一些有关直皖战争的记述。这些手稿交给同狱人，后来遗失了。审问时虽有证据说明他在战争期间曾几次与国民政府秘密合作，但仍被作为汉奸判处死刑，1946年11月9日在上海处决。

梁 实 秋

字：治华

笔名：秋郎

梁实秋（1902—），文艺批评家、教师、西方文学著作的翻译家，新月社的领袖人物，这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主张文学以表现个性和美为

目的的团体。

梁实秋的祖籍是杭州，他本人出生在北京。他祖父当税务官积聚了一些家财，他父亲曾在北京警务处工作，梁在中学及清华学堂预备班毕业后，于1923年夏去美国进科罗拉多大学，当时他在清华的同学闻一多也在该校。翌年夏毕业，去马萨诸塞州剑桥，进哈佛大学研究英国文学。他在美国的第三学年与最后一年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同一学科的研究。

梁实秋在哈佛时受白璧德的影响，白璧德关于文学的继承性和传统的价值的保守观点为梁所接受。他写了一篇献给白璧德的文章，《近代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影响》。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表现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各种最坏的缺点，解救之法在于建立一种民族文学，它应从古代中国文学中吸取原则并从西方古典文学吸取其形式，他渴望国内读者能读到西方古典名著，因此，他以大部分时间用来翻译西方名著。

1926年夏，他回到北京，不久就聘于国立东南大学，翌年春，他与李淑芳结婚。随着国民革命军向北方进军，社会不安政局动荡，梁迁居上海，三年中，他在暨南大学及其他大学教书。1930年到1934年间，他在山东青岛大学教书。

在国民党统治初期，上海成了文化和文学活动的主要中心，文学是政治活动的工具这种观点，被人们广泛接受，特别是在左翼作家之中。为了对抗这种文学理论的宣传，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于1928年成立了新月社，他们在其机关刊物《新月》上阐明，中国人民将经过文学的解放而获得精神自由，梁实秋强调文学表现应是独立的、具有个性和美。他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使他与鲁迅等人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同时也使他成为文艺界的一个全国知名之士。

梁实秋参加这些年发生的争论，结果是产生了一些有关文学问题、文艺原则的书籍：1927年出版的《浪漫的与古典的》，发挥了他的关于白璧德的论文中的观点；1928年出版的《文学的纪律》；1934年出版的《文学批评论》，以及《偏见集》，同年又出版了《约翰逊评传》。梁实秋致力于翻译，1928年出版了《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1929年出版了《潘彼得》，还翻译了《织工马南传》、《咆哮山庄》。

1934年，梁实秋离开青岛大学，当了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他仍继续从事翻译，但重心已转到莎士比亚的剧本。他用白话译了莎士比亚的二十种剧作。《莎士比亚名著》于1953—1957年在台北出版，原著中的散文和无韵诗都简单地译成散文，有韵诗则译成相应的中文有韵诗，以保存原文的风味。

1937—1946年，他住在重庆附近，曾在政治协商会议作讲演，又在“国立编翻馆”工作，1949年出版了那几年写的文集《雅室小品》，1946—1949年，梁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英国文学教授，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后任大学院院长。他在台湾出版了几本书，其中有《美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谈徐志摩》、《清华八年》、《文学姻缘》，又主编《最新英汉辞典》于1959年在香港出版。

梁 士 诒

字：襄夫

号：燕孙

梁士诒（1869.5.5—1933.4.9），政府官员，财政家，在北洋政府时期，他在银行业、铁路业及借贷活动中，公认为所谓交通系的首领。1922年1月他被解除北京政府内阁总理职务，此事直接导致直奉战争的发生。

梁士诒生于广东三水，是梁知鉴的长子，梁知鉴是广东著名学者朱子琦的门生。梁士诒有弟梁士诤和四个妹妹。梁知鉴亲自督导他习读中国典籍，1886年梁士诒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1890年、1892年两次参加进士会试未中，1894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时年二十六岁；其父于1895年和1896年两次会试未中，因此决心不在北京谋求仕进之途，梁士诒遂请辞翰林院职务伴随其父回家乡，主持凤岗书院。1897年又去北京在清廷担任几个学术性职务，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离京回乡，将凤岗书院改革成为一所新式学堂。

1902年，梁去京应1903年经济特科考试，后经唐绍仪、直隶总督袁世凯推荐，出任北洋编书局总办，该局出版了一些军事书籍，1904年底，入唐绍仪幕，随唐出使英国詹姆斯王朝，后又随唐去加尔各答谈判有关1904年9月7日与英国

缔结的拉萨条约事宜，他们于1905年2月到加尔各答，七个月后回京，谈判不久又在北京举行，并于1906年4月27日签订了一个有关的中英协定。当时，唐绍仪已担任京汉、沪宁铁路总办，以梁充任首席秘书。11月，唐任邮传部侍郎，1907年设铁路提调处，梁任提调，梁士诒就此与所谓交通系结合在一起，以后又成为该系首领。此后几年，梁负责实施清政府许多有关铁路事务的改革和发展计划以及收回京汉铁路的管理权。1907年他参与创建交通银行，任协理。但他从事改革的精力却集中于教育、税务、交通、银行等方面，他对宪政改革则很少兴趣，他任铁路局局长直到1911年初被新任邮传大臣盛宣怀免去职务。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以图挽救君主制，11月16日任梁为邮传部副大臣，他与其他北京的要员一起上书清帝劝其退位，让位给民国政府。1912年1月1日，南京成立民国临时政府后，作为邮传大臣的梁士诒与胡维德、赵秉钧上书清帝请其退位，他和袁世凯内阁的其他成员于2月12日联名签署于清帝的逊位诏书。

袁世凯继孙逸仙任临时大总统，把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梁士诒任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经理。他支持孙逸仙建立全国铁路网的计划并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会谈，结果袁世凯于1912年9月9日任命孙逸仙为全国铁路督办。1913年，梁和财政总长周学熙是新设立的全国财政委员会的两名委员。1913年5月，周辞职，由梁署理至1915年初。1914年1月，梁主持财政会议，决定改革货币制度，发行标准银圆。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公布新约法，设立国务卿，取消梁士诒的秘书处，5月任梁为税务督办，8月要他兼任公债局总理。梁士诒在债务、税收、币制方面的活动使北京政府的财政情况大为好转。1915年他协同筹办新华储蓄银行和盐业银行。他还与美国马里兰州麦登斯新士公司商议合办中美“东方太平洋轮船公司”，北京政府同意担保所投资金及其利息，以中国货物征收特别关税为条件，这个计划因政局不稳未能实现。当时，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已经开始，梁士诒被列名于筹安会及全国请愿联合会名单中，他后来声称他并非帝制活动的首领，其名字是未经他允许而被盗用的。

梁士诒竭力主张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他组织惠民公司，招

收华工去欧洲为协约国做工。1915年中期，公司经理叶恭绰、梁汝成与法国政府签订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在战争期间共有二十万名华工去法国。梁士诒因参与此事遭受指责，梁后来答覆批评者说，此举是中国对战争作出的唯一贡献，并且由此使中国得以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提出自己的要求。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梁辞去税务督办。7月，他被列名为八名复辟帝制阴谋的祸首之一，通令逮捕，他立即逃往香港，并继续从事招收华工送往法国。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梁要求讨伐张勋并请任在天津负责交通银行的叶恭绰以财力支持段祺瑞对张勋采取行动，叶恭绰的大量财政支持，使段祺瑞能迅速进军把张勋驱逐出北京。

1917年11月，梁去日本居留两月，1918年2月到香港时，得悉对他的通缉令已取消，3月回北京见代总统冯国璋，任交通银行董事长，8月22日，成了国会议长。

1920年，北京政府重设国内公债局，梁再任该局总理，是年，他与一些银行家成立“中华银公司”，任董事长。当北京政府设立棉业、皮革两局以促进工业研究时，梁被任命为皮革改良会会长。

1921年12月，张作霖授意总统徐世昌任命梁为国务总理，吴佩孚对此表示反对，并大事攻击，迫使梁于1922年1月19日辞职。张作霖认为吴佩孚蔑视他，这直接导致直奉战争的爆发。5月，徐世昌认为梁对战争的发生负有责任，乃解除其职务并下令将其逮捕，梁逃到日本，直至1922年9月回到香港。

1924年3月，梁士诒离香港去欧美作广泛游历，4月6日到伦敦，与路透社代表及其他通讯社人员讨论中国政局并由英皇乔治五世接见，又会见了实业界及政界头领人物，然后去法、比、荷、德、奥、捷克、瑞士、意大利等国。他在日内瓦会见了国联秘书长德雷蒙爵士。他在遍游欧洲后，又去美国，7月15日到纽约，访问了摩根，与他共进午餐，以后又到华盛顿拜访柯立芝总统，在他访问了美国各大城市后，于1924年8月29日回到香港。

梁士诒经临时执政段祺瑞之请，到北京参加1925年2月1日到4月21日举行的善后会议。5月，任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筹备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四

个月后，又任命为关税特别会议成员，该会是为讨论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决议的实施问题而召集的。这两个会议均在10月间召开。

1926年4月，段祺瑞被逐下台后，梁士诒去沈阳，协助张作霖改革币制及财务机关。6月，去天津，8月，去香港，作短暂访问，10月又回天津定居。1927年张作霖控制北京，邀梁组阁，梁辞谢未就，于是被任命为政治讨论会会长。1927年底，梁任税务局长，关税自主委员会委员。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北伐宣告结束，梁引退去香港。国民党下令通缉梁士诒，后由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疏通于1931年取消通缉令。1932年初，梁因国民政府之请，参加4月于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会议结束后，梁又回到香港。

1933年初，段祺瑞邀梁士诒去南京，梁于3月3日到上海因病不能成行，4月9日死在上海。遗有1897年结婚的妻子高氏，子三人。女五人。女好音（1896—）怀生（1900—）與生（1900—）、藏生（1904—）、议生（1909—）；子定蓊（1898—），留学波斯顿大学，是一名银行家，定蜀（1907—），留学牛津大学，是一个铁路技术人员，定陶（1908—），留学伦敦大学，是一名土木工程师。

梁士诒的二卷本传记《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于1946年出版，1962年在台湾再版，其中除详记梁士诒个人的经历外，还提供了民国初年的经济财政政策和政治方面的材料。

梁 漱 溟

号：焕鼎

梁漱溟（1893.9.9—），他于1917—1924年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曾对儒家学说重作诠释。1927—1937年，他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首领，其后在“第三势力”的政治活动中很活跃，又在组织民主体制活动中起了作用。1949年后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承认马列主义是中国的有效的意识形态。

梁漱溟原籍广西桂林，他本人生长在北京。他父亲梁巨川是一个为人敬重的京官，为罪犯和贫苦儿童办过职业学校。梁漱溟进了新式学校，学了英语，

后又进顺天中学，直隶法政学校。他在学生时代就倾心于功利主义，1911年革命前，他加入了同盟会京津分会，为革命党人私运弹药枪枝。1912年为天津《民国报》记者，1913年因家庭不和又对共和革命感到幻灭而潜心于佛教唯识宗，过了三年半隐居生活。

1916年，梁在北京充当他的亲戚司法总长张耀曾的秘书。蔡元培赏识他给《东方杂志》写的关于佛教的一篇文章，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师。1917年张勋复辟时，张耀曾为张勋所迫去职后，梁就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

1918年，他父亲自杀后，他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反复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确性。他认为，思想应能提供一种人生观，它既能自我满足又能对社会和社会问题作出总的解释并能提出行动方案。由此，他从功利主义和佛教观点二者转向他自行诠释的儒家学说。

梁漱溟形成了自己的儒学观点并在讲课中加以阐述，于1921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为了表明中国文化是同近代世界有关的，他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并列为三种基本的文化形态，就主观态度或意愿而论，它们是迥然不同的，这种不同说明它们为解决周围环境所提出的问题作了不同的努力。梁漱溟认为，西方的意愿即“奋斗的态度”追求的是从外部世界或其他民族方面实现自己的愿望；中国的态度是用调整的方法来取得和谐和满足；印度的态度是逃避现实，认为意愿和求取满足都是徒劳的。梁漱溟认为这几种文化意愿是按照辩证的顺序前后继起的。西方文化当时正在上升，但必将让位于中国文化而出现更为高级的世界文化，它把前人的科学的和物质的成就与人类直观的、道德的、伦理的品质相融合。在遥远的将来，印度文化将取代中国文化而出现另一个新时代。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意在打破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偶像崇拜，并且确认解决当代中国问题必须肯定过去，因此，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关于传统观念的意义、宗教的作用、文化的性质及其变化等问题的热烈争论。但是，梁漱溟的观点并没有多少人赞同，他本人对该书也觉得不满意将它停止发行三年，准备修订后再版，但终未实现。

梁漱溟于1924年离开北京大学到山东曹州的一个中学当校长。依据他的理

论，他希望通过该校师生的努力创立一种能发展品德和智力的新教育，他还计划筹办一所大学，但未能实现。1925年，他又回到北京，与一小批学生住在一起，寻求从事一些有意义的事业。不久他对乡村建设运动发生了兴趣。

梁漱溟曾一度担任两广建设委员会主任，考察了国内一些主要的建设项目。1930年初，他辞职，与彭雨亭、梁仲华办了一所河南乡村建设讲习所，同时主编《村治》月刊。这个计划，因河南省主席韩复榘调到山东而告失败。韩不久邀请所有在河南经办这一计划的人员去山东建立同样的机构，1931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办，到1937年为止，梁漱溟是其精神上的领袖。梁漱溟认为在邹平县和菏泽县，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在全省实行的山东计划，不仅是一次小规模实验，更是一次全国性运动的必要的小小开端。

当时，梁已不再坚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关于文化的辩证发展观点，如今，他认为东西文化是不同的，因此输入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等西方政治制度是错误的。他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为名扰乱中国社会，乃是那批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攫取权力的人的不负责任的行动所造成的。因此，他想用在山东实行的计划和平地改善社会关系，其方法是通过教育建立起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的开明的领导，以及能够把地方自治和经济合作综合在一起的混合机构。他相信用正当的教育手段可以消除人们对革命的需要。但是他没有较长的时间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被迫停办了。

战争初期，梁在国防济议会及其后的国民参政会任职，他在考察共产党根据地 and 前线后，深感国共的统一战线处于危急之中，因此，他于1939年11月参与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以第三势力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维护统一战线。该会包括了一些小党派如青年党，民社党的代表。1941年，该会由民主政团所替代，梁去香港主编该政团于9月出版的《光明报》，编辑部中有黄炎培、张云川等人。12月香港沦陷，《光明报》被迫停刊。

1942年1月，梁逃到桂林，1944年夏因日军进攻，梁又被迫离去。1945年10月到重庆，任民主同盟秘书长，这个同盟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后继者。他担任此职直至1946年10月，这时，他既因建议国民政府进占东北主要铁路线而

疏远了共产党，又因调查及撰写著名的自由主义分子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情况的报告而激怒了国民党。梁漱溟离职后，留在重庆，从事写作和教书，偶然也在报纸上写些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

梁漱溟不愿参加1949年9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1月他开始出头露面，成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一名特邀代表。此后数月中，他广为旅行，考察了河北、山东、四川的乡村工作。1951年10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盖《两年来我有那些变化》，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成就，重述了他过去的观点。并说明何以他的观点未有变化。为了回答对他的批评意见，梁漱溟声称，他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批评者并没有真正涉及他与中国共产党分歧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

1953年在一次共产党领导人的高级会议上，梁漱溟强烈批评工农之间生活水平上存在的差异，被轰下讲台，幸有陈铭枢为他解围，才免受严厉处置。1955年共产党领导的批判胡风、胡适的运动中，梁漱溟也成了很多文章、学习会议中受攻击的一个目标，他被斥为反动的封建势力的突出代表，是哲学主观唯心主义的侍女，这种哲学的政治作用是麻痹群众的思想。人们还斥他和胡适是一丘之貉。梁保持沉默到1956年2月，那时，他声称他虽然欢迎批评，但又难于抑制抗拒的心情。他又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有所改进，愿意继续学习。在百花齐放运动中，他控制自己不再对政府进行批评，因而在反右运动中免于受到批判。

梁漱溟的重要著作有《漱溟州前文录》(1915—1922)、《漱溟州后文录》、《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的个人生活不详，他于1918年前后结婚，据说生有两子。

梁 思 成

梁思成(1901—)，梁启超的次子，是一名建筑学家，中国建筑史的首要权威。1945年后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49年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

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副主席。

梁思成原籍广东新会，他本人是他父亲流亡东京时在那里出生的。他是兄弟三人中的老二，另二人中，梁思永是中国最有名的考古学家之一，长兄幼年夭折。还有姐妹二人。梁思成随其父自日本回国后，1916年进新华学院读书，后进清华学堂，1924年得庚款留学美国，先进了康乃尔大学、后进了宾夕凡尼亚大学，1927年获得建筑硕士学位，1927—1928年进哈佛美术研究院，回国后任国立东北大学建筑学教授。1931年，梁思成任中国建筑研究所研究员，此后十多年中，开创了对中国建筑传统的研究工作。1932—1933年他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书，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建筑史和中国的建筑传统。在这一期间，1933年出版《大同古建筑调查》、1934年出版《清代营造则例》。1941年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五年后，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47年去美国任耶鲁大学客籍教授，1948年回国前，获得普林斯顿名誉博士学位。1948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战后初期，他在纽约任建造联合国大厦的建筑顾问。1949年中国共产党攻克北京时，他仍留在北京。

1949年北京被占领三个月后，梁思成应邀参加城市规划的设计工作，共产党召开重要会议的怀仁堂的改建工作也委托他进行设计。自此以后到1955年，梁思成完成了党交给的许多建筑方面的任务。但是他总认为共产党并不真正懂得建筑，尤其怀疑1953年提出的“实用、经济、可能条件下的美观”这个口号，公开议论其是否明智。1955年，在赫鲁晓夫在苏联作了关于建筑问题的演讲后，梁思成以其努力运用传统的中国建筑思想和方法设计新的建筑，并进行课堂教学。由于他对待中国共产党有关建筑方针的态度，而受到严厉批判。他反对拆除北京一些牌坊、御街以适应新城市建设的要求，因此也受到批判。1955年，梁思成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治疗，所以对这些批评未能进行答辩。年底他病愈后，共产党特为他组织专门的讨论会，说服他认识自己的错误，1956年初他写了检讨。在检讨中，他谴责资产阶级的建筑学，认为建筑艺术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上层建筑”，他承认自己对北京城市建筑计划的批评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在于他没有首先从政治上而是从美学观点来考虑建筑，他还进而赞扬北京的一些新的纪念性建筑很好地体现了党的“实用、经

济、可能条件下的美观”的指示。

1957年百花齐放运动时期，他提出应该让建筑师发挥更多的独立作用，但没有批评中国共产党。6月8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赞扬中国共产党是导致1949年以来中国各项成就的主要力量，他仅仅希望党更注意专门家的善意建议，取得更大成就而使将来“出现一个更新的面貌，更年青有力而更可爱”。他的文章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分子、技术专家为党所作的辩护。凑巧的是，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百花齐放的政策被正式取消了。

1957年7月14日，梁思成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检讨自己过去在建筑方面对党的领导认识不清的错误并就这一点表示深深感谢；即《人民日报》认为以前发表的一篇长文章把他与胡适、胡风联系起来是不妥当的。他又说他自己是一个民盟的成员，而他女儿则已是一个共产党员，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党员的女儿，梁说，这是新中国的一个好女儿孝心的表现。

1957年11月14日，梁思成同其他一些人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一个声明上签字，表示中国建筑学家对苏联专家的感谢，就北京而论，声明说“城市规划 and 建筑上的成就与苏联人民、政府和专家的无私援助是分不开的”。

1959年，梁思成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感谢党的正确领导，又说建筑师们也懂得了“群众路线”并且已按照群众路线的要求进行建筑设计。1961年他再次说到，一座建筑物的效果在有限的范围内取决于它所使用的建筑材料，但主要的因素却是社会阶级的美学观点。这个声明引起了一场讨论，建筑材料到底在多大的范围内决定建筑的方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技术专家的在多大的程度上表现自己的意愿。

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梁思成还担负了一些行政职务，1949年，1955年，他被选入北京市政府。1953年9月，中国建筑学会成立时，他被选为理事会副主席之一。同年，他去苏联作广泛旅游并访问了布拉格。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5月，他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52年清华大学改组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后，他继续担任该校建筑系主任。1959年3月，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候补党员。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中国建筑传统的精深

研究，是这个领域公认的一名权威。梁思成的不少旧时学生在国内外建筑界都有重要地位。

梁 思 永

梁思永（1904—1954，4，2），梁启超的幼子，中国考古界的先驱者之一，1954年8月去世。他在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梁思永是梁启超、李惠仙的幼子，他家虽自1901年起流亡在东京，他却出生在上海，原籍广东新会。梁幼年在日本受业习读中国典籍，全家回国后他于1917年进新华学堂上学，后进清华学堂，1921年，他和其兄梁思成、陈训慈合作翻译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梁启超为之润饰，于1923年分成四卷出版。1923年，兄弟两人在北京遇车祸受伤，但不甚严重。

1924年，梁以庚款去美国留学，进杜特孟学院，主修历史科。1927年毕业，7月回到中国，希望能参加李济主持的山西夏县考古发掘，但他到中国时，这项工作已告结束。主办夏县考古发掘的清华研究院，聘他为副教授，使有可能研究李济发掘所取得的史前时期的陶片。

1928年8月，梁去美国哈佛大学从事考古学、人类学研究工作，他又参加了阿尔弗雷德吉达领导的美国西南地区佩科遗址的发掘，受到了一次极有价值的现场训练。他在获得考古硕士学位后，于1930年夏回国，进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0年秋，梁启超的至友及其传记作者中央研究院董事长丁文江收到一个法国教士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的一封信。说中国中东路上的一个苏俄雇员在黑龙江昂昂溪附近发现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丁文江把这消息告诉了梁思永，历史语言研究所遂派他前去实地考察。从9月30日起到10月3日，梁由俄籍工人卢加希金协助，发掘该遗址。他们发现了三百多件石器、骨器、陶器遗物，还发掘了两座墓穴。梁思永就这些文物以及卢加希金以前收集的七百多件遗物作了研究，结论是昂昂溪文化系蒙古热河一带细石器文化的东支，因此他决定取道热河回北平，以便考查其他史前遗址。他于10月21日从通辽出发，西

向林西，南去赤峰、承德，11月27日到北平。他又去城子崖协助李济、吴金鼎发掘龙山文化遗址。

1931年，11月7日到12月9日梁思永和李济在安阳进行第五次后岗发掘，第一次发现了仰韶、龙山、殷墟遗址前后相继的地层。1932年春，梁思永患肋膜炎，因病卧床两年，1934年秋才恢复工作，在南阳侯家庄现场主持进行西北岗发掘工作。10月3日到12月29日，发掘了四处大墓葬，发现了上千件石器用具，梁认为侯家庄是小屯殷都的墓葬之地，李济也同意这个结论。于是，对这个新遗址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此项工作顺利进行到1935年。1936年，梁思永以大部分时间在山东两城镇发掘龙山文化遗址，并对安阳小屯的发掘进行检查督促。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梁思永帮同把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其文献资料迁往长沙、桂林、昆明、最后迁往四川南岸的李庄。战争期间，他奋力工作，身体受损，于1941年夏初患肺病，以后他就常常卧病在床，1945年经大手术取去几根肋骨，1946年回北平长期修养。由于对中国考古学所作的贡献，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国共内战进入高潮时，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梁决定留在北平。

1950年8月，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任梁思永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虽然身体不好，但仍为该所筹划了大量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1953年9月，他因病离职半年，1954年2月决定进医院检查身体，发现有严重的心脏机能的紊乱又有肺病，1954年4月2日死在北京。

梁思永是一个出色的学者和循循善诱的师长，他的主要贡献是将严格的合乎规格的发掘方法引进中国，鉴定了西北岗的墓葬，并与李济一起确定了后岗的地层年代，他的学术著作不多，但却很重要，他对昂昂溪墓穴的记录被视为对东北古代文化所作的经典式研究。他是李济关于龙山文化所作的分析《城子崖》报告的主编，被许多中国考古学者作为范例加以引用。梁思永关于考古的文集《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于1956年在北京出版。

廖仲恺

廖仲恺，原名：廖恩熙（1878—1925.8.20），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国共合作的主要设计者，这个合作导致国民党依照列宁主义路线进行了改组。1925年被刺时，担任广东政府财政部长、广东省长兼财政厅厅长，国民党工人部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和国民党党军的党代表。

廖仲恺出生在旧金山的一家华侨家庭，早年在美国上学。父亲经商，廖仲恺显然是在舒适的环境中长大的。十七岁时，陪送患病的母亲到了香港。他在那里和何香凝结婚，何的父亲是一个富裕而著名的茶商。1902年何家资助这一对青年夫妇到日本继续求学。廖仲恺进了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

廖和何不久对孙逸仙的反满革命运动发生了兴趣，1903年夏，他们遇见孙逸仙后，成了他的事业的积极支持者。1905年夏廖仲恺和胡汉民同到广州，他回日本后就加入了新成立的同盟会。当时孙逸仙对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学说极为注意，嘱廖仲恺将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乏》的一部分译出，廖以“屠富”的笔名译出该书的序言，在同盟会的《民报》第一期上发表，该报1905年11月创刊。廖仲恺的其他早期著作反映出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和一定程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几个月后，孙逸仙命他去天津，他在那里从一位法国武官布加卑处收集到一些华北反清活动的情报，任务完成后又回到日本，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经济学。1909年毕业后回国应试中举人，入吉林边防督办大臣陈昭常幕，陈当时正与日本谈判收回中朝边境上的延吉地区。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发生后，广东宣告独立，胡汉民成为都督，邀廖仲恺经管广东财政。廖仲恺携全家移居广州，全力以赴经管广东省财政，并提出许多重大经济改革措施，但因很少付诸实施而收效不大。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廖仲恺与国民党其他领导人避居日本，其妻和孩子们随他同去，他们住在东京直至1923年。1914年孙逸仙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廖仲恺协助他经管党内财务和筹划党的活动。1916年3月，随孙逸仙回国。6月，袁世凯身死，孙逸仙指派廖仲恺、胡汉民去北京，与北洋政府权要人物

商讨国是。1917年随孙逸仙去广州，再次负责该地区的财务，被誉为国民党首要的财政专家。1918年底孙逸仙对自己在广州的地位感到不满，廖仲恺和其他几个孙的亲密支持者陪同孙前往上海。

1919年到1920年间，廖仲恺多次在新办的《建设杂志》上撰文阐述孙逸仙的经济理论，该刊首次出版于1919年8月。这些文章的主要论点是：由于中国工业落后，又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中国国民经济的建设，必须采取社会主义道路；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实际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组织消费合作社，以避免自由放任经济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他关于币制改革和币制建设的著作，主张放弃硬币，改用纸币，这种意见为1930年的币制改革所采用。廖仲恺还译出威尔科克斯的《全民政治》一书，以帮助孙逸仙形成自己的政治哲学，孙从此书吸取许多东西制定和发展自己的“民权主义”。

1921年5月，孙逸仙任广州政府非常大总统，委任廖仲恺为财政部副总理（该部名义上由伍廷芳领导）、广东财政厅长。廖仲恺的主要任务是筹措足够经费支持孙逸仙进行北伐。孙逸仙与广东省长陈炯明因省内政务发生冲突，廖仲恺被免去财政方面职务，但在1922年春孙逸仙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职务后，又让廖复职。1922年6月陈炯明部下在广州发动叛乱，孙逸仙被迫离开广州，廖仲恺被陈监禁于石龙达二月之久。

廖仲恺关心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多年。1922年，孙逸仙和廖仲恺开始讨论和苏俄合作争取苏俄援助的可能性。1923年1月，孙逸仙同苏俄外交人员越飞在上海首次谈判后发表联合宣言。接着，越飞去日本。约在同时，廖仲恺以看望其弟廖恩涛为名也去了日本，廖恩涛当时是北京政府驻东京的外交代表。廖仲恺同越飞在日本热海温泉宾馆谈判，拟定了双方合作的详细方案，其中包括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内容。

廖仲恺在日本谈判时，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孙逸仙重回广州，成立大本营。1923年5月，廖仲恺携全家回国，任财政部长、广东省长。随着按照列宁主义路线改组国民党的计划的制订，廖仲恺在党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10月，他被任命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委员，11月去上海与国民党各支部代表商议。1924年1月，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廖仲恺被选

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工人部长，同年晚些时候，又兼任其他一些重要职务：中央银行行长、国民党农民部长，9月，又全权负责掌管广东全省财政。

1924年2月，蒋介石辞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七人委员会主席之职，由廖仲恺代理。5月，黄埔军校开学，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作为黄埔军校最高政治官员，他致力于奠定在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中设立政治委员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以后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双方所采用。

1924年中，廖仲恺作为孙逸仙的亲信和国共合作的主要设计者，成为广州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6月他重任广东省长，9月去职，以便集中精力专任财政部长和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并做好军需工作。1924年10月，廖仲恺协助蒋介石先平定广州商团事变，1925年3月，又助他制定东征讨伐陈炯明的计划。东征胜利结束时，孙逸仙在北京逝世。廖仲恺、蒋介石于是调集军队击败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的部队。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省港工人游行示威，遭到帝国主义的镇压破坏，6月23日，英法军队开枪打死工人学生五十二人，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工人部长，在组织和指挥罢工和抵制英货的活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这些活动导致广州和香港地区经济活动的瘫痪，同时又巩固了国民党在广东的力量。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廖仲恺成为政府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三人委员之一，军委是国民革命军的最高军事机构。由于他是孙逸仙联俄、联共政策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他就成了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人物。因而，被提升到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仍保留财政总长、广东省长兼省财政厅厅长、国民党工人部长、黄埔军校和党军的党代表等职位），这被看作是1925年7月国民政府改组后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的胜利。权力集中到廖仲恺手中，他又坚定而热情地运用自己的权威实施孙逸仙的革命政策，这一切招致了许多国民党保守派的敌视。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乘车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刚一下车就遇刺被害。

谁是刺杀廖仲恺的主谋始终未能查实，由国民党首脑人物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把谋杀案归罪于由英国方面收买的右派人物，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和粤军中的某些军官也受到怀疑。胡汉民、许崇智等人因舆论的责难，不得不开离广州，另外一些右翼分子也纷纷离开广州，国民党左派不久就控制了国民政府。

廖仲恺受到国民党同人，其中包括蒋介石的高度赞扬，他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特别为人颂扬，因为这次改组为尔后的北伐进军开辟了道路。廖仲恺也受到民国初期共产党历史学家的尊敬，因为他对孙逸仙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廖仲恺身后遗有亲属：夫人何香凝、子廖承志、女廖梦醒。他的女儿曾在上海担任过宋庆龄的秘书。1949年后，他们三人都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廖仲恺的通信、序言、经济和政治论文于1926年以《廖仲恺集》出版，修订增补版于1963年在北京出版。

廖 平

原名：廖登廷

字：学斋、季平

号：煦陔、四益

廖平（1853.3.29—1932.6.6），教育家，有争议的一名公羊学今文派学者，他的著作对康有为、顾颉刚等学者颇有影响。

廖平的出生地是四川井研，他父亲先是饲养牲畜，后来有了一所磨坊，但家境仍是清贫，四个孩子不得不外出谋生。廖平立意习读中国典籍，遂离家到一所寺庙去，后在本乡就学，又去成都在崇精书院从王闿运就学，成绩优异。1879年中举人，1881年中进士，他因不愿远离患病的父母，未去就县知事职。回四川后在一些省立学校教书，以后在成都定居，主持国学院，并在成都高等师范、华西联合大学教书。

廖平是今文学家，他认为官方认可的古文经远较前汉的今文经为差，他以公羊、穀梁传为真传，而以左传为汉刘歆所伪造。1886年，廖平的《今古学考》出版，即为康有为所重视，此书后分为《批刘篇》、《知圣篇》二书，在后一本书中廖平声称真实的今文经典籍，说明孔子是主张改命制度的。1890年，康有为与廖平会见后，出版了《新学伪经考》，声称他已经发现了刘歆的伪作。此书使他立即在学术界取得盛名，并引起一场热烈争论，结果导致该书于1894

年被查禁。1897年，康有为又出版了《孔子改制考》，此书采用并阐发了廖平的观点，廖对康有为的抄袭虽感不快，但在行动上没有作出反对的表示。

廖平自称他的学术观点经历过六个阶段，因此把自己的书斋称作以“六释馆”，事实上，连他的亲密朋友也难以弄清楚这些变化。一般说来，他在开始时似乎接受东汉学者的传统观点，他们并不怀疑《王制》、《周礼》。他于1896年所作的《古学考》却以《周礼》为刘歆所伪造，后来，在《王制集说》《皇帝疆域图表》中他认为《王制》《周礼》是中国古代皇帝用以统驭国内并作为控制全球所有国家的指针，最后他修改了自己过去的立场，承认孔子是古代经典的作者，然而，他却把《礼记》、《春秋》、《尚书》作为仁学，把《诗经》、《易经》、《乐经》为天学。这种分类法引起研究古代典籍的学术界的极大争论。

廖平除研究儒家经书外，还写了一些关于风水及医学方面的文章。他在1897年前写有关古代经典的文章，编集在《四益馆经学丛书》中，计十四册，1921年又在成都出版了篇幅大为增加的《新订六释馆丛书》，其中也收集了他的医学著作。

1924年，廖平退休不再教书，1932年6月6日死在四川嘉定附近的家乡。

林长民

字：宗孟

林长民（1876.7.16—1925.12），学者，政府官员，毕生致力于在中国实现立宪主义和议会制政府，1925年郭松龄起事反叛张作霖他参加郭部，不幸过早去世。

林长民出生在杭州，原籍福建，他幼时在其父开办的家塾就学，其父林小泉是个翰林，致力于西方政治理论的研究。教师中有教授中国典籍的林纾，教授西方学科的是林万里。

1897年林长民中秀才后进杭州语文学堂学习英语日语，1902年曾短期去日本，杭州语文学堂毕业后，去日本进了早稻田大学。同班日本同学中以后闻名

的有中野、风见等人，林于1909年以政治科优等生毕业。在日期间，他是福建学生会会长。他的朋友中有犬养毅、尾崎行雄等人，他又结识了张謇、岑春煊、刘崇佑、汤化龙、杨度、宋教仁等人，他对宋教仁尤为钦佩。林长民认为作为政治家，必须心胸豁达，因此为了中国的前途，他甚至与一些政见分歧的人亦常交往。

他1909年回国后，拒绝参加留学归国学生的进士科考试。当时，福建咨议局副局长刘崇佑推荐他任该局书记长，他应命赴任。1909年冬，各省咨议局代表齐集上海成立请求实施宪政同志会，林任书记长。接着，他到北京与立宪派徐佛苏在《国民公报》上鼓吹宪政，从而促进社会舆论并导致清政府缩短了预备立宪的时期。

林长民当时还兼任福建法政学校教习，但与当地著名保守派分子校长郑友其发生冲突而被省督学解职，林得到省咨议局同仁的帮助，自行创办一所法政学校，以后毕生为此校的发展效力。

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时，林长民在上海《申报》馆工作，是年冬季各省代表在上海开会讨论成立政府，推举总司令。林提名黎元洪，陈其美提名黄兴，双方发生激烈争论。此后不久按照临时大总统孙逸仙的命令，每省选派代表三人组成临时参议会，林系福建代表。1912年春临时参议会迁往北京，林当选为秘书长。翌年经选举产生了国会，林作为外蒙三音诺颜布的代表当选。4月，国会成立，林任秘书长。

林长民能言善辩，熟悉议会工作程序。1914年，袁世凯下令，在参政院下设立宪法起草委员会，林负责安排议事日程、工作细则和总务工作。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林与友人张国淦等人力求恢复临时约法和第一届国会，由此导致孙逸仙的护法之役和蔡锷、唐继尧的护国军活动的终止，从而实现中国南北两派的暂时统一。

林长民系进步党成员，进步党有四项政纲：贤良政府、尊重舆论、保障自由、造福人民，它主张与掌权的政府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希望能由此不经革命而通过劝导达到成立立宪政府。这种主张是与国民党的立场不相容的，尽管国民党和进步党于1916年8月第一届国会恢复后曾一度合作起草《天坛宪草》。

1917年5月间，因中国是否对德宣战发生政治斗争，结果导致国会解散。

当宪法起草时，林长民参加了“宪政研究会”，因此被人因为“研究系”的台柱，事实上，它只是一个宪法研究机构，并无政治的或政党的纲领，也从未形成一个政治团体。

1917年国会解散后，林长民成为副总统冯国璋的秘书长。两个月后，段祺瑞驱逐了打算恢复溥仪帝位的张勋重新掌权，请进步党领袖入阁，林长民、梁启超、汤化龙都接受邀请，林任司法总长。三个月后，进步党决定退出段内阁，林以对党负责也辞了职。林在司法总长任内，因拒绝张镇芳十万圆贿赂而受到好评，张因参予复辟活动被判刑，竭力活动企图得到特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当时任总统的徐世昌，成立外交顾问委员会，以汪大燮为委员长，林长民为政务次长，林鉴于日方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将对英法施加压力使其允许日方取得德国及在山东的利权，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山东完矣！》一文警告国人，这篇富有战斗精神的文章唤醒了公众，也促成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当此时际，林所在的委员会还提议统一全国铁路，以对抗日本垄断东北铁路的意图。这项提议未为徐世昌接受，委员会遂即自请取消，自此，林被人们视为反日派的首领。

国联成立后，林长民和蔡元培、王宠惠等人组织了一个中国国联协会，林任会长。他和王世杰、张嘉森参加了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国联协会大会，林还出力组成了亚洲文化协会和讲学会，讲学会邀请了世界知名的学者杜威、罗素、泰戈尔等人到中国来讲学。

1920年夏林长民到英国访问。1920年—1921年，他在英国逗留期间，了解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经济理论，对威伯夫妇的著作尤感兴趣。他遍游欧洲各地，对战后布尔什维主义的广泛传播印象极深。1921年10月，林回国，与梁启超、蔡元培、王宠惠一起主张恢复第一届国会实施宪法，他们的建议被顺利接受，在黎元洪任总统期间，第一届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均告恢复。1922年年中，林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就欧洲考查所得，竭力主张在宪法中专门规定有关劳工制度的条文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滋长，他告诫说：“十九世纪中各国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立宪政府，而二十世纪的人民却在为自身生活而

斗争……谁又能保证布尔什维主义不在中国横行呢？”林长民对宪法中有关经济民生条例进行考虑时，表现出他在这方面才识丰富，专心致志，因此他被同仁推举为主要起草者和草案的报告人。正当经济组的条文三读通过时，曹锟属下的直隶军阀逼迫并贿赂国会议员选举曹锟为总统，非法地仓促通过了所谓曹锟宪法，取消了林长民认为极其重要的有关民生和地方自治政府的条文。

林长民经此事故后极为沮丧，他离开北京，和起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如章士钊、杨水泰等人发表声明谴责曹锟宪法，又提出了十四条宪法修改意见，其中有一条规定现役军人不得担任总统。

1923—1924年间，西原借款案在国内引起公愤，此案是日本实行新的“外柔内刚”政策的一个措施。林长民认为这种政策最终对中日双方都有害，并将威胁亚洲和平，于是写了一本小册子《敬告日本人书》，指出这是一种“自杀政策”。这本小册子译成日文，在日本国内和驻华日本军方人士中都引起重视。

1924年段祺瑞在北京重任执政，林长民任善后会议成员，后又受命筹办全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其中约有七十人由中央政府指定，其他由各省推举。该委员会原定于三个月内完成宪法起草工作，1925年8月开会，推举林为首席，前后举行会议四十七次，议定宪法十四章一百六十条，其中反映了林长民关于地方自治和中央联邦制相结合的思想，它并规定，国家预算中的教育经费不得少于政府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并规定设立国事法院以解释宪法。

宪法草案正提请政府考虑时，北京发生了兵变。曾以驱逐曹锟支持段祺瑞的冯玉祥，改变自己的政策，图谋拘捕段祺瑞。此时，冯玉祥已成功地说服了奉系前线司令之一和张学良的亲信郭松龄起兵反对张作霖。负责北京卫戍的冯玉祥的一名部下开始搜捕段祺瑞的亲信，北京通往外地的道路都由冯玉祥的部队驻守，防止段的同伙逃逸。林长民因支持段祺瑞，所以他的生命也岌岌可危。可是他却收到郭松龄的密信，郭因钦佩林的声望和政治家风度，劝他参予义举。这封密信由冯玉祥的支持者京汉路局长王乃模送到。为了表示诚意和迫切之情，郭不待林覆信，即派专车到北京迎接他，专车在北京东站等了三天。林认为拒绝此请，必有危险，遂借此机会脱逃，1925年11月30日午夜他离开北京，在郭

松龄副官的指挥下专车一直开到沟帮子，林与郭在此第一次会面。

林长民与郭松龄相见后，准备渡辽河去营口，但他发现辽河冰冻不够结实不能通车，乃不得不随同郭部前进，郭部初获小胜后在白旗堡被由日军援助的黑龙江骑兵击败，郭本人被捕处死，林在苏家屯中流弹身亡。

林长民的好友梁敬惇和林的弟弟福建电力公司总工程师林天民去大连收取林的遗体，据他们说，林与郭之间并无政治交易，林不过是想借此机会逃出北京以免受政治迫害。郭很重视林的作用，因为他听说林在日本人中享有声望，他打算利用林同关东军谈判以减少其部队前进的阻力。但是林长民的一些对手和他的另一些朋友则认为他遭此不幸是由于他投机取巧所致。

林长民擅长书法，又颇有做古诗的才能，在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后，他有时还写写白话诗。他禀性浪漫，常常感觉到“不知如何满足自己过度的情欲”他本人的婚姻却并不理想。他从欧洲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作关于恋爱和婚姻的演讲时，常常间接引用他本人的经验。他的妻子叶氏早年即去世，他死后遗有妾二人，四子、二女。长女林徽音嫁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

林 献 堂

字：灌园

林献堂(1881.12.22—1956.12.8)，台湾著名的实业家、银行家、慈善家。1945年前曾多年为争取改善台湾人民的政治和教育状况而努力。1950年到他去世之前，住在日本。

林献堂原籍福建漳州，出生在台湾彰化的一个富绅家庭，父亲林万安是清代举人，台湾割让日本后，从事樟脑贸易。林少时由塾师授以中文典籍。1895年中日战争发生后，台湾局势混乱，他全家逃回福建泉州，于1896年，返回台湾。1900年，他父亲去世，林继承家业，并成为当地雾峰村的村长。

1907年，林献堂因商务去日本，遇见了梁启超，以前他们曾通过信。这次会见，对林的政治观点和尔后的经历颇有影响。据说，梁启超曾建议林，在为台湾人民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中不宜采用暴力而应采取合法手段，在与台湾殖

民政府交涉时可采用爱尔兰人的手法。梁告诉他，台湾领袖人物与日本国内的日方人士直接接触可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并有利于同台湾的日方总督相抗衡。林曾邀梁启超去台湾访问，1911年梁启超终于有台湾之行。此行似乎加强了林与中国在感情上的联系，因为他曾于1913年旅行去北京。

林献堂积极致力于争取改善中国人在台湾的政治和教育地位。1914年他出资创办台中中学(即省立台中第一中学的前身)，并参加了坂垣助所创立的台湾同化学会，其宗旨在争取台湾的中国人的统一和平等权利，但因日方总督和日本居民的反对而未有成就。林于是反对1897年日本国会通过的一项临时法令，这个法令使日本总督在台湾颁布的各种法令具有日本法律的全权。他以个人名义向许多官员提出申请并且组织台湾中国学生发起请愿运动，但毫无效果，1921年该法令成为一项永久法。与此同时，林又从事活动创立一个拥有有限权力的议会。他的言论，为台湾人士所衷心拥护，但他集众写给日本国会的请愿书却毫无反应。1923年，日方镇压了这些运动，取消林的顾问职位，并逮捕了其他几名为首人士。

在此期间，林献堂还从事文化和商业活动。1921年台湾医校组织了“台湾文化学会”，林任会长。1923年任《台湾民报》社长，1926年加入新成立的“大通信托会社”，该组织是为保护台湾人民的商务权利而建立的。

1927年，林献堂离台湾去欧美游历，部分原因是和“台湾文化学会”的一些首要人士不和。他就此行写了一本《环球游记》。他回台湾后，任《台湾新民报》馆社长，该报社于1930年合并了《台湾民报》。但是《台湾新民报》直至1932年都未获准出版，而到1932年林已不再任该报社长了。

1932年，日本政府准备限制台湾大米运销日本，林代表台湾农民的利益提出抗议。由于，他本人拥有大量土地，又由于他既有财富又有声望，日本总督府经常同他磋商并征求他对地方事务的意见。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受失败，日本政府遂提名林为在东京的日本参议院议员。

1945年秋，台湾正式归还中国，林献堂声明支持国民政府，10月25日任庆祝收复台湾大会主席，欢迎新任行政长官陈仪。1946年任台湾临时省议会议员，1947年任改组后的重华银行信托部主任。台湾公众对陈仪等人的无能、专横、

残暴十分不满，这种愤懑之情于1947年2月28日达到高潮，当时在台北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陈仪的宪兵向示威者开枪杀害数人，几乎引起了全岛范围的反抗。陈仪于是进行残酷镇压，台湾人民有数千人被杀害。他于是被免职，1947年4月，省政府正式成立。但是，创伤已经留下，在台湾的许多中国人包括林献堂在内，对国民政府及其政策开始采取严重的保留态度。1950年，国民政府从大陆逃亡到台湾后，林献堂转往日本，一直到1956年9月8日去世。遗有妻杨水心，子三人，女一人。

林献堂的旧体诗颇为有名，他的三本诗集已出版。他还创办过几个诗社，并且担任过1948年建立的台湾档案馆的主任。

林 可 胜

西名：罗伯特

林可胜（1897.10.15—），林文庆的长子，知名的生理学家，1924—1937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1937—1942年任红十字会救护队主任，1938—1942年任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主任，1945—1948年任中国陆军外科主任，1949年去美国，1952年参加米尔实验室工作，1962年任该室医学研究主任。

林可胜是林文庆的长子，生在新加坡，原籍福建厦门。他在英国读完中学后，依他父亲的先例进入爱丁堡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辍学，在英国派驻印度的军队中服务。后回爱丁堡大学，1919年获得学士、硕士学位，任该校生理学系组织学讲师，192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取得高德绥纪念奖金，1923年前一直在爱丁堡大学，1923年获得洛克菲勒基金去芝加哥大学留学一年，1924年获得爱丁堡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一直到1937年年中。

二十年代初，林可胜就把自己的研究报告发表在中国、英国、美国的生理学杂志上。他创办了“中国生理学社”，并自1927—1941年任该社杂志总编辑。1928—1930年，任“中国医学会”主席，1933年任红十字救济会主任，

1936年任“华北农业复兴会”主任，中央研究院理事。

1937年秋，林可胜利用一年的假期去欧洲前，被召往南京。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时，他负责照料中国红十字会的剩余物资并组成红十字救济队，他任主任至1943年，在他的指导下，救济队建立了援助军队的医药供应系统，向前线派遣了一百多个医疗队，并建立了拥有二百辆救护车的医疗车队分赴各个战地。1938年他开办战时卫生学校，训练民用军用医护人员，1942年该校扩大规模，在贵阳设立中心学校，在各个战区成立五所分校。据估计共训练了一万三千多名医护人员。

1942—1944年，林可胜在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驻缅甸远征军中任医药顾问，1942年5月，他率领中国军医院的人员经蒙自撤往丽多，1944年任中国陆军外科副主任，1945年任主任。1945年战争结束后继续担任此职，以便恢复医学方面的服务工作。他创办了国防医学院，计划把一些医务人员作为研究生送到美国进修。1948年国民政府任他为卫生部长，他未接受，并辞去军中职务。

1949年，林可胜去美国在芝加哥伊利诺大学任临床学客籍教授，1950—1952年在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任克莱顿大学医学院生理药物系主任，同时参加了印第安纳州爱尔卡特的米尔实验室的工作，任生理药物研究主任，1962年任医药研究所主任。

林可胜出版的研究报告中有一批是关于胃的组织、胃病药物方面的，其中包括止痛、血压过低，以及麻醉剂的广泛研究。作为一名在军队中服役的人员，他得到过中、英、美等国政府的嘉奖，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得到过几个外国学术和专业学会的荣誉学位。1961年，香港大学曾授予他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林可胜曾两次结婚，他第一名妻子是英国人玛格丽特，1936年死去，遗有两个孩子；1946年他在上海又与张人傑的女儿张健英结婚。

林 森

别名：林长仁

字：子超

号：青芝老人

林森（1868—1943.8.1），反清革命党人，国民党元老，1932—1943年任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生在福建闽侯，他父亲经商，林森三岁时，全家迁到福州。他在受了一些旧式教育后1877年进了一所教会学校，1881年进福州美以美教会办的英华学院，1883年毕业后去台湾，1884—1895年在台湾电报局工作。在此期间他曾四次回福州：1888年探望父母，1890年回家结婚，1892年探望留在福州当时医病的妻子，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他离开那里。1898年他再次去台湾，这时他已献身于反清革命事业，他想把日本赶出台湾，并希望以此作为进行革命的据点，后来发现这计划不切实际而于1899年回到中国。

1902年，林森到上海，在中国海关找到工作，不久，与一些福建籍学生组织了一个反清的革命团体福建学生会，并在福州建立分会。学生会成员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大都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林森调往九江海关，他得到吴铁城等人的帮助，办起了阅览室传播反清文件，同时又在新军官兵中进行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劝说九江守军司令支持革命，并对长江清军水师起义起了重要作用（水师官兵大都是福建人），九江成立共和政府时，他被推选为民政部长，但拒绝就任。而以江西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出席大会参加选举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林森当选为参议员，不久任议长，1913年初，袁世凯开始反对新成立的国民党，林森发觉不能再在北京长住，遂弄到一张出国护照。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11月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宣布国民党为非法。林森身有护照，12月间很容易离开北京，登船先去日本后又去美国。他在日本时拜访了孙逸仙，这时孙逸仙正在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林在向孙效忠的个人誓言上签了字。孙了解到林的今后去向，给他一份电报密码簿以便到美国后与他联系。

林森于是到了夏威夷，在各岛游历数月。当时冯自由去美国主持党务，在檀香山暂停，遇到了林森，邀他共去旧金山。两个月后，林离开夏威夷与冯自由

会合。林在离夏威夷前，建议国民党同志前去探访吴铁城请他帮助出版国民党的报纸。林到旧金山时，冯自由任国民党美洲分会代理会长，该分会在美国登记为中国国民党联盟。林森任代理副会长，1914年末被选为会长，以冯自由为副会长。

林森在美国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募款支持国内的反袁斗争，他以国民党美国募款主任身份，到过美国各大城市及古巴。1916年6月袁世凯死时，他已募款一百多万日圆交给在东京的孙逸仙。他又首次提出一个训练中国空军驾驶员的计划，第一批选送受训的学员中有陈庆云、黄光锐等人。

1916年，林森回国到北京，这时国会正在重开。1917年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引起了国会危机，内阁总理段祺瑞解散了国会，由此而引起了护法运动。林森为首的一些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成军政府，以孙逸仙为大元帅，1919年3月军政府改组，孙逸仙辞职去上海，林森和伍廷芳亦到了上海，1921年又随孙逸仙回到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逸仙为非常大总统，1921年5月5日在就职典礼上，林森以参议院议长身份向孙逸仙授以当选证书和印章。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控制了广州，孙逸仙再次去上海。10月，许崇智率东路讨逆军进入福建，10月攻克福州，林森出任福建省长，11月10日就任。1923年初，孙逸仙回广州，重新主持南方政府，派林森到广州筹建1911年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纪念碑。7月，林森任建设部长。当孙逸仙准备改组国民党时，林森为10月25日建立的九人临时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林森在会上被选为二十四名执行委员之一，同时，任国民党海外部主任。

1925年3月孙逸仙去世，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林森当选为十六名国务委员之一，当时他在北京和邹鲁密切合作，一起主持华北党务。11月，包括林森在内的十名反共的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开会。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对西山会议派进行纪律制裁，并且警告他们倘若继续反对国共合作即将他们开除出党。4月，西山会议派首领在上海召开反对派的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并选出以林森为首的反对派的中央执

行委员会。1927年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一派分裂之际，情况更为复杂了。1927年9月，组成了由武汉、南京、上海(西山会议派)各派成员参加的特别委员会，国民党得以重新统一，林森系来自上海西山会议派的主要代表。当时，委派了他和邓泽如负责督促在南京建立孙逸仙陵园的工程。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实施五院制，林森任国务委员，立法院副院长，院长为胡汉民。林森当时又兼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0年又兼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同年冬，他去菲律宾、澳大利亚、美国、欧洲、东南亚视察海外党务，并为筹建中央党部募款。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逮捕胡汉民，委任外出的林森为立法院长，以邵元冲为副院长。4月30日，林森和另三名中央监察委员萧佛成、古应芬、邓泽如提议弹劾蒋介石，其结果是在广州成立了对抗政府。支持新政府的人士，除上述四人外，还有陈济棠、汪精卫、孙科、陈友仁、唐绍仪。内战爆发在即，后因九一八事变日军侵略，国民党重归统一。林子10月回国到南京，在尔后不久进行的国民政府改组中，林森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他任此职一直到1943年死时。他名义上是国家元首，但既无具体职责又无实权。

1943年5月10日，他驱车由办公室到住地时遭遇车祸，受到严重震伤，但他在5月12日仍去国民政府机关接见挪威大使，同日发生休克，8月1日死在重庆。国民政府为纪念他，把闽侯县改名为林森县。

政治学家钱端升对林森后期的经历作了恰如其份的概述：“林森在政治上并不重要，但这样说是并不过分的，即很少有一个民国年间的国家元首受到国人如此的尊敬和爱戴。他在体形上具有庄重的风度。他在政治上是国民党元老和议会活动中的重要人物，他生活朴素，毫无个人野心，不任用私人，这在当时的掌权者中是很少见的。他不仅遵守法律条文还重视其精神实质，他从不超越1931年12月组织法规定的范围去行使权力。但也并不消极。他确实以国家利益为重，他作为党的政治委员会的成员在为国家利益讲话时是从不犹豫的。更有甚者，他在战争开始以前即为国家的统一而努力，在战争到来以后又为争取胜利而操劳。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好主席。如果说他的仁慈的影响尚未为人们更广

泛、深刻地感觉到，那只是因为他的明智的告诫没有得到应有的认真对待”。

林 纾

字：琴南

号：畏庐

冷红生

林纾（1852.11.8—1924.10.9），西方小说的第一个重要的中文译者，他又是最后一批古体散文著名作家之一，他公开反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而为人周知。

林纾生在福建闽侯县，出身农家，家境贫窘，一月内常有五六天断炊，他八岁时，一家九口，凭他母亲和姐姐作女红谋生。他母亲出身于书绅之家，不久发现他生性好学。当时，他叔父幸获一职，每月寄些钱回家使林纾能在村塾上学。林十岁时，他父亲在台湾官府中觅得录事的职务，家境略见好转。五年后，林去台湾与他父亲会合，约于1864年，与闽侯县的一女子结婚，1870年他父亲死去，由岳父资助上学。

林纾曾一度在福州书院上学，1872年，辍学教书，此时他得了肺病，以后虽然痊愈，但此后八年中仍经常患病。1879年二十七岁时中秀才，他在一家富户李宗言的书斋中读书提高了文学修养，并于1882年中举人，同榜有后来成了满洲国内阁总理的郑孝胥。他们以后成了至友。主考官为满族宗室诗人兼维新派分子宝廷，他的儿子寿富，以后也和林成了朋友。

林纾在中举人之后，在科举考场上不再得志，1883—1898年间七次进京会试均告落第，这是林纾忧患交加的年代。1895年第六次进京会试后回家，母亲病重，并于12月去世，1897年他妻子因肺病死去，此后两年中，他的长女和长子亦患上肺疾。为了遣散林纾的忧患，他的一位曾在法国留学的朋友王子仁建议共同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先由王口述，然后由不懂法文的林纾译成中国古文，结果成了由林纾的朋友汪康年（1860—1911年）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销售数千册，茶花女的故事在文学界广为传诵。

1898年春，康有为等人的变法运动，因德国占领胶州，俄舰驶进旅顺，声势壮大起来。林纾并非康有为一派的人，当时他在北京，应第七次会试，与寿富等友人也反对德国占领胶州并上书朝廷要求实行政治、财政和军事改革，他们的呈文为清廷权贵所阻，根本没有送交给皇帝。不久林纾回福建，继续从事维新活动，写了三十二首半文半白的诗，提倡女子教育，废除缠足，减税，改善社会状况。

1898年底，林纾去杭州，在那里教了三年书，闲暇时读读中国古书，还游览杭州美丽的风景，这为他以后的风景画提供了题材，他当时的一些语体诗发表在《杭州白话报》上。

1901年，林纾去北京五城学堂教书，当时他与魏易合作，翻译了斯土活的《黑奴吁天录》，不久遇见了相城派古文最后大师之一的吴汝纶。1902年吴汝纶当了京师大学堂（后改为北京大学）总教习，林进了该校以严复为首的译书局。约在1905年他也成了京师大学堂的一名中国文学教师，1909年成为文科教长。

林纾对1911年的革命虽然毫无作为，但从他在1914年写的《金陵秋》等小说看来，他对青年革命党人显然还是表示同情的。但是不久，他对新秩序开始不满，特别是当这种新局面影响到北京大学时。那里以林纾为首的桐城派教席的地位，逐渐被另一些学者如文学学家、古文批评家章炳麟等所取代，1913年林乃不得不辞职。

1915年林纾与北京大学的同事，桐城派的另一著名文人姚永楷应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之请去成志中学教书，徐对林十分敬佩。林当时还主持了一个中国文学函授机构，据称，前后报名入学的国内及东南亚学生共有二千人之多。

林在晚年，由于国内知识界的思想激荡及其高潮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他的影响和声誉迅速下降，他的忠于清室的政治情绪以及与亲日派徐树铮的友谊，很少有助于增强他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此外，林反对将白话文作为广泛的文学手段，尽管他本人有时也用过它，但白话运动则对他的文学观点从根本上提出挑战，并且降低了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声望。

林纾不久成了一名公开抨击新文学运动的人物，1919年春，他写了几篇文

章攻击他们，还写了几篇寓言嘲笑陈独秀、胡适等人。3月18日，他发表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批评知识界的青年领袖人物（他们不少人在北京大学教书）抛弃古文和古典文学。斥责他们意在破坏儒家传统精神，声称背离中国传统伦常和古文不足以衰败和外人统治下拯救中国反而将导致灾难。林纾于1919年所写的这些文章，以及蔡元培等人的反驳，引起了一场争论，但他的影响却继续下降。不久他终于退居他在北京的寓所，从事翻译和绘画，一直到1924年10月9日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林纾体弱多病，一生与之作了顽强斗争，他在最后的十几年中，他的著作的版税和卖画的收入已足以维持全家生活，他的这种收入成为他的朋友取笑的目标，他们把他的书房称作“造币厂”，他的家庭情况不详，遗有续弦的妻室和几个孩子，他的前妻所生的长子任河北某县县长。

林纾的翻译活动开始于1904年，他与朋友合作，翻译了：《伊索寓言》、哈葛德的《迦茵小传》、《埃及金塔剖尸记》，却尔斯·兰姆的《吟边燕语》。1905年翻译了：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达孚的《鲁滨孙飘流记》、哈葛德的《斐洲烟水愁城录》及一些探险小说，1906年翻译：斯威佛特的《海外轩渠录》，欧文的《旅行述异》，柯南达利的《金风铁雨录》及哈葛德的四种小说。1907年翻译了约十二种作品，其中有欧文的《大食故宫余载》、《指掌录》，司各德的《十字军英雄记》、《剑底鸳鸯》，迭更斯的《滑稽外史》。1908年翻译了二十来种：大仲马的《玉楼花劫前后编》，司地文的《新天方夜谭》，迭更斯的《贼史》、《坎内余生述前后编》、《冰雪因缘》。此后几年，林继续出了一些重要译作。1914年他译完了大仲马的《蓬莲郡主传》以及在《小说日报》上发表的巴尔扎克的几个短篇小说。1916年他译了莎士比亚的四种剧本：《雷差得记》、《亨利第四记》、《亨利第六遗事》、《凯御遗事》。约在此时他又向读者介绍了荷马的《伊利亚德》、《奥德赛》。有趣的是，1917—1919年间，在中日文学界兴起人文主义前后，林转而注意到了列夫·托尔斯泰，并由口述从英译本转译了托尔斯泰的《人鬼关头》、《社会声影录》、《现身说法》、《恨缕情丝》。

林纾可能是中国译作最多的一个翻译家，到去世时已译了大约一百八十种

(即成大约二百八十一册)，死后又出版了十五种以上短篇小说译本，还有十七种小说译稿尚未出版，与他熟练敏捷的翻译相对照的是，他写一篇短文有时要花几个月时间。

因为林纾不懂任何外文，所以在翻译时必须与人合作。其中王子仁、魏易、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和严复的两个儿子等人具有文学才能，而大多数合作者都缺少文学修养，选译什么作品也要依赖这些人作决定，而他们似乎是以读者的口味作为选择的主要标准，结果是林译作品中约有一百来种是文学上不知名的作者的作品，约有三十来种是哈葛德和柯南达利的探险或侦探小说，后者的著名侦探小说《谢洛克·霍姆斯》由林纾的译本《歌济克奇案开场》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尽管这样，林及其合作者毕竟翻译了大约四十种重要的作品，除上述所列举的以外，还有迭更斯的《孝女耐儿传》（《古玩店》）、高尔斯密士的《双鸳侣》（《威克非牧师传》）、预勾（雨果）的《双雄义死录》、孟德斯鸠的《鱼雁抉微》、森彼得的《离恨天》、西万提司的《魔侠传》（《堂·吉珂德》）、易卜生的《梅攀》、鲁斗威司的《鹈巢记》、斯宾塞尔的《荒唐言》以及亨利·费尔丁，H·G·威尔斯的一些作品。

林纾在译书上的序言和评述，反映了他从传统的道德观和文学观出发对西方文学的看法。他常常把选译的爱情小说和自然主义小说看作是“警世之作”例如他曾把《古玩店》译成《孝女耐儿传》。此外，他还把所译作品看成是要求进行政教、社会、教育改革的呼声，或是用以激起爱国热情和冒险精神之作。

林纾丝毫不懂外国文，因此无法校正口述者的正确性和完整性，但是他擅长古文，能用丰富多彩和细腻的语言刻画人物的心情和行为，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颇为难解的现象：他的译文对原作作了删改之后反而使中国读者更为喜爱，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在读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并由此知道了西方人的奇异而有趣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林纾所译的西方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富有想象力的改编本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

林纾作为翻译家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中国读者打开了眼界，让他们接触了西方文学的成就，增加了他们对西方社会和风俗习惯的了解。他是中国文学界知

名之士中第一个重视西方作家的文学价值的人；例如，他认为迭更斯可以与国内过去第一流的小说家媲美，甚至可以与传统的文学偶像司马迁并列。他又是第一个运用中国古文写小说的作家，他的作品影响所及引起了中国小说写作技巧的某些变化。他的译作在中国青年一代作家中很有影响，尽管他们信奉白话文运动，但林纾对他们仍有吸引力。郭沫若第一次读了西方小说《迦茵小传》后感动得流了泪，还公开说过对他自己的写作影响最大的是司各德的浪漫主义。刘复根据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写了一个剧本，他这次戏剧创新活动加强了当时的浪漫主义潮流，老舍也从林译迭更斯的作品中吸收了不少诙谐的技巧。

1914年，林纾翻译的五十种作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译小说丛书》九十七册，林纾的其他译作于1914—1916年也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三套《说部丛书》予以出版，除译作以外，林纾还写了八篇小说，三种旧体戏曲、六卷短篇小说，三本文集，三本诗集，其中于1923年出版的有《畏庐诗存》。他的论文集分别于1910年、1916年、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以《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之名出版。他还撰写编订了十多种谈论文学和伦理的书籍，林纾对绘画也颇有兴趣，他有关此道的文集《春觉斋论画》，以及他所作的山水画的照相的影印本《畏庐遗蹟》均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34、1935年前后加以出版。

林 文 庆

林文庆（1869.9.5—1957.1.1），一名有成就的医生、实业家、新加坡的社会名流，1921—1937年，他放弃了获利颇丰的行业而就任厦门大学校长。

林文庆原籍福建，出生于新加坡，青年时学习成绩出色，在1887年中学毕业时是获得女皇奖金取得留学英国资格的第一名中国人。他到英国后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科。1891年以优异成绩取得学士、硕士学位。他在剑桥继续学习一年，于1893年回新加坡行医。他医术精湛，除闽、粤语外又能操马来语、英语、泰米尔语，因而能与各种病人对话。由于业务兴旺而出名，因此1895他年仅

二十六岁时即已被提名进入新加坡立法部。

1896年与黄瑞琼结婚，她父亲黄及裳是一名基督教学者，曾一度任福建地方官，与孙逸仙相识。林与黄成为至友，林曾协助其岳父传布革命理论。1900年林文庆为反清革命运动出了力。有一次孙逸仙与康有为共同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到新加坡访问康有为，促成其与孙逸仙合作，因发生误会被地方当局逮捕，孙逸仙当即赶到新加坡对此提出抗议，林文庆不久设法使宫崎获得释放。1907年孙逸仙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分会，林文庆立刻就加入了。

林文庆虽出生于新加坡，但对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他和第一个获得英国爵士称号的马来亚华桥宋旺相（1869—1941年）合办了英文版《马华杂志》和“好学会”，并开办了讲解中国典籍的课程。除此之外，林文庆还积极活动在新加坡成立华人银行并发展马来亚的橡胶生产，后成为新加坡商会付会长。他还曾一度担任新加坡英皇乔治七世医学院讲师，英国政府因林文庆的成就授以大英帝国勋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后，孙逸仙由欧洲经新加坡回国，以后他邀请林文庆去南京，委任他为1912年初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卫生部长，孙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后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林文庆也回到新加坡继续从事医学、教育工作。

1921年，实业家陈嘉庚出资一百万新加坡币在福建创办厦门大学。4月，陈嘉庚请林文庆担任校长，林文庆认为此举可使国内及东南亚闽籍青年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所以毫不踌躇，即放弃了他那收益颇丰的行医之业而就校长之职。林享有办理该大学校务的全权，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明智进步的校长，1937年厦门大学由国民政府接管，林文庆辞职。

林文庆在厦门职务繁多，但仍不放弃自己原有的兴趣，他努力提倡学习研究儒家的伦理学说和从事中华医学会的工作。1929年他把屈原的《离骚》译成英语，书名为《离骚——悲苦的遭际的哀歌》，由翟里斯和泰戈尔写了序言，这本译作虽不及理雅各1895年的译本来得精确和富有文采，但仍然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本子，因为它具有极为丰富有用的注释，特别是关于植物花草所作的精心注释。1930年，林文庆任上海出版的英语周刊《中华》杂志的主编。此后几

年中，他为这本杂志写了一些文章，还写了几本书，如《中国国内的危机》、《中国生活的悲剧》、《新中国》等。香港大学因林文庆在教育、文学等方面的贡献，授以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37年林文庆退休后不久，中日战争爆发。因他年近七十，就决定在战争期间安安静静地住在新加坡。日军占领时，他仍在新加坡，被迫成为当地的“维持会”的一名成员，但他并未积极参加该会活动，所以后来英国当局免于对他进行任何追究。1957年1月死在新加坡，终年八十七岁。

林文庆有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林可胜、次子法兰西斯·林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三子沃尔特·林是新加坡的银行家。林文庆是伍连德的联襟，伍与黄露芝结婚。

林 语 堂

原名：林玉堂

林语堂（1895—），学者、作家，新闻记者。三十年代中成为幽默文学的首领，并倡导在中国新闻界运用西方的新闻文体。自从1935年出版了《吾国与吾民》之后，就以用英文写作有关中国的通俗作品而知名。

林语堂原籍福建漳州，先辈三代都是在厦门的基督教徒，他父亲是长老会牧师，早年在愉快但虔信宗教的环境中长大，十三岁时进漳州中学。他家里要他成为牧师，所以他从中学转入厦门的天主教教会学校，1911年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最初十八个月中，在神学院读书，但渐渐对此不感兴趣，最后决心不入基督教。他在圣约翰以第二等成绩毕业，擅长英语而中文较差。1916年离圣约翰大学后，在清华大学任英语教授，并与廖祖芬结婚。

1919年，林语堂去美国进修，他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进了哈佛大学学习一年，于1922年缺席获得硕士学位，1920年去法国在法国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到1921年，然后去德国进耶纳大学一学期，后又进来比锡大学，192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为《中国古音韵》。

1923年，林语堂回国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同时又在北京师范大学教

书，不久与当时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结识，1926年他与五十名教授一起被列入黑名单奉命离开北京。他在北京的最后六个月中，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

林语堂去厦门，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春去武汉，任武汉政府外交部长秘书。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他退出政治舞台。他曾一度帮助编辑代表汪精卫等人政见的英文杂志《人民论坛》，以后去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法政学院教英语，又任开明书店经理，其后，又主编了一些英语读物。1930年主持中央研究院西文部，并负责语言学研究工作。约在此时，他设想了一种中文拼音方案，以后由赵元任发展成为“国语罗马字”。他还曾担任过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秘书。1924—1931年间经常为鲁迅及其弟周作人所编的文学周刊《语丝》撰稿。

1932年，林语堂以创办《论语半月刊》而在国内知名，该杂志专门刊登幽默讽刺的文章而大为成功，但右翼作家批评他嘲弄国民精神，左翼作家则批评他用庸俗的东西腐蚀民众的心灵。林则声称他办杂志意在进行批评并将它一直出版到1935年。在此期间，他在《论语半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常常又以英语刊登在《大陆报》上。《大陆报》是由潘光旦、胡适、等知识分子所办的一份在上海出版的周刊。

1934年春，林语堂又创办了第二种杂志《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出版目的在于推广适应大众的一种简易文体。同年，又创办了采用美国文摘风格的《宇宙风》半月刊，这份杂志，受到左翼知识分子在《申报》文学副刊上发出的攻击，并由此而获得某些名声。它一直出版到1935年末，其投稿人包括有郭沫若、老舍、周作人等。

1935年，林语堂与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英语杂志《天下月刊》有了联系，这份杂志以其内容而获得好评，但自中日战争爆发后被迫停刊。1935年林语堂第一本用英文写的书《吾国与吾民》在纽约出版后，在西方当即风行，1937年译成法文，1938年译成中文，1946年译成德文。

1936年，林语堂全家离开中国去到纽约，那时美国正需要他那样的作家，1937年出版了二本英文书籍《生活的意义》，1948年译成法文，1955年译成德

文。1939年出版了记述他个人在中日战争时期的经历的《新中国的诞生》以及《瞬息京华》，后者是采用《红楼梦》的笔法描写当代生活的小说，评论者认为这是林语堂最好的一本著作。

1940年林语堂离美回国时因病留在香港，后又去美国，但终于在1943年回到了中国，在中央大学作了有关中国文化的讲演，又访问了桂林、衡阳、长沙、韶关、昆明等地。他卷入了《太白》和《芒种》杂志热烈支持的作家曹聚仁的文学争论之中，这个争论说明了他与战时中国文学界的关系不相协调，因此林语堂又回到美国去了。

林语堂在美国翻译了不少中国作品并写了一些小说、论文、剧本、游记。他写的小说有：《风波一叶》（1942），一本描写遭受战难的中国人的小说；《华人城》（1948）；《砾漆大门》（1953）；《吴夫人》（1957）；《红牡丹》（1961）。论文集有《向外瞻望》（1955），研究共产主义的《秘密名字》（1958），《非国教徒的欢乐》（1962）。他的悲喜剧本有1937年出版的《子见南子》。1961年出版的《帝城》，是一本研究元、明、清朝的京城的书。林语堂的翻译作品是他文学活动中的重要部分而且是他成就最高的部分。其中很多在三十年代上海的《天下月刊》和其他出版物上发表，最成功的译作是沈复的《浮生六记》的一部漂亮的英译本，在1935年的《天下月刊》上发表。1947年他编辑和注解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译文，题为《“论民主”：中国共产主义的精髓》。1951年他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寡妇、尼姑、情妇》的书。1960年出版了早年译作《理解的重要性：中文译文集》。他还编过几本“幽默”丛书：《印华幽默》（1942）；《老子幽默》（1948）；《论美国幽默》（1950）。1967年他出版了《中国美术理论》。

1954年应邀任新加坡新南洋大学校长，为此他聘请了自己的师资人员。此行并不成功，因他与当局就方针和财政问题发生了争议，就职六个月后，他领取离职金，辞职经欧洲去美国，1957年12月加入纽约麦迪逊街长老会教堂，其妻积极参加该堂工作。一年后，他改信基督教，1959年出版了他的遗嘱《由异教徒成为基督徒》。

林语堂早期的中文作品，对发展新的新闻文体作出了贡献，他机智地运用英

语，取笑儒家哲学，把它和老子学派的消极无为糅合在一起，这使西方人士感到很亲切。他最初的两本书为西方人士具体地描述了中国社会，其影响持续了一个世代之久。他在国外虽被认为是一名东方哲人，但在中国国内文学界却从未被人看出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

刘 湛 恩

西名：海尔曼

刘湛恩（1896—1938.4.7），知名的浸礼教徒，教育家，上海社会名流，1922—1928年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教育干事，1928年后任沪江大学校长，直至1938年被刺身死。

刘湛恩生在衡阳，那是他父母为北方浸礼会活动的地区，他在教会小学、中学读书，以后进东吴大学，1918年毕业后去美国，入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出席华盛顿会议任中国教育代表团秘书，并担任中国学生组织驻美国代表。

1922年回国，时年二十六岁，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教育干事，任职六年，视察中国各地，特别注意职业教育问题，他在这个领域表现出来的特殊兴趣使他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研究主任，因此与职业教育的开创人黄炎培相结识。刘湛恩还曾一度在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任教育学教授，他这一期间的著述有关于公民教育、职业指导、男女同校、考试方法等。1926年他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出席在芬兰赫尔辛福斯召开的世界基督教青年会，会议结束后，他去欧洲旅行，考察教育问题及教育技术。

1928年，任沪江大学校长，该校前身为上海浸礼教会学院。这时正是国民政府为实现政治统一而力求调整教会学校，以适应政府教育措施和对教育的控制的关键时期。政府要求学校进行登记之举不仅在国内，并且对那些作为中国大学的赞助单位的美国大学都形成了复杂的问题。1929年，刘湛恩到美国广泛旅行，向沪江大学的赞助单位说明，向政府登记并不是在原则上进行妥协，不过是对教会学校给予正式承认并对宗教课程有所限制而已。由于刘湛恩善于应付，

因此沪江大学和国民政府及美国赞助人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而那时正是误会和不怀好意盛行的时期。1931年，1932年，日军侵略东北和上海，爱国学生进行罢课，要求抗日，沪江大学处境更为困难。沪江大学在刘湛恩主持校政的十年间，在校舍建设，师生队伍，学术地位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刘湛恩把沪江大学迁到公共租界以免学校停办。

在此期间，刘湛恩多次出国，1929年他去美国之际，又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会后访问了欧洲教育界著名人士。1933年，他去美国和加拿大，起先以太平洋学会中国代表和创始会员身份，在加拿大彭夫参加该会议，以后又参加琼斯领导的北美外方传教会议，他以这个身份访问了美国各大城市，争取海外传教事业的支持。

刘湛恩是浸礼会的著名教士，1930年致力于组成中华浸礼会联盟。1936年，创导该盟的《前进运动》，在九江召开浸礼会会议。刘还曾担任全国基督教协会会员和代主席，基督教大学理事会理事，基督教教育理事会理事，基督教救济会主席，国际红十字会成员，国际教育协会主席，国际红十字会主席贝克，曾称刘湛恩为在该会募捐和分配款项工作中的“火花塞子”（意为“推动力量”）。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刘湛恩和其他三名富有服务精神的公民自愿组成“抗敌会”，对在上海的国外侨民宣传中国的抗日观点。因此，当时负责对外宣传的国民党宣传部次董显光请刘湛恩去美国作关于中国抗战情况的宣传，几天后，1938年4月7日，刘湛恩在上海街道上被刺身死，据说，这系出于日方间谍之手。

刘湛恩的妻子王立明，安徽太和县人，美国留学生，回国后，积极从事基督教妇女戒酒协会工作。自从她丈夫去世后，她开始不断地批评国民党，1949年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成为全国妇联的领导人之一。

刘 峙

字：经扶

号：天嶽

刘峙（1892—），著名的国民党军事指挥官，1930—1935年任河南省主席，西安事变后改编苏、皖、豫军队，1939—1945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1948年底淮海战役时任战地司令官，1952年去台湾参加国民政府。

刘峙出生在江西吉安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在私塾读书。1905年冬去日本留学，因参加学生罢课被迫回国。1907—1910年入湖南初级军校，1911年进武昌初级军校。革命爆发时，该校停办，学员奉命负责警卫武昌。

1912年7月，各军校先后重新开学，刘峙当时在吉安家乡，他去南昌后，进了清河镇的第一陆军预备学堂，他与同学组织了一个支持国民党的秘密团体，1913年夏请假离校，以便参加二次革命，但是在学生军到达前袁世凯的北洋军已佔领了江西，打败了革命军。刘遂回校，于1914年6月毕业，在新民府二十师三十九旅逗留了六个月后，进了保定军官学校二期步兵科。

1916年5月，刘峙毕业后，去南方在岑春煊部下当参谋，不久成为驻川滇军第七师十三混成旅当一名连长，该旅旅长为朱德，1918年2月在粤南参加对龙济光的战役，1920年1月，在援赣第四军第一团任营长，刘峙率部进入陈炯明的据点福建，他所率的部队被人们称为赣军。8月，陈炯明回广东驱逐广州桂军，刘所率部队归许崇智指挥，10月26日，广州被占，此役遂告结束。

1921年5月，孙逸仙就广州军政府非常大总统职，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刘峙任总部少校参谋，6月，升为上校，调任粤军第二军参谋。1922年初，他率第二军先头部队进入江西。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所部在广州发动兵变，刘峙部回师广州，为沈鸿英的桂军所败，刘于是去了上海。许崇智任东路讨逆军司令，刘去他的总部任参谋，后为警卫队司令。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前，刘峙一直在许崇智手下任职，军校成立后，任该校教官，部主任，1925年1月，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时，刘峙任第一教导团第二营营长。1925年夏，国民革命军建立，刘峙先后任蒋介石第一军第一团团长、二十师师长、第二师师长。北伐时，刘峙在何应钦手下，任第一路军前线指挥，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1月整编后，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司令，集团军的总司令是蒋介石，参谋总长是何应钦。

1928年8月，北伐胜利结束，刘任改编第一师师长，徐海警备司令。在1929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讨伐武汉地区的桂军的行动开始后，刘任第二军团司令，第一军军长，4月，桂军撤走，刘任武汉警备司令，第二编遣区主任。9月，张发奎公开反蒋，刘峙进军湖北宜昌进行镇压，张发奎转去湖南。不久，豫陕甘的冯玉祥国民军反蒋，刘峙率第二路军到河南作战，任前线指挥，武汉指挥部主任，11月国民军撤出河南，战争结束，刘接着又和其他国民党军队共同镇压唐生智的叛军。

1930年3月，刘峙调任徐蚌警备司令，5月，冯阎联盟反蒋，刘任南京讨伐军第二军团司令，指挥陇海、津浦路战役，攻占济南，并参加了平汉路上的最后战役。1930年10月6日，刘出任河南省主席。

1931年1月，刘峙兼任蒋介石的开封行营主任，同年夏，他与张学良合力粉碎了石友三的叛乱。1931年底，开封行营撤消，刘任河南绥靖主任。由于河南在国民政府防卫部署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刘还成了国府委员。1932年初，刘协力追走鄂豫皖边区的共产党势力，1933年春又在赣东进攻共产党军队。

1935年底，商震继刘峙任河南省主席，刘任豫皖绥靖主任，为国民政府负责中原地区的军事。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任苏皖豫军队编遣委员会主席。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刘峙任第二集团军司令，9月，和平谈判无望，刘在蒋介石住司令部官的第一战区任副司令。作为华北前线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总司令，刘峙负责阻截日军由平汉路南进。国民党军队在石家庄地区虽集中了十万余人之多，但未能阻止住日军。10月，刘兼任第一战区训练总监。日军继续前进，直至1938年5月底，国民党掘开黄河堤坝才把日军阻住。

1938年夏，刘峙任湘鄂川黔边区绥靖主任，第五后备军长，设司令部于宜昌。国民党军从武汉撤退时，刘峙负责防御和维持治安，收容部队，装运物资，救济难民，封锁河道等事宜。

1939年春，刘峙任国民政府首都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他担任这些艰难的职务直到1945年2月，此后改任第五战区司令。战争结束后，他接受了河南日军的投降。

1946年1月1日，刘峙任郑州绥靖主任，管辖河南、陕西两省，其主要任务

是与已在华中地区破坏了铁路运输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周旋。他的部队被刘伯承所部在陇海路沿线击败，9月他的职务遂由顾祝同接任。刘当时已获将军军衔，即在南京任战略顾问委员。1948年6月，在徐州任华东“剿总”司令，11月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大战开始，刘峙负责指挥五十万国民党军队，他的共产党方面的对手是陈毅、陈赓、刘伯承。11月底，刘峙被迫将总部撤到蚌埠，1月初，战役以国民党惨败宣告结束。1949年1月15日，刘峙被解职。

以后，刘峙去香港，又去印尼。1952年11月，到台湾参加国民政府。1955—1956年，任蒋介石的总统府保安顾问。1961年在台北油印了他的自传，1962年在台北出版？。

刘 复

字：半农

刘复（1891—1934.7.14），教师、语言学家、文人，致力于中国语文和文学的研究，白话文运动的一位早期鼓吹人。他的作品说明他是运用这种新文体的大师，并是它的有力的理论家。

刘复生在江苏江阴一个他自称为“清贫”的家庭。他和弟弟刘天华在本地上小学，后到常州府学念书，刘复开始学习西方语文。1911年革命时，学校停闭，刘离常州去镇江继续学语文，他弟弟参加了革命青年运动。

1912年弟兄两人会合后同去上海，刘以写文章和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谋生，他弟弟学音乐。1914年，刘天华回家教书，刘复留在上海。

刘复向《新青年》投资的一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主编陈独秀、蔡元培极为称赞，因此，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请他到校教书。1917年刘进北京大学教中国语文。

刘复不久深深捲入了白话文是否适用于正式文章和文学作品这一辩论中，他发表的几篇阐发新观点的文章非常富有说服力，他在《新青年》上驳王敬轩反对新文体的一篇文章尤其出色，他继胡适之后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写文章需从内容和形式上加以改革，语法，词汇应现代化，他和胡适一样认为一篇好

的文章必须以语体文为基础。他就这个观点研究了《诗经》和《楚辞》。

刘复又是一名诗人，他的短篇抒情诗很为有名，其中优秀的作品如《织布》、《教我如何不想她》、《听雨》，后来由赵元任谱成歌曲，风行一时。他对语言学的兴趣使他在1919年出版了一本《中国文法通论》。

1920年刘复去欧洲留学，1925年在利维指导下得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在巴黎的这一段期间，对他的学术旨趣很有影响，他受伯希和等人的影响开始研究唐代及唐以前的白话文学，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伯希和敦煌经卷是他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料，他手抄了一部分经卷在1926年出版了《敦煌掇瑣》，在巴黎他还研究了汉语声韵并于1924年出版了《四声实验录》。

1925年底刘复回国，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不久辞职，改任中法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在此期间，他继续写作，1926年出版诗集《扬鞭集》、和小仲马的《茶花女》，同年出版张南庄的神鬼故事集《何典》的注释本、以及从欧洲各图书馆收集的《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1927年出版《法国短篇小说集》，1929年7月任辅仁大学教务长和研究主任，1930年5月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教务长。他担任最后一个职务不甚愉快。1931年7月，他欣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的，由文化教育基金设立的五个研究教授的一教席，其他四人是周作人、汤用彤、陈受颐以及徐志摩。

刘复于是致力语言学研究，倾注全力研究音韵语法，分析敦煌资料，尤其是其中的民间歌谣部分。在此期间，他出版了几种重要学术著作，包括1932年出版的《中国文法讲话》。除此之外，他还另有兴趣，1929年写了有关北伐时回忆《流离》，他还很欣赏梅兰芳及其所从事的古典戏。他还写了题材广泛的文章，并以文辞流利、坦率、自然而见称。1930年他出版了《宋元以来俗字谱》，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著作。1931年，他忧心国事，曾给国民党元老张继写信，建议在西安设立陪都，此举曾引起一阵骚动。

1932年，刘复出版了《中国俗曲丛目》，同年，他的很有成就的弟弟音学家、教师、刘天华在北平去世。1934年夏，他去绥远进行野外旅行，希望能收集到一些西北的民歌。到绥远后不久，因患病立即返回北平，1934年7月14日死在北京协和医院。

刘 湘

字：甫澄

刘湘（1890—1938.1.22），四川军人，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中，在四川断断续续地拥有最高权势。

刘湘的家世和他早年情况不详，只知道他出生在四川大邑，1910年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同学中有杨森，1912年后从军，参加张澜的部队。1917年成了一名准将，1918年中升为师长。

1920年5月，四川督军熊克武任川军总司令，要唐继尧的滇黔军撤出四川，经长期艰难战斗，“客军”于是年秋被逐，12月，四川军界领袖宣布独立自主，熊克武辞去省长职，第二军军长刘湘在善后会议上被选为川军总司令，杨森继刘湘任第二军军长。刘湘并不立即采取行动巩固自己对四川的控制，相反，他却让一些军阀继续管辖原先支配的地区。这种迟迟不采取行动的情况助长了省内争权夺利的斗争。1921年5月，刘湘反熊克武，熊逃走，7月，刘湘任省长，不久，又派军队进鄂西支持湖北独立，但为有力的军阀吴佩孚所反对，9月刘部在宜昌为吴部所败。10月，战争结束，吴佩孚、赵恒惕、刘湘议和，各自保持原状，11月川军撤回。

1922年5月，四川内战危机又起，刘湘辞职，举王陵基为省长，此举不过是意在袭击第一军但懋辛的烟幕。7月初，杨森的 second 军攻但懋辛，以刘成勋为首组成包括但懋辛、邓锡侯、赖心辉、田颂尧、刘斌等人的联军进行反击，7月中旬，联军进入刘、杨的据点重庆和泸州，8月，把他们逐出四川，刘、杨到湖北，杨森投奔吴佩孚，收集残军改编为一个混合旅，设司令部于宜昌，刘任编遣主任。

不久，刘、杨又获得返川机会，1923年2月初，四川省长刘成勋和邓锡侯相争，一周后，刘、杨由吴佩孚的军队支持进入川东，他们进展迅速，于4月间迫使但懋辛离开重庆，但懋辛求援于滇黔军，熊克武回川，5月占成都，10月占重庆。刘、杨又由袁祖铭支援，于1923年12月再占重庆，1924年2月再占

成都，把熊克武赶到贵州，不久，1917年曾任四川督军的刘存厚恢复原职。

1924年5月，北京总统曹錕改组四川权力结构，取消督军，任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自1923年7月起担任四川绥靖公署督办的刘湘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担任川滇边防督办，杨森被任命为四川军务善后督办。1924年底杨森的后台吴佩孚在北京倒台，1925年春刘湘即着手消灭杨森在四川的势力。3月，刘湘的叔父刘文辉由邓锡侯、赖心辉支援与杨森开战。5月，北京执政段祺瑞命令刘湘调查并稳定四川局势，刘湘推举杨森去北京任职。5月中旬，刘湘继杨森任四川军务善后督办。杨森拒不接受调迁并与刘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未果，7月中旬，反杨各部由袁祖铭统率逐走杨森，12月，刘湘在成都召集会议，决定刘湘为四川督军，以刘文辉为副手。

1926年2月，邓锡侯、袁祖铭联合支持杨森回川，3月，双方开战，不久刘湘同意杨森回川而结束战争。5月，吴佩孚势力又控制了华中，任杨森为四川省长，邓锡侯为督军，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

1926年秋，刘湘宣布忠于国民党，1927年春，刘湘、杨森支持蒋介石反对武汉政府，6月，任刘湘为第五路军司令，杨森为前线指挥。1927年底，蒋介石辞职，刘湘任第六军军长，杨森任第二十军军长。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下令刘文辉、刘湘接管杨森所率的部队。

1928年10月北伐结束，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刘文辉任四川省长，刘湘任省政府委员，同时任川康整编军队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有杨森（此时已重任二十军军长）、邓锡侯、刘存厚、田颂尧、赖心辉、顾祝同等人。12月20日，杨森等通电谴责刘湘、刘文辉，事实上即对他们宣战，刘湘、杨森之间首先开战，几天后，国民政府应刘湘之请对杨、赖心辉、罗泽洲采取行动，12月底，战局对二刘不利，后因顾祝同倒戈而有转机，杨森被迫撤出万县，1929年1月中旬国民政府解除其职务。

二刘间长期内战接着就开始了，1932年末刘湘由杨森、邓锡侯协助控制了四川，1933年7月，他就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但直到10月才就任，那时刘文辉已被驱赶到西康去了。1934年，刘湘任四川省主席，11月，他第一次出省去请求蒋介石给以支援。

刘湘作为剿匪司令，他面对共产党部队的活动，尤其是徐向前的部队。他曾一度迫使徐向前撤离川鄂边区，但1935年2月，徐又率领了更强大的部队回到四川。那时，中国共产党的长征部队从南边逼近四川。刘湘当时兼任四川绥靖公署主任。由于他和邓锡侯的努力，共产党军队途经四川北上时，四川得以度过1935年这个困难的年头。

国民政府利用所谓剿匪企图加强其对四川等各省的控制，刘湘虽然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委任并得到援助，以制服内部敌手，但却很不愿意因此减弱本身的权力。国民政府由于还存在着其他的纠纷，1937年前还不能对四川施加压力。当时，刘湘已消灭了省内的众多敌手，这样，他也就得不到当地人的支持来与南京抗衡了，而且，那时的四川在财政上又有困难。1937年6月，就有关四川“善后”事宜双方达成协议，其内容有川军撤出宜昌、万县、重庆等要地，改编川军为国军，将“训练民众”之责转归国民政府，改革省内税则，由国民政府负责修建和管理公路。

何应钦被任命为川康整军会议主席，以刘湘为付主席，第一次会议于1937年7月7日在重庆蒋介石行营召开，中日战争恰在那天爆发。由于战争关系，会议于7月9日结束，作出了由南京批准的决定：对川康部队暂不作大规模编遣，只有老弱不适宜作战的部队才予以淘汰。何应钦因国难当前，即回南京，把改编川康部队为国军的工作交给了顾祝同。刘湘被任命为国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刘湘率川军参加保卫南京，1937年12月撤离南京后，他在汉口进了医院，1938年1月22日死去，国民政府即采取行动，控制全川，准备作为战时后方基地之用。

刘 鸿 生

西名：奥斯刘

刘鸿生，（1888—1956.10.1），民国年间的著名实业家，经营火柴业和毛纺业。1949年后他作为一名“民族实业家”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刘鸿生原籍浙江定海，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是一名富商。刘鸿生幼年起，就受到良好的中西文化教育。大约十九岁时进了圣约翰书院（它是圣约翰大学的前身）。后因家道中落，父亲去世而辍学，一度充当设在公共租界内的上海工部局译员。

1913年，他二十五岁时到华北，充当了一名开滦矿务局的经纪人。不久他自立门户，开了一片小型的煤炭公司。1920年回上海，充当开滦矿务局上海地区的代理人。他在上海开一家煤球行，1923年又创办了上海水泥公司。

刘鸿生和叶澄衷（1840—1899）的女儿结婚，叶澄衷开了一家燮昌火柴公司，是国内火柴业的创始人。刘鸿生从未和他的岳父见过面，但对他所经营的行业很感兴趣并决定自办一个火柴厂。1924年开办的鸿生火柴公司，获利甚多，使他得以举办其他行业，1927年他又开办华丰搪瓷厂、中国毛织厂。同年，他去欧美考查西方经营管理方法。回国后，他聘请林氏改进生产方法，降低单位成本，林还采用了使火柴干燥的新技术。

刘鸿生不久发现创办一个火柴联合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事，1930年他将燮昌、中华两火柴公司合并成为大中华火柴公司，年产火柴约二十万箱，约占全国火柴产量的四分之一。1931年，他把火柴企业扩大到江苏，并于1936年组成一个全国性联合企业。这个联合企业规定所属各厂的生产定额并议定五年内不再另建新厂。这个协议使中国的火柴业能有效地同日本和瑞典火柴业进行竞争。

在此期间，刘鸿生的兄弟刘吉生具体管理其兄的各个企业。刘鸿生因此得有余力发展其他行业，1931年他创建中国企业银行。他还充任上海煤业银行董事，而煤炭行业也一直是 he 不断发展的实业王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还当了两家开发公司和上海煤炭公司的董事长，接着又在许多小商埠设立了不少货栈和码头。1931—1933年他被聘为上海工部局顾问。直到1936年他还是新成立的中国工矿联合会的一名显赫人物。

1932年11月，官办招商局改组，任命刘鸿生为总经理，他虽然对这个航运联合企业屡加改进，但眼见这个招商局每年亏损极大，长此以往，势必难以维持，1934年遂辞职自办一个小的航运联合企业舟山轮船公司。

中日关系紧张，有即将开战的形势。刘鸿生作出安排把他的一部分工厂迁

移到内地。到1936年止，据说刘鸿生已拥有数百万银元的资产。圣约翰大学鉴于刘鸿生的成就，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刘鸿生在香港开了一家火柴厂。刘鸿生经营火柴业，过去是依靠日本进口的化学原料自从他聘请化学家张挺峰之后，火柴原料，已由另一种电解化学物来代替了。1939年，刘鸿生开办工厂，专门生产火柴原料，供应川、贵、云、桂各地的火柴工厂，又将大量产品卖给国民政府推销到各边远地区。他拆迁原在上海的中国毛织厂的机器，1942年在重庆开办了一家中国毛纺织厂，每年生产衣料一万套以低价出售给公务人员，因此，国民政府对刘鸿生厂家的毛织物免于物价管制。1942年起，刘鸿生由国民政府任命为政府统制局长。1944年，刘鸿生得到交通银行和财政部的资助，计划建立一个西北毛纺工厂，其中一个单位是对当地出产的羊毛进行加工，另一个单位则是1944年开的，名为中国制帽厂。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鸿生回上海，发现他留在沦陷区的弟弟的悉心照料，他在上海的大部分企业安然保存，1946年，他除了依旧经营自己的实业王国以外，又被任命为中国善后救济总署主要行政官员和上海分署主任。

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人占领上海前夕，刘鸿生去了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宣布实行保护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政策。刘鸿生深信他手下的企业合于上述条件，他自己可以在新政府下继续他的事业，于是就作为“民族实业家”回到上海。他被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执行委员、全国工商联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1952年12月至1954年6月他还担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他作为一名上海代表参加全国人大大会，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1951年，刘鸿生和他的十二个儿子中的长子刘念义被人攻击为资本家。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开始把私人企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作为对全部工商业实行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他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资本家一样，逐渐变得无所作为了。1956年10月1日，他在上海去世，终年六十八岁。关于他去世的消息官方发布的称他“热诚拥护和执行国家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柳 诒 徵

字，翼谋

柳诒徵（1879—），东南学派史学家，南京江苏省立图书馆员。

柳诒徵生在江苏丹徒，七岁时，他父亲去世，此后即在外祖父家中生活，由母亲教以中国经史，1895年成秀才后开始收徒授业。1901年去南京任缪荃荪创办的江楚编译局助理，1906年曾一度去北京、沈阳教书，回南京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历史教席，该校于1923年改为东南大学，1927年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张其昀是他的得意门生，1927年他为张谋得地理科讲师之职。

1924年，柳诒徵任反对胡适等人白话文运动的《学衡》的秘书，他早期的著作，大都发表在《学衡》上。

柳诒徵作为一个史学家和图书馆工作者所起的双重作用反映在他的学术活动中。1921年到1929年间，他在南京创办了史地学会，出版《史地学报》，创办历史学会，出版《史学杂志》，这两本杂志的经常撰稿人有张其昀、缪凤林，他们和柳诒徵以后一起创办了钟山书局，出版《国风半月刊》。上述三种杂志，成为史学界东南学派的论坛，对二十、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发生过一些影响。

1927年，柳诒徵任江苏省立图书馆员，该馆前身即系端方出资，缪荃荪主办的金陵龙盘里图书馆。该馆珍本和手稿的收藏量仅次于国立北京图书馆。在柳诒徵主持下，影印出版了一些珍本书籍，其中有《贼情彙纂》以及三本研究明朝时期东北情况的著作。1936年出版了该馆藏书目录，这是在柳诒徵指导下由范希曾、王焕镛所编。

柳诒徵发表在《学衡》上的文章有《王玄子事蹟》，该文是研究公元643、648、657年访问印度的一个高僧。《汉官议史》、《华化》是研究日本追求和接受中国文化的情况。《读墨会要》宣称孟子胜于墨子。《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研究明代太学，以及《唐代兵数考》。1929年的《学衡》还刊载他的《中国文化史》，1932年成书出版，同年还出版了《历代兵书目录》。

他在《江苏省立图书馆馆刊》上发表文章和书目注解，其中有《卢抱经先生年谱》，是研究卢文绍的作品，《南京史谈》、《族谱研究举例》、《江苏书院制初稿：礼俗编》、《明代江苏倭寇事迹》一文发表于1931年9月日本进攻沈阳后不久。

1948年，柳诒徵在新建的国史馆任职，被授予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职称。1949年在上海出版了他的《国史要义》

刘 瑞 恒

字：月如

刘瑞恒（1890.7.23—1961.8.28），1929—1930年任卫生部长和1931—1937年任卫生署长期间，奠定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基础。他在四十年代时与美国医药援华局合作，五十年代在台湾从事协调政府各公共卫生机构的工作。

刘瑞恒，出生在天津，1902—1904年在英华书院，1904—1906年在北洋大学读书，以后去美国进哈佛大学，1909年十八岁时毕业获理学士学位。以后进哈佛医学院，1913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医药博士学位，以后在波士顿市医院实习外科。

刘瑞恒于1915年回国，在上海哈佛医学院所办的医校教外科学三年，1918年进协和医学院任外科助理，1920年去美国在纽约洛氏学院跟从墨非医生研究癌症，又在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大学由勃洛德歇医生指导下做了几个月研究工作。1923年回国，任协和医学院外科教授及外科主任，协和当时是国内西医学教学和研究中心。1925年1月26日，他和泰勒医生为孙逸仙做了探查手术，发现他所患的是肝区和其他部位的不治之症癌症。孙逸仙于3月间死在北京，在协和教堂举行了基督教丧仪。

刘瑞恒一直认为并且宣传说公共卫生是较个人开业远为重要的事业，尽管后者收入较为丰厚。1928年11月，他同意担任国民政府卫生部常务次长，一年后，升任卫生部长兼任协和医学院院长，1930年起兼任国联卫生组织顾问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后兼任中国军队的军医外科主任，1931年4月国民政府改组后，他

就任新设的卫生署长，一个相当于内阁成员级的职位。

1928年到1937年之间，刘瑞恒为公共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1928年出版了全国卫生条例和西医从业人员的登记名册，1929年在南京召开中医药学会上，他又提出了卫生部三年工作计划，其中有在南京建立一个中央军医站，建立一个全国检疫所，在南京、广州设立妇产医院。一部全国性药典于1930年通过并于1931年出版。

刘瑞恒的行政才能，使他能在一个不了解公共卫生原则和实践，以及不了解现代医疗技术的国家内传播西医的知识。在他的主持下，在疾病预防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1934年10月远东热带疾病会议在南京召开，这是除1911年在沈阳召开的传染病会议之外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医学会议。这次会议在南京军医院对面的军医站召开，这两个机构都是在刘的主持下创办的。这次会议由刘主持，他在会上介绍了他任职期间取得的显著成绩。他赞扬协和同人，尤其是格兰特医生对他的这些计划所起的作用，他后来说他是依靠格兰特医生的顾问和合作”，又说“卫生部及全国许多城市和省卫生部门的高级成员，大都是格兰特训练出来的”。

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的不少卫生工作处于停顿，1938年刘瑞恒去香港。1942年，他去美国，1944年任国防资源委员会卫生署主任，负责争取和分配医疗物资，他又取得了美国医疗援华局的合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回国督促检查联合国援华医疗物资计划的执行，这项计划是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在华设立于行政院救济总署实施的。1946年，他在上海就任美国医疗援华局主任医师，着手把战后的救济工作逐步转为和平时期医疗机构的设立和医学教育的开展。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他们到国内各地考查军校和医院。

1949年，刘瑞恒去台湾，在台北协助建立一支经过训练的医务人员小队伍作为政府卫生事业的核心力量。他担任了美国医疗援华局在台机构的副主席和中国红十字会会长。1959年6月前，他还从事协调政府各部门公共卫生机构的工作，后因身体不好辞职去美国治疗休养。1960年台湾国民政府因他对公共卫生事业的贡献授以“明星”勋章。他一直担任美国医疗援华局主任的职务，直

至1961年7月因中风赴纽约住院治疗，8月28日死去。

刘 师 培

字：申叔

号：左龠

刘师培(1884.5.2—1919.12.20)，研究古文献的学者和热诚的共和革命党人。清代最后两年中，他曾在清廷任职，1911年革命后，致力于保存旧学术和旧的政治制度。

刘师培一家三代出了四个著名学者，高祖刘文洪，祖父刘毓崧、父亲刘贵曾、伯父刘寿曾，他们的祖籍是江苏仪徵，但已在扬州住了好几代。

刘师培习读中国古籍后成秀才，1902年中举人，1903年殿试落第后去上海遇见年青的反清革命党人章炳麟、蔡元培，刘参加了他们的政治活动，撰文反清，他改名“光汉”以示其推翻满族恢复汉族统治的革命热忱，《攘书》是最能代表他这时期思想的文章，该文的名称就是暗示推翻满清的。他在上海还与人力合办月刊《国粹学报》，筹办国粹学堂，二者都是出于民族主义思想致力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此外又担任蔡元培主办的《俄事警闻》编辑，该刊不久改名为《警钟日报》。他希望由此提醒国人注意俄国1904年入侵东北之举。由于该刊持反清立场，1905年4月被清廷查封。刘逃避到浙江平湖，后又在安徽芜湖的一所中学教书，1906年他在地创办《白话报》。

章炳麟在东京主编《民报》后，邀刘师培前去参加，刘于1907年到日本参与共事，同时加入了同盟会，这个组织是孙逸仙于1905年建立的。他与日本的一些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结识为友后，又创办了一份中国最早谈论社会主义的期刊《天义报》，又与张继合办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刘师培在东京创办的另一份报纸是《衡报》。他在日本的作品，除了反映出他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外，还表明他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1909年，刘师培忽然改变了他对民革的态度，与在日本的同道决裂回到中国，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府。这次突变，原因不详，但无论如何他终于在帝

制时期的最后两年中，为满清当局效了力。

1911年，清政府宣布将某些铁道收归国有，京汉四川铁路督办端方去四川镇压反对铁路国有的运动。1911年革命爆发时，端方正在去成都途中，11月被杀。陪同端方的刘师培逃往成都，在四川国学学校教书，并为该校出版的《国学杂志》撰稿。

1913年，刘师培到山西太原，办了另一份杂志《国故钩沉》，1914年去北京，1915年袁世凯叫他当议员，成了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拥戴袁世凯称帝。1916年袁死后，刘退居在天津，后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请，1917年到北大教书直至1919年因肺病死去。他在北京的最后几年中，为《中国学报》、《国粹杂志》撰稿。

刘师培于三十五岁时死去后，他的朋友和学生编选出版了他的七十四篇文章，分七册于1936年出版，书名《刘申叔先生遗书》，这套书收集了他有关中国经史的研究文章、论文、诗词、笔记，以及一些教材。研究笔记中有《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是关于由伯希和从敦煌所得十九篇稿本的详细注释。

刘师培虽被人们称为学者，尤其是关于《左氏春秋》的研究者，但他的不少著述缺乏深度和创见。作为一名多产的作家，他在自己办的以及和别人合办的刊物上对各种题目发表了他的见解，这也为开辟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道路出了力。

刘 思 复

别名：师复

刘思复（1884—1915.3），中国最初的无政府主义社团的创始人，《民声》报的创办人。

刘思复出生在广东香山的一个富裕家庭，幼受经史教育后于十五岁成秀才以后研究语言学，数学，中国古代哲学。二十世纪初，他和朋友们讨论维新派的思想，1904年去日本留学，次年成为孙逸仙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

1906年夏，他和一批革命党人回国，在香港的《东方报》工作。他参加同

盟会的秘密暗杀小组活动，为行刺广州的满族官吏制造炸药。1907年准备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刘志愿担当这项任务。他携带炸弹于6月去广州，但炸弹事先爆炸，炸去左手五指任务未能完成。他在近处就医，因有革命党人嫌疑为清政府逮捕，他的身份被查清后，由广州移送到香山监狱，在狱期间，他读了不少书，也写了一些书，其中有关于广东方言、狱中回忆，监狱改革等内容，地方当局对他关于监狱改革的文章很赏识，据说由此获得减刑。1909年获释后，他即去香港，又与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

人们认为，他在狱中就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感到兴趣。当时已有两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在国外成立，一个是在东京由张继、刘师培所创立，并于1907—1908年出版了《天义报》，另一个是在巴黎由李石曾、吴稚晖、张人杰创办的“世界社”并于1907—1910年出版《新世纪》，当时国内知道他们的人不多，但刘思复可能是从这些刊物，特别是从《新世纪》所载的文章了解了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及其他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他在香港研究了无政府主义的文献而信奉无政府主义，认为必须通过摧毁政府、财产、家庭、宗教，才能获得最终自由和人类平等。他为了把理想变成行动，在香港组织了一个恐怖主义的团体，其最近的目标是要暗杀所有的头面人物以消灭国内统治阶级。1911年8月，再次谋刺李准未成，此事发生后两个月在广州刺杀了满洲将军凤山。另一个计划刺杀的对象是摄政王，汪精卫已曾于1910年企图将他刺死。正当刘思复去北京实行这个计划时，武昌十月起义爆发，清朝覆灭，刘的计划已无必要。

刘思复到上海前，在杭州住了一月，他在西湖边的一个小寺院里设想了在全国开展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计划。1912年初，他到广州与一些同道，为了预言光明日子的到来，成立了“晦鸣学舍”宣传无政府主义。早在几年前，巴黎《新世纪》上已出现了有关无政府主义的论文和欧洲无政府主义者著作的译文，但由于清政府的查禁，这本期刊极难在国内获得。为使这些著述为人所知，刘思复和同仁们一起重新出版了这些论文和译作，起先作为小册子发行，1913年8月起在晦鸣学舍的期刊《晦鸣》上发表，该刊以后改名为《民声》。

刘思复认为在按照无政府主义路线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个人的新生是很重

要的。他可能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认为近代城市生活过于繁杂因而准备与一群朋友一起退居到香港北面的农村地区，以便过纯朴严肃的耕读生活。这一计划虽未实行，但因此而于1913年在广州成立一个“心社”，这可能是模仿在巴黎的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1912年1月组成的进德社而成立的。心社成员要严守十二项个人行为准则：不吃肉、不饮酒、不吸烟、不役仆、不坐轿子和人力车、不结婚、不取家姓、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参加党派、不从军、不入教。刘思复为推行无政府主义而开展的其他活动有创导世界语作为共同语言，认为这是实现人类大同的第一步，为此他组织了“世界语研究会”，会员据称有三百人，并且成为国际世界语学会的广州代表。

刘思复等人的活动很少招致广州当局的干预，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出版物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1913年夏，国民党和袁世凯之间的争执导致了二次革命，无政府主义者遇到了政治上的困难，刘思复拒不支持国民党，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政府组织谋求推翻另一个政府组织而已。但是一旦广州的国民党势力被袁世凯的亲信龙济光击败后，晦鸣学舍及其刊物也遭到袁世凯的查禁，刘思复将刊物转移到澳门，袁世凯又请葡萄牙当局将它查禁。刘思复躲避了几个月，然后到了上海公共租界，1914年4月，重新出版《民声》报，7月组成“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他为了取得与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联系，他写信给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报告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进展，并在《民声》报上报道了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的理想和目标大多取自克鲁泡特金的著作，首先在成立后发表的宣言中提出，以后又刊载在《民声》报上。该社的目的是要解脱政治权威和经济剥削而使人民获得完全的自由。现有的权威中，最强有力的是国家，因而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各种形式的政府。经济剥削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者致力于奉行与资本主义相反的社会主义原则。刘思复认为社会主义有两种类型：集体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实行国家所有消费资料则归私有；共产主义，主张实行生产资料以及一切产品的公共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后者。为了消灭各种形式的压迫，刘思复主张在报纸上，讲演会上，以及在学校里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宣传用积极和消极的反抗

来抵制各种形式的权威；拒绝纳税、拒绝服兵役、参加罢工和暗杀活动。他们在宣言中声称未来世界革命的最终后果是“没有地主、资本家、寄生虫、政治领袖、官吏、家长、军队、监狱、警察、法院、法律、宗教”的世界，将是一个公共负责抚育幼儿、开办学校、医院以及养老院的无阶级的社会。全社会的成员共同工作，平均分配一切劳动产品。

刘思复竭力维护无政府主义原理的完整性，他嘲笑张继等“新世纪”派，说他们参加国民党并在北京政府做官就是拿无政府主义原则做妥协。他强调无政府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同“温和派”进行争论“说他们把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混为一谈。他也因而批评孙逸仙采用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这在刘看来，不过是一种社会改良办法罢了。他尤其激烈的攻击社会党首创人江亢虎，他尖锐地批评江亢虎把马克思的集体主义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并且声称社会党的领袖对社会主义，特别是无政府共产主义，了解很少，他还进一步指出，社会党的政纲只要求对现行制度作一些相当温和的改良，这表明，江亢虎同孙逸仙一样，都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1915年3月刘思复三十岁时过早地死于肺病之前一直领导着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各种材料说明，他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人物，全力献身于他的理想。尽管他后来身患重病，经常卧病在床，尽管他左手残废，但他不但一直主编《民声》，还亲自校对和排版。他虽一身赤贫，却坚决谢绝友人要他出售印刷器械用以治病的建议。后来他们虽说服他进了医院，仍拒不为增强体质而食肉，因为这是违反他为中心社所订的行为准则的。据他的朋友说，刘思复严守禁例，与家庭断绝来往，取名师复，拒不结婚。但某些人士指出，1906年他在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之前，曾与香港一所女校的教师订婚，刘思复早年从事革命时她曾与他生活在一起。1927年，刘思复的朋友，为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师复文丛》。

刘思复之死，对国内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一个重大打击，《民声》到1916年11月停刊，但此后数年中，尤其在五四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京沪及其他城市的青年学生中相当流行。诸如《进化》、《民钟》、《自由人》等杂志仍宣传无政府主义，而在二十年代广州、长沙、上海的工人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也都是很出名的。

无政府主义运动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从多方面准备了基础，1920—1921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间可以见到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同情者。但在二十年代初期，随着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从合作转变成互相对抗了，这反映在无政府主义者欧声白与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之间长期的书面争论中。从此，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两翼相互在知识界和工会运动者中进行争夺。在这个斗争中，无政府主义者在二十年代中期就很快地把阵地丧失给了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运动走向衰落，到三十年代，它在政治界、知识界的影响变得无足轻重了，虽然一些分散的无政府主义小组和出版物依然继续到1949年。

刘廷芳

刘廷芳（1890.1.18—1947.8.1），民国时代基督教界中很有影响的人物，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书多年。

刘廷芳原籍浙江，在温州和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后去美国留学，1914年在乔治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18年获得耶鲁神学院硕士学位，192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心理学博士学位。他在美国求学时，曾任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主席，中国学生联合会东支部代表会主席，又是基督教协会季刊《留美青年》的编辑以及《中国学生月刊》的助理编辑。自1918年起，他在纽约联合神学院宗教学系教书，他是在美国神学院教非中文课程的第一个中国人，同时又是宗教教育协会会员。

1920年，刘廷芳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燕京大学神学院神学教授。1921—1926年，任燕京神学院院长，燕京大学校长助理，1922年5月2日到10日在全国基督教大会上他是主要发言人之一。在讲到中国基督教徒要求有什么样的教会时，他说道：“教会应该教导它的信徒容忍异见，又能爱护别人”。他继续在北京大学教书并任北京某教堂名誉牧师。1925年3月，他协助在协和医院为孙逸仙主持了基督教丧礼。在此期间，刘廷芳是公理会教徒，参加了世界学生基督教协会活动，并参与组织1922年建立的

中华全国基督教会的活动，任该会理事达十年之久。他又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青年会全国委员文献部委员。

刘廷芳对中国的教育工作影响很大，他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办者和负责人之一，1923年任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标准测验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所制定的测验标准由全国教育促进会广泛运用于1924年对中国国立学校和基督教教会学校所作的调查工作中，刘任行政秘书，1924—1927年任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主席，这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个中国人。

1926年，刘廷芳去美国耶鲁神学院、哈德福神学院讲学。1927年在密得贝学院、奥勃伦学院得名誉学位，是年夏，出席在瑞士洛桑召开的国际宗信会议，又代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参加在德国召开的教会促进国际团契世界联合会会议。此时，他已成为中国基督教领袖人物中最有发言权的人物之一。他去伦敦在市修道院讲经传道以后，《笨拙》对他的名声，人品和语言才能（他能讲八种语言）很感兴趣，发表了一首《刘博士》的诗以志欢迎。1927年秋，刘到美国作波士顿大学客籍教授，1928年在缅因州班哥尔神学院和芝加哥神学院讲学。

1928年夏刘廷芳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职。他职务繁多，不得不缩减教课时间。1930年他被一致选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大学委员会主席，其后五年中又每届连续当选此职。他又是基督教教育奖学金组织的主席，他又是调查中国小学教育的一系列委员会的成员，又是一些企图在中国推行标准汉字的委员会的委员。

刘廷芳对教育和基督教事业的贡献，还在于编印了一些著名杂志，如1920—1924年的《生活杂志》，1924—1926年的《真理周报》，以及《真理与生活杂志》，《阿美西斯季刊》、《明日教育》等。作为1932年由六个基督教社团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的主席，他编写和翻译了一些赞美歌，并主持出版统一的中文《赞美诗》，该书于1936年出版后，为国内基督教团体广泛采用。

1936年刘廷芳出任立法委员，翌年作为代表参加在牛津和爱丁堡举行的基督教大会世界委员会会议，牛津会议的主题是“生活和工作”，爱丁堡会议的主题是“信仰和秩序”。1938年他去印度但白伦参加国际传道会议，当时，中日战争已爆发，他已不能回到华北，因此在上海住了下来，一直到1941年底。

刘廷芳身体羸弱，三十年代末时多年的繁重工作毁坏了他的健康，1942年他去美国因治疗头痛、呼吸困难，以及体质虚弱不能工作等疾病。他于1947年8月1日在新墨西哥，阿尔贝奎克的一所长老会医院中死于肺病。

刘廷芳是民国时代提倡基督教生活方式的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人。他用有力而明白易懂的语言阐明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并用这些观念来说明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民主、科学革命，以及中国从传统的过去转到现代所必须解决的各种问题。虽然他的某些同仁认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信徒有着过多的异端色彩，但却一致赞扬他对几代中国学生发生了强有的影响，为培养他们而作出了重大的努力。

刘 文 辉

字：自乾

刘文辉（1895—），四川军人，1927—1945年任二十四军军长，1928—1945年任川康边防督办，1929—1932年任四川省主席。后又任西康省主席。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职，1959年任林业部长。

刘文辉是四川大邑人，从入学起即受军事教育，曾进成都初级陆军学校、陕西陆军中学、北京陆军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回四川，升为旅长，因平定顽匪马步云有功升为第九师师长，后调任三十一师师长。

1925年4月，奉他侄儿刘湘之命，进攻杨森，年底驱逐杨森出川，刘文辉在刘湘手下任四川军务帮办。1926年春末刘湘和杨森和解后刘文辉辞职。1926年底他宣布效忠国民党人，将所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他担任此职到1946年，二十四军是他的政治权力的基础。

1927年6月西康军务善后督办刘成勋宣布辞职，川南和西康一部分地区归于刘文辉管理。为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国民政府于1928年夏任命刘文辉为川康边防督办。

1928年10月31日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四川省长。杨森等人

反对这项任命并通电谴责刘湘和刘文辉，内战由是爆发。由于郭汝栋在12月底倒戈，二刘在此次战争中获胜。1929年3月刘文辉就任四川省主席职。

刘保留了他的川康边防督办的职务。1930年中，大金寺和白利土司发生争执。藏族人拒绝汉人调停，当地土司偏向一方，进攻大金寺，挑起汉藏之间的长期斗争。1931年5月，汉族失去了甘孜、白利、瞻化，不久南京蒙藏事务委员会代表唐柯三到成都，要求刘文辉以兵力支持谈判，刘拒不支持，唐于7月到西康，派其部属到甘孜与藏族谈判。

经过谈判与藏族方面达成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临时协定，但南京方面不予批准。此时，国民政府授予刘文辉处理局势的全权，刘文辉与当时青海玉树司令马步芳共同制定了进攻计划并且攻克了甘孜和瞻化。他继续前进，并于1932年7月到达金沙江边。10月初，他与当地藏族人士签订协定，稳住了前线。

1932年秋，刘湘、杨森、邓锡侯联合攻击刘文辉，战争于12月间停息，双方在内江开会谈判。刘文辉回成都，请辞省主席之职，南京政府未予允准。1933年5月，刘文辉、邓锡侯之间又发生内战，7月，南京政府任命刘湘为剿匪总司令，同月，刘文辉又提出辞职。10月，刘湘就任，刘文辉退往西康。

1934年12月，西康建省而设立一个委员会，刘文辉就任主席。1935年撤出江西的共产党进入该区，1936年又有西藏的自治运动不断引起战乱，刘文辉终于在1936年11月在该地区立定脚跟，着手使西康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组成部份。1938年，刘文辉兼任蒋介石重庆行营付主任。10月，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这个职位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刘文辉继续在西康工作，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建立，刘文辉就任主席。

十多年来，刘文辉等人所统治的西康实际上是一个自治地区，他控制西康的办法是掌握关键岗位的人选并依靠总部设在雅安的他自己的第二十四军。省政府设在康定，他本人却住在川西的成都。西康和国民政府之间只有松弛的关系，它在经济上也依然落后。但在刘文辉的统治下，西康在贸易上却处于重要地位，因为它是中国和西藏进行贸易的主要通道，也是转运鸦片到中国其他地区的重要来源地。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国共重又开战，国民政府解除了刘文辉二十四军军长

之职。1949年12月，国民党准备放弃大陆最后据点四川时，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宣布向共产党投诚。

1950年—1954年，刘文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任职，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10月，他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4年他是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四川省代表。并且成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特邀代表和常委，1955年1月，成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他的最后一项重要任命是在1959年4月就任林业部长。

刘 文 岛

字：尘苏

刘文岛（1893.4.3—1967.6.11），在国民政府中历任驻德奥公使（1931—1933），驻意大利公使、大使（1933—1937，1934年升格为大使）。

刘文岛湖北广济人，其家庭及早年情况不详，十岁时曾投奔军队，因年龄太小身体矮小被拒，但他坚持从事军事生涯，三年后，借用朋友的文凭投考湖北初级军校，他通过了入学考试但暴露了自己的真名实姓，于是被带到该校校长面前，许其用本名入校。刘以在校成绩优秀转入湖北第三初级军校，1909年入保定军官学校学生班，次年转入一期陆军科。

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后，军校停办，刘文岛南下去上海，在陈其美手下任连长。民国成立后，1912年7月回军校。不少曾参加革命的学生，对主持该校的北洋旧军人表示不满，选出代表向校方提出改革校政的要求。刘文岛是代表小组的头目，陆军科代表是唐生智，炮兵科代表是陈铭枢。12月，蒋方震继任校长，但陆军总长段祺瑞支持北洋旧军人，其中很多人是他的被保护人，段对蒋方震申请拨给学校经费置之不理。1913年6月，蒋企图自杀。刘不顾同学要他忍耐三个月直到毕业的劝告，与蒋一起离开学校。同学们凑集款项资助刘去日本留学，他抵日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学法律，又去早稻田大学学政治。他认为国人对政党组织缺少了解，于是就写了一篇专文《政党政治论》。1916年秋毕业后回国，把这篇文章送给梁启超，深得梁的赏识，1918年12月，梁与蒋方震去

欧洲时，把刘文岛也带上了，刘到欧洲后不久进了巴黎大学。

1920年11月，刘文岛与他的妻子翻译法国社会主义者让·儒尔的《新军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在蒋方震主编的《改造》杂志上发表《国防与国际和平》、《中国军备和世界和平》两篇文章。1922年夏刘一度回国筹集求学费用，事后回到法国，1925年，和他的妻子一同获得博士学位。

1925年夏刘文岛回国，任武昌中华大学教授。不久，他在保定军校的同学陈铭枢请他去广州见蒋介石，蒋、陈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他提出，去湖南现在军中服务的旧时同学中开展工作，是年冬他去到长沙，应湖南督军赵恒惕之请，在湘军军官中作了讲演。他发挥了《新军论》中的观点，认为军队要争取胜利必须依靠某种基本原则，而中国的军队就必须依靠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这次讲演获得好评，后来唐生智把它发表了。

唐生智取代赵恒惕并支持国民革命后，刘文岛任唐生智新建的第八军党代表。1926年7月北伐开始，刘文岛任蒋介石前方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秋天，武汉三镇攻克后，刘就任汉口市市长，市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官员。1927年3月，宁汉分裂，刘文岛免职，5月，他在南京和陈铭枢共同担任蒋介石军队的政治部副主任，因吴稚晖未就主任职，刘文岛不久任代主任。1927年8月，蒋介石辞职，刘亦辞职，但仍充任蒋介石的政治上的代言人。

1928年冬，刘文岛支持唐生智东山再起。唐控制了华北的湘军，把白崇禧赶走，刘文岛再次任汉口市市长，当时汉口已成为特别市。1931年他兼任湖北省民政厅长。

1931年9月16日，刘文岛被任命为驻德奥公使，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他的外交使命就更重要了。1932年他代表中国出席日内瓦世界裁军会议。1933年9月13日调任驻意大利公使，一年后，南京罗马双方同意将使节升格为大使，1934年10月17日，刘文岛为第一任中国驻意大利大使。他的主要使命是取得意大利的援助，他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意大利派出财政、海、空军顾问到中国，为中国的第一座飞机工厂的建设和运行提供装备，并为中国在意大利学习军事的学生提供训练和住宿条件。

1935年刘文岛缺席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担任此职直到1950年。1935

年，中意关系开始逆转，因为中国是在是年10月的国联会议上与大多数与会国一起投票多次谴责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赞成对意大利进行制裁。1937年11月，意大利与德国、日本签订反共协定，给予满洲国以正式的外交承认，刘文岛过去曾坚持继续与德、意保持外交关系，此时遂辞职回国。

1938年国民政府迁到战时首都重庆，刘文岛卜居重庆，在最高国防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任职。1941年他出版了《行业组合论》，1943年出版了《行业组合与近代思潮》，1944年出版了《意大利史地》。

1945年5月，太平洋战争将行结束，刘文岛任中华大学代理校长，筹划将学校自中国西部迁回武昌。战争结束后，任华中地区慰问团专员，访问了江西、湖南、湖北。1947年主持闽台委员会调查台湾省长陈仪及其下属在台湾的暴行，1948年国民代表大会开幕后，刘被选入立法院。

1950年后，刘文岛在台湾退休，同时也为报刊写文章，1954年去美国作短暂逗留回台湾后写了两本书，《中意关系的回忆》、《人生哲学》。1967年6月11日死在台北，年七十四岁。

柳 亚 子

原名：柳慰高

字：人权

柳亚子（1887.5—1958.6），中国古体诗最后一个杰出的诗人。他又以学者和南社的创始人而知名。

柳亚子出生在苏州吴江县的一个世代书香的绅士之家。他的父亲柳念曾（1866—1912）是一个秀才，叔父是数学家和书法家。柳亚子幼年在母亲的训诲下习读儒家典籍和唐代诗词，十一岁起，就学习写诗撰文了。

1902年柳亚子十五岁时应县试中秀才。他和当时的一些青年一样，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影响，不久又卷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活动。1902年章炳麟、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在上海创设“中国教育会”，着手推行现代教育。翌年，年青的柳亚子加入了“教育会”进入蔡元培主办的

新式学校“爱国学社”求学，1904—1905年，柳亚子先在“自治学社”上学，后在“健行公学”教书，1906年加入孙逸仙创立的同盟会，他用写作爱国诗词和文章积极投入革命运动。

柳亚子早期最重要的活动是他组织了一个“南社”。它起先是江南沪、杭、苏一带文人结成的一个团体，柳亚子、陈去病、高旭是其中的主要人物，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第一次聚会，以后逐渐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社团，吸引了不少著名作家参加，从最初的二十余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南社，这个民国时期的传统文学的最后一个重要集结点，也以其成员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知名。它的成员原来并不正式信奉某种政治观点，但是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加入以后，给南社带来了革命的气息，当时正是反清起义的1911年和民国初年。

1911—1912年柳亚子在上海是个活跃的报人，编辑几种支持革命的报纸，例如《笔铤报》、《天铎报》、《民声日报》、《太平洋报》。他还在南京孙逸仙办公室担任短期的秘书之职，但不久离职回上海继续从事报业。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革命者同袁世凯进行和平谈判。1912年2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柳亚子厌倦政治活动，回到吴江县。

此外数年，柳亚子从事文学活动，撰写诗文并编订南社同人的著述。南社同人每半年在上海聚会一次，经常刊印社友诗文新作。1910年—1923年间，先后出版了诗文集二十二种，二十三册，不包括191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集。在此期间，柳亚子还在吴江县收集了当地很多诗文，编成一个集子，几百种珍本和手稿需要一一誊写保存，柳亚子本人也亲笔誊写了好几种。

南社存在的十四年间，柳亚子作为南社的领袖，结交了国内不少作家和政界人物。南社最后解体，表面上的原因似乎是由于对唐、宋诗体孰优孰劣的不同评价。以柳亚子为代表的一派倾慕唐代诗体，对近代作家中，推崇十九世纪的诗人和革新派龚自珍。而陈三立、郑孝胥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派则服膺“同光体”（1862—1902年）。“同光体”就其渊源来说是南宋诗派。南社内部争论和解体的真正原因，却在于柳亚子日渐感觉到传统的中国文学语言不足以表达近代中国的思想和感情。他十分赞同李大钊、胡适领导采用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

柳亚子自己也开始用白话写文章，虽然也承认他用白话写诗没有什么成就。在文学观点上的这种变化，终于使他辞离了南社。1923年，他又组织了一个“新南社”，目的在于通过介绍世界新思潮和重新评价中国古典文学来创立一种新文学，但是，“新南社”的成就不大。

柳亚子被华南的国民党和革命力量的新的崛起所吸引，那正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和在广州建立新政权的时期。在此之前他在自己的家乡积极发展国民党的地下组织，这时就被推举为国民党江苏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宣传部长，1926年他去广州出席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不久，当时广州军事头领蒋介石对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斗争所采取的态度，使柳亚子深为不满。柳亚子是亲近廖仲恺的分子，他竭力主张坚持孙逸仙联共联俄的政策。

柳亚子由广州回到吴江县，不久因孙传芳统治了苏浙而去上海避居几个月。1927年5月，柳亚子因蒋介石清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而被迫逃到日本。在日本流亡将近一年后，他于1928年4月从日本回上海，他拒绝参加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因为他认为这个新的国民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是和孙逸仙的遗训背道而驰的，然而，在1931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柳亚子还是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2年上海市政府任命柳亚子为“通志馆”馆长。此后几年中，在柳亚子的主持下，出版了好几种年鉴、上海地方史资料。

1937年，年中中日战争爆发，中止了他的这些工作。日本占领时期，他在上海住了近三年。他断绝一切政治交往，过着隐居生活，专心致志收集南明遗族于十七世纪下半叶反抗清朝征服者的历史资料。1940年4月，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登场。柳亚子决心被这个曾经一度是国民党左派、又一度加入过南社的汪精卫胁迫参加伪政府，所以在12月仓促离开上海去香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时，柳亚子从香港发电报到重庆，斥责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为。他因此被开除出国民党。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柳亚子遗弃了辛勤积累的南明史料逃往内地。他经过粤南海丰游击区于1942年6月到达桂林，此后二年，他专心致力于文学活动，写了不少作品。1944年他去重庆再次投身政治活动。1945年加入民主

同盟.又同别人一起创建“三民主义同志会”，并从1946年到1948年担任该会主席。

1945年底，国共两党政治上的冲突扩展成为内战，柳亚子当时回到上海，他发现自己作为民盟的一员在上海是不安全的，1947年又去香港参加了一个反蒋组织。1948年1月参加以李济聚为主席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加这个组织的除柳亚子之外，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如：冯玉祥、何香凝、谭平山。1949年柳亚子到北京，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1949—1954年他曾参加政府委员会，1954—195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因为年老多病，他很少参加公众活动，也很少著述，甚至与家人也很少通信。1958年6月因肺炎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柳亚子的主要贡献在文学，特别是诗词方面。他是中国古体诗词最后的杰出人物之一，并且是同时代中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只是偶而编印了几本自己的作品，主要的有1927—1928写作的《乘桴集》，1947年写作的《怀旧集》。他的大多数早期诗词文章，可以从南社的大约二十本集子中找到。他的两个女儿柳无非、柳无垢编印了《柳亚子诗词选》于1959年在北京出版。柳亚子是一位热诚的目录学家，书画收藏家，他孜孜不倦地编印了他的友人们的文学遗作，著名的有1928年编印的苏曼殊全集。柳亚子还有与毛泽东的诗文友谊，两人曾几次以旧体诗相互唱和，而且看来与毛的几首著名的诗词的形成直接关系，包括《雪一沁园春》，在这首词里，毛泽东用暗示的手法把自己与中国历史上几个主要人物作了有利于自己的对比。

柳亚子不善于料理家务，全靠他夫人郑佩宜的照料。他们是于1906年结婚的。在漫长的岁月里，郑佩宜一直陪伴柳亚子，和他共同奔波，同经患难。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1907—）毕业于清华大学，于1931年取得耶鲁大学英文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在印第安那大学教中国文学。

罗 常 培

字：莘田

号：恬庵

罗常培（1899.8.9—1958.12.13）学者、教育家，因研究古代音韵和中国方言而知名，1949年后在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罗常培生在北京，出身于满族家庭，原籍吉林宁古塔。他早年就在新式学堂读书，同学中有舒庆春，以笔名老舍著名，两人以后成了终生好友，老舍说过，他的短篇小说《垂毛儿》是描绘罗常培的，罗常培幼年时是性格开朗、勤勉、可亲而又固执的孩子。

罗常培自父亲死后，家庭经济困难，十七岁时在参议院当录事，后入北京大学学习中国文学。罗在参议院当录事时，他有机会耳听手录各地方言，增加了他对语言学的兴趣。罗常培于1919年在北大毕业，没有钱出国留学。当时北大哲学系有不少国内外的学者如胡适、梁漱溟、蒋梦麟及外国的杜威·罗素，所以他仍留在北大。哲学系的同学中有朱自清、顾颉刚。后来都成为有名的学者

1921年春，罗常培开始了教书生涯。他一面在北大读书，一面在北京市立第一中学教中文。是年秋，他去天津南开中学教书，1922年回北京，任市立第一中学校长。1923年二十四岁时任西安西北大学中国音韵学教授，1928年发表第一批学术著作《切韵序校释》、《切的答疑》、《双声叠韵说》，讨论了中国文字的拼音和韵律。

罗常培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引起了他对中国方言的兴趣。1926年他在厦门大学教书时开始研究厦门方言。1927年他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此项工作遂告中断。1929年他进了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在语言组赵元任手下工作，他为赵元任的知识，特别是对拼音方面的知识所鼓舞，重新研究厦门语，并于1931年发表了重要的专题论文《厦门语系》，此文后来成了一本研究中国主要方言之一的厦门语的典范著作，阅读此书对于研究中国古语声韵是极有价值的。

1934年秋，罗常培继7月去世的刘复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但仍继续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在赵元任主持下研究各地方言。他和赵元任以及李方桂翻译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同时又就中国古代音韵学另行出版了一些书籍和发表了一些文章，如1933年的《唐五代西北方言》，1934年的《国音字母演

进史》，1935年与刘复合编的《诗韵新汇》。

1937年春，罗常培离开北平去昆明，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继续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后来回顾说，他们在开始时，对西南的口语方言并没有作系统研究的很大兴趣，因为他们觉得它与北方官话相似。后来，他认为方言研究不仅可作古今发音的比较，而且可以集中注意力研究某种方言的特殊词汇，更重要的是要绘制出全国方言图，标出重要的语系。他建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利用当时的机会对云南省的方言作全面调查。他的建议被接受，中央研究院在战争期间进行了这项工作。在罗常培所调查的云南方言中有：昆明、连山、巴夷、贡山、兰坪、拉马底、大理、腾衡、洱源、云龙、泸水。

在战争年代，他注意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观点来研究语言学。例如，他考查了藏罗常培起先是一名音韵学家，但是他并不限于此。语和缅甸语词汇的亲缘关系之后，曾由此探明藏族与缅族之间以及与中国西南部部族之间的历史关系。此后，他继续用社会学人类学的观点研究语言学，并且写成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

1945年—1948年，他以中国语言文学客籍教授的身份访问美国，先在波慕纳大学、后去耶鲁大学，在此期间，他用英文发表和宣读了几篇文章，如《中国语言研究中印度的影响》，发表在《中印研究》1945年三月号上，《贡山独龙族初步研究》发表在1945年三月的《哈佛亚洲研究》上，1947年四月在美国东方学会上宣读论文《汉语中的印度语借用》，八月在美国语言学会宣读《景观语言中的前缀N》。

1948年秋，罗常培回到北平，任北大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长。共产党包围北平时，他关在书房里继续写1943年动笔的《语言与文化》，此书在1950年出版，其他部分大都是在共产党取得北平之前写成的。这部著作从两方面说都是他的最后的重要著作。第一，这是他最后的非政治的学术著作，第二，这是揉合了他各方面的兴趣的作品，如语音学，语言学，字义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在这本著作里，著名的西方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如沙比、帕默、泰勃、马林诺夫斯基对罗常培的影响可以看得很清楚，他采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强

谓指出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离的，并且以他个人研究所得说明这两者的关系。他提出中国语言学工作者应该仿效西方学者注意从总的文化背景出发研究语言，而对语言的起源，传播、演变的考查又可以促进对中国过去的文化的了解。

1949年之前，罗常培的著作并无倾向社会主义理论的征象，而且，事实上他又是一个国民党员。他后来说，1948年他回北平，并非对出现一个新政府有所期望，不过想与妻儿书稿团聚而已。他对共产党政权缺少热忱也从他在1949年北平围城期间关在房门里写《文化与语言》一事中反映出来。1949年底，他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未被接受。同时，他严格地作自我批判，热诚拥戴共产党的路线。这些活动，使他获得了一系列任务：1950年任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1951年任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2年7月到1955年三月，任《中国语文》月刊主编，并自1955年起担任该刊编辑委员一直到他去世。

罗常培患有高血压病，但他一直到临死时还是继续研究和写作。1957年与王均合写了《普通语言学纲要》。1958年12月13日去世。他的几部作品在他死后出版，其中有1958年出版的《汉魏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由蔡美彪协助编写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于1959年出版，以及1962年出版的《汉语音韵导论》。1963年又出版了《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去世不久，在《中国语文》上刊载了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和大语言学家的文章，也刊登了他的著作目录。

罗 振 玉

字：叔蕴

叔言

号：雪堂

罗振玉（1866.8.3—1940.6.19），一名重要的研究中国古籍的学者，考

古学家，目录学家，他是满清遗老，日伪满洲国的支持人。

罗振玉原籍浙江上虞，出生在江苏淮安，他父亲罗树勋（1842—1905）在1875年与几个朋友合开了一家当铺，1881年经营失败，同年罗应县试，此后，他父亲署江宁县知县，匆促上任，留下债务，由家人处理。罗母方氏二十年中艰苦度日，于1902年偿清债务，抚育了五子六女后于1903年死去。罗振玉系第三子，当时也就业资助家用。1891年，他赴省应试未中。

第一次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促使许多青年探讨强国之道。1896年，罗振玉和朋友蒋伯斧（1866—1911）去上海创办了农学社，翻译日本及西方农业书籍，该社于1897年创办《农学报》，1898年出版《农学丛书》。同年，这两个朋友还创办了一所语言学校东文学社，讲授日语、英语，学生中有王国维其人。

罗振玉在上海的工作，使他获得了农学专家和新教育学家的声誉。1898年冬他应两湖总督张之洞之聘去武昌，为湖北农业局作咨询并任农校教席，同时在江楚译书局任职。1901年，张之洞派他去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回国后，1903年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请，为两省教育制度的改革作参事。他在广州收购了康家学海楼藏书，从而大大增加了自己的收藏。1904年夏又由江苏巡抚端方之聘去苏州谘询江苏教育，在苏州办了江苏师范学堂。

1905年北京新设学部，罗振玉全家迁往北京，就学部之职，他因身处北京不能主持农学社，东方学社乃于1906年关闭。罗任学部督学，1907年去河北，山西，1908年去山东，河南、江西、定陵视察。1908年任学部代理和负责考试回国留学生的副考官，1909年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革命后，罗振玉及女婿研究甲骨文的先驱者和王国维全家迁居日本，他在京都住了八年，偶而回国。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批考古文章，1915年去河南定阳殷墟遗址，该地曾于1899年发掘出占卜兽骨，为研究中国古史开辟了新的前景。罗于1919年回国，定居天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1922年12月溥仪结婚，罗振玉和不少满清遗老前去向这位逊帝道贺，1923年入溥仪“内廷”。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宫，他竭力保护溥仪的安全及其特权。溥仪去天津日租界内居住，罗成了他的三名顾问之一。1928年底，得知日人恢复溥仪帝位的打算，罗乃移居日人所控制的大连。这时，他和郑

孝胥之间的不和加深，1931年底溥仪去旅顺后，日方建议以满州和蒙古组成一个由溥仪为名的共和国，罗、郑两人遂发生冲突，罗坚持建立日本曾经答应过的帝制，而郑则同意接受成立共和国的主意。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罗振玉很失望。溥仪当上了执政，但并不是皇帝。1934年3月溥仪终于登上皇位，日本人大批涌入满洲，成为满洲国公民，并担任重要官职。罗于1933—38年任考试院长，以后退居大连，1940年6月19日死在那里。他在自传性的《集参编》中对自己忠于满清导致成立满洲国表示遗憾。

罗振玉持续收集，编订出版了一些文献和研究文章，对中国学术界贡献很大。他的著述很多，主要的是在考古和历史方面，最主要的是1909年的《敦煌石窟记》，1911年的《殷墟书契简编》（1933年有续集出版），1924年的《殷墟文字书契类编》。他的著作全目，载于《罗雪堂著述目录二卷》，此文由1962年重新刊印于东京的《东洋学报》东志上。罗振玉还自行出资刊刻了一些目录学珍籍，他还致力出版由满洲国政府于1937年在东京印行的《清实录》。

罗 家 伦

字：志希

笔名：毅

罗家伦（1896—），他在北京大学当学生时就成为五四运动的一名领袖人物，1928—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41年任中央大学校长，以后又任新疆监察使，1946—49年任驻印度大使。

罗家伦原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西，父亲在该地当过知府，三岁时，就由母亲教他读写，五岁时，父亲就教他做诗。1904年，他母亲去世，由父亲抚育他和四个姐妹。1912年民国成立后，罗到上海进新式学校复旦公学。他接触了新思想和上海的新出版物后，开始在学校出版的刊物上写文章。

1917年夏，罗家伦考上了在上海招生的北京大学，秋季入学，主修外语和外国文学，同学中有傅斯年、段锡朋等人，他和傅常去拜访白话文运动的领导

人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胡适，经过多次讨论后，1919年一月一日和傅斯年创办了《新潮》杂志，创刊号中有十篇文章出于傅斯年，三篇出于罗家伦。杂志所信守的三条原则是：批评精神、科学思想，改革文风。罗家伦同时又是《东方杂志》的经常投稿人，并在《新青年》上发表所译的易卜生的一个剧本。

1919年四月底，北京得悉巴黎和会上准备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予日本的消息，五月三日，北京大学学生集会，决定翌日游行示威，罗家伦是二十名学生代表之一，他们负责与各校联系发动游行示威。五月四日，各校代表集会准备向各国外交官员发表声明，学生群众在是日下午集合，不理军警和教育部的劝阻开始游行，在使馆区（东交民巷）入口处为军警所阻不能前进，乃派罗家伦等三名代表去英、美、法、意公使馆。这一天正值星期日，公使们不在，而由四使馆人员接见代表。罗家伦等宣读了书面声明后，即赶往游行队伍，是时群众队伍已表现得耐烦，拥向亲日官吏曹汝霖住宅，企图加以捣毁，于是同军警发生冲突。军警逮捕了一批学生，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学生的游行示威遂发展成为一次全国性的爱国运动。

罗家伦在这次运动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1919年5月26日，他用笔名“毅”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在印刷品中采用了“五四运动”这样的用语，以后就成为这次运动的正式名称了。他在文章中指出，5月4日的事件，表现了中国学生的牺牲精神，中国社会的团结御敌精神和中国民族的自决精神。1920年5月他又在《新潮》上发表《过去一年中学生运动的成功和失败和我们未来的方针》一文，这篇文章主张将运动引入学术研究的正道，并且致力于促进民众的福利，该文在上海《申报》上转载后广为流传。

1920年秋，罗家伦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历史及哲学，1922年他在英国进了伦敦大学，以后又去德国柏林大学两年，1925年去法国进了巴黎大学。

1926年夏罗家伦回国，受聘在东南大学教书，不久，投奔蒋介石，任蒋介石军事司令部编辑主任，准备北伐的工作。1927年八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中央党务学校，罗家伦在戴季陶手下任副教育长。1928年3月，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科主任，随同北伐军到了北方，5月3日济南事件发生时，罗家伦和熊式

辉受命于5月9日与日方谈判，但为日方司令官所拒。

1928年8月17日北伐结束，罗家伦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学堂于1925年由国民政府改为大学，罗家伦就任时面临着拟订学校章程等任务。他于9月18日就任，宣布取消该校毕业生多数赴美留学的旧制度，改为实行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选派少数优秀学生赴美留学，还着手建立各个学院和学科并开始招收女生，扩建校舍，聘请教授，增加图书，把清华大学的隶属关系从外交部转归教育部，并把学校经费从外交部转归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掌管。1930年5月，阎锡山的势力控制了北平地区，清华校友中一些反对罗家伦的人发起罢免他的活动。5月23日，罗辞职离开北平，准备以更多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应聘就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1931年3月，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性及其方法》一文。当时，蒋介石要罗家伦或去北平或来南京。1931年1月31日，罗在南京就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不久即宣布决定将该校改为四年制大学。

1932年六月，教育部次长段锡朋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该校因学生反对，长期没有校长。当段锡朋准备就任时，又被学生殴打，行政院乃下令解散该校，7日，由教育部着手处理此事。罗家伦任该校改组委员会成员，8日任校长。学生属于他采用的对学生进行甄别的办法，10月间全校开始复课，罗恢复学校稳定局面的措施获得成功。1933年国民政府令中央大学成立航空系1934年开班时有学生28人，1935年又增设水利工程系。在此期间，罗家伦对大学的设备、课程、人员都作了改进。1936年决定新建校舍，并已选定新校址，此项计划因中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止。1937年8月，该校奉命迁到重庆，罗获准动用原拟在南京建筑校舍的经费在重庆地区建校。1937年10月11日，分别在重庆、成都（医学和牙科）开课。

1941年9月离职前，罗家伦一直在努力发展中央大学。10月，他出任云贵考察团团长，为准备派远征军去缅甸打前站并借此消除云南地方当局省长龙云对远征军的恐惧，罗家伦此行获得成功，于12月回重庆。

1942年间，罗家伦因父病拒绝各种任命。1943年3月1日就任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次日，他父亲死在贵阳。他料理丧事后，回重庆准备就职，

6月离重庆，去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考察，8月到乌鲁木齐，9月，奉国民政府之命陪同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到重庆，10月他去兰州同团员们会合，共同考察了黄河上游，11月到宁夏、为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作《青海之歌》，之后考察团回到天水，以两个月时间，写了共分十四册的报告。1944年3月底，罗家伦等一行回到重庆，继续任新疆监察使直到1945年一月，后因与张治中、包尔汉对解决伊犁叛乱问题意见不同而辞职。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1945年10月，罗家伦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去缅甸、印度波斯湾、地中海等地的战区，以后又到伦敦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1946年3月经美国夏威夷、关岛、菲律宾回到重庆。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他在张继手下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1947年2月，罗家伦出任驻印度大使，当时印度尚未独立，所以他向英国总督呈递了国书。罗家伦虽然与印方官员关系很好，但因国内内战形势恶化加上棘手的西藏问题，因此，他在印度期间成就不大。由于印度政府对西藏问题态度暧昧，所以中印通商贸易谈判未获成功，又因为印度地图上不承认西藏为中国疆土，当1949年七月西藏当局令汉族代表离开西藏时，印度对此加以支持。1949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政府召回驻印外交人员。1950年初，罗家伦离新德里到了台湾。

罗家伦在台北继张继出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1952—54年任行政院副院长，1953年负责主编《革命文献》，这是国民党及历史研究院文献的多卷编纂本。1954年出版了他的《六十年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1964年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七十年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后又任《国父年谱》主任编辑。1958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罗家伦还写了一些旧体诗和新体诗，他还是一个书法家。

罗 隆 基

字：笏生

罗隆基(1896—1965.12.7)，受西方教育的政治学家，他在国内以编辑

《益世报》，《晨报》而知名，中日战争期间，又以在民主同盟中的活动而知名，1949年后在中央人民政府任职，1956年任林业部长。他想以在民主同盟中的高级领导人的地位组成一个忠实的反对派。1957年，他和章伯钧以组成右派联盟而受到谴责，然后一起被撤销了所有职务。

罗隆基出生在江西安福县，早期接受旧式教育后，于1912年到北京进清华学堂，参加学生运动，成为领袖人物，任清华学生会主席，及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主编，他还积极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由于这些活动，他在校完成课业的时间由原定的八年延长到九年。

1921年，他由清华毕业后，庚款留学美国，在威斯康辛大学先后于1923年，1925年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并曾去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拉斯基指导下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然后又去美国进哥伦比亚大学，1929年以论文《英国的议会选举》获得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继续积极参加中国学生的活动，曾一度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主席及《中国学生季刊》编辑。

1928年罗隆基回国后，任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文学杂志《新月》由北京迁到上海后，任该刊编辑，此后在这份杂志上出现了时评和政论文章。胡适于1932年创办《独立评论》之前，把自己重要的政论文章大都发表在《新月》杂志上。

1930年11月，罗隆基因强烈批评国民政府而遭到逮捕监禁和撤除了在光华大学的职务。1931年初获释后出版了《人权论集》，以后去天津，在南开大学任讲师，主编天主教神父雷鸣远创办的《益世报》，由于该报得到外国人支持，所以能相对地免受国民政府的控制，罗隆基不久也以一名敢于直言的报人而知名。

1932年，罗隆基和张嘉森的一个新政党联合，二年后，在天津召开全国会议成立了国家社会党，因国民政府禁止组织持不同意见的党派，所以1938年之前，国家社会党一直是个秘密组织。可能由于与张嘉森的关系，罗于1936年任《晨报》主编。罗又参加了其他一些组织意在有力地说明日本侵略中国的危险。1936年他参加发起成立民族解放社，担任该社天津支部执行委员，但他与其他主张接受共产党建立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的领导人意见分歧。

他在《益世报》、《晨报》上呼吁在华北反对蒋介石，在华南抵抗日本侵略。以后，（1957年在北京）他的在华北反蒋的主张受到批判，理由是当时宋哲元正受到日本人的压力要他把华北变成日本的特管区，因而这个主张只有利于日本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爆发，促使国民政府邀请各党派、团体的领导人协助政府抵战。1937—38年，罗隆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顾问，1938—41年，任国民参政员，1939—41年任中国政治学会委员。1939年，罗隆基在西南联合大学教书，后因批评国民政府，主张限制其行政权力，因此被解聘。

随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破裂，1941年，一些小政党的领导人联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10月，它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任主席，罗隆基任昆明分会主席，中央常务委员。民盟成员，都以个人身份而非党派代表身份参加，所以罗隆基可以在民主同盟内自成派系。他和张嘉森在关于与那一个大政党合作的问题上意见分歧，罗隆基主张与共产党合作，而张嘉森认为与国民党合作为害较少。1945年，罗隆基负责民盟宣传部，出版《民主周刊》。

1946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罗隆基代表民盟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并在政协宪法起草委员会任职。当政治协商会议在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上未能取得协议时，罗隆基去上海，创办《民主日报》，并作为民盟在上海的发言人。1947年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不少民盟负责人去香港，1948年5月，召开常委会，宣布反美反蒋支持中国共产党，罗隆基因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未能前去参加，但他当即反对民盟的反美立场。罗隆基于1946年与马歇尔认识，企图通过当时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会谈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由于司徒雷登及国民党官员杨虎城等人的保护，1947年后罗隆基保持住了自己在上海的安全。罗隆基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成立一个由各小党派组成的政府，他也支持李宗仁替代蒋介石。在国民党控制上海的最后一段时期中，罗隆基实际上被软禁在疗养院里。1949年春，罗隆基和张澜由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协助躲藏起来。

1949年年中，罗隆基到北平，参加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是参加政协民盟十六名代表和民盟全国委员之一。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罗在政务院任职，同时成为中苏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协会会员。朝鲜战争发生后，任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主任，1952年作为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和在维也纳召开的和平大会。1954年他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江西代表，并成为全国人大常委委员，1955年出席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并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1956年4月出席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委会特别会议。1956年5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长。罗隆基由于擅长外交，还担任了政协国际事务委员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副主席。他期望使这两个机构成为协助外交部的研究和咨询机构。

同时，罗隆基在民盟也很活跃，1952年任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常务编辑，并以此影响该报的编辑方针。1953年他当选为民盟副主席，1955年张澜去世，1957年3月起沈钧儒实际上已告退休，于是罗和章伯钧成为民盟的最高领导人。

1957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罗隆基、章伯钧公开批评中央人民政府，罗认为当时国内知识界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在立场方面的矛盾，他叫喊说对知识分子的才能使用不当，他说“从英国留学回国的人在吃苦力，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在摆烟摊”。他几次表示既支持共产党也支持民主党派，既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主义。罗自视为一名忠于政府的反对派的发言人，但是他的论敌把他的言论解释为：在罗隆基看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同样的进步性，而且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的社会主义看成是不民主的。

当1957年6月“百花”开始雕谢发展成为反右派运动开始时，罗隆基正在锡兰哥伦布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他和章伯钧一起受到谴责，被指控为组成“章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联盟”，这一抨击是由民盟的妇女领袖史良所发起，民盟成员力图使罗的妻子浦熙修揭发他的问题。

情况似乎是，罗隆基力图建立一个忠于政府的反对派，劝说了一些知识分子加入民盟并利用民盟及其出版物来宣传这种观点。北京当局则认为罗的目的

在于组织一个反对共产党并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罗隆基要求提出证据，证明他和章伯钧有阴谋企图，他否认自己有过任何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或中央人民政府的想法，但他承认犯了“罪行”，“企图否认党的领导”。1958年底，他被解除了所有重要职务，1965年12月7日死在北京，当时《光明日报》说明了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民盟的中央委员。

罗文干

字：钧任

罗文干（1888—1941.10.16），牛津大学出身的律师，曾任北京政府的司法总长，大理院长、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长，外交部长。1935年退出政界。

罗文干出生于广东番禺，他受了中小学教育后，于1906年去英国进牛津大学，1910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又经伦敦法官法学会考试获准执行律师业务。1911年回国，在清朝的最后时日里，任广东都督府司法监察长到1913年，以后去北京任首都总警察厅警察长，1916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辞职，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又复职。

1916年修订法律馆成立，罗文干在该馆就职，1918年7月在王宠惠手下任副总裁，在修订刑法典过程中，他们两人成为至友，在此期间，罗文干在北京大学任法学教授，法官训练所讲师。

1920年8月，王宠惠任大理院院长，罗文干为副院长。1921年12月，梁士诒组阁，任命罗为司法部次长，1922年4月罗任司法总长，6月15日，黎元洪复任总统，罗任大理院院长。

1922年9月20日王宠惠负责组阁，使罗文干的前程发生突然的变化，王任命罗在有顾维钧，徐谦等人参加的“好人内阁”中担任财政总长，同时又任盐务督办，币制局长。当然，一个大理院院长辞去原任职务去担任内阁职位是迥非寻常的一件事，但王宠惠说服罗使他知道财政总长需要一位品行端正的有才能的人物充任。

当时北京政府由于无力偿还债务，而陷于窘迫之中，因而罗文干所担任的

职位非常重要，他当即对1922年国内的财政情况准备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说明了他承担的任务之艰巨。当时政府的国内外债务达1,726,400,000，到期借款为480,000,000，军费及各城市所需款项为180,000,000，每月平均开支经费为9,200,000，但是，当时的每月平均收入略多于200,000元而已。

当时北京政府的后台直系势力又因吴佩孚、曹锟争夺内阁总理职位而陷于分裂，奉系张作霖反对“好人内阁”，认为王宠惠是直系人物，乃指使众议院院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起而倒阁，由于王宠惠支持吴佩孚，因此随王宠惠入阁的阁员成了奉系和曹锟双方的攻击目标。1922年11月中旬，吴景濂指责罗文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因处理向奥地利借款合同事宜受贿，11月18日，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及其财政要员，整个内阁遂于11月21日辞职以示抗议。翌日，黎元洪释出罗文干，并派孙宝琦前去迎接他入总统府，罗拒绝这个邀请。三天后他又回到监狱，要求查清自己有无罪行。他在监狱内住了八个月，1923年7月29日无罪释放。众议院内他的政敌为此上诉，上诉后，法院停止执行原来的裁决，他又再度入狱，直至1924年春上诉撤回后才获释。罗文干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被无辜监禁达一年多。

1924年春到1926年春，罗文干在北京开业当律师。段祺瑞为东山再起的吴佩孚推翻后，海军总长杜锡珪于1926年6月组成“摄政内阁”，以罗文干为司法总长，内阁成员多次变化，罗任职一年多，又兼任关税督办。他以这个身份出席了1926年7月24日特别关税会议中外代表会。1927年6月，潘复组阁，支持张作霖作为全中国的“大元帅”，罗任外交部条约修订委员会副主席。

1928年国民党计划以北伐统一全国，而日本则企图向东亚扩展其势力，张作霖的政府由于受到破坏。6月3日，张作霖离北京回东北，他命令罗文干及内务总长沈瑞麟负责处理政务。张作霖死在日本人手中，北京又为国民党所佔，罗、沈遂去沈阳，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手下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署参议。

1931年12月，日军把张学良逐出东北，罗文干在此以前一直充任张学良派往广州与国民党领袖会谈的代表，此时遂和张在北京会合，并出任华北政务委员。蒋介石辞职，南方的几个领导人控制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后，罗于1932年1月1日出任司法部长。1月底，孙科，陈友仁分别辞去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长之职。

由汪精卫、罗文干继任。2月1日，罗文干为保卫中国免受日本侵略，进行活动，通知国联秘书长德雷蒙关于中国计划对日宣战之说纯属捏造。此后，罗文干致力于取得国联及与会各国对中国的支持，虽未成功，但已尽力所为。

1933年新疆省事态的发展，罗文干在处理国内问题的领域中有机会施展才能。4月间，盛世才在乌鲁木齐夺得权力和回族马仲英的势力发生冲突，6月，特别宣抚使慕松去新疆，盛世才藉口黄慕松意在推翻新疆政府而加以逮捕，盛世才提出积放黄的条件是由他担任新疆边防督办，刘文龙任新疆代主席，南京方面对此勉强表示同意，黄慕松遂于1933年7月21日回到南京。8月中旬，汪精卫派罗文干去乌鲁木齐，执行三项任务：处理盛世才和马仲英之间的冲突；取得盛世才及其他方面势力之间的力量平衡；使盛服从南京政府。如有可能，取消盛世才的前任金树仁于1931年签订的新疆和苏联之间的经济协定。

1933年9月2日，罗文干到达乌鲁木齐，五天后主持盛世才、刘文龙的就职典礼，然后去吐鲁番会见马仲英，马仲英同意就任东疆警备司令，但要求盛世才向其部队提供给养，以表明盛信守诺言。罗文干回乌鲁木齐报告马仲英的立场后，盛世才决定重新向马仲英开战。罗文干离乌鲁木齐去伊犁会见盛的另一政敌张培元。罗后又去苏联与颜惠卿一起讨论1931年的条约问题后回国，他认为南京的权威并未达到新疆，而莫斯科却处于有利地位并扩展在新疆的势力。

1933年11月11日罗文干回到南京，几天后，他在去南昌向蒋介石作汇报的前夕，声称他将辞去他在政府中的两项职务。1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务会议准他辞去外交部长之职，但仍任司法部长。1934年10月3日中央政务会议决定将司法部从原隶行政院改属司法院。罗文干遂即辞职。一个月后，他就任外交部顾问的闲差，1935年退休去广东经办矿业，1938年加入张嘉森的国家社会党，此后在重庆任国民参议员。1941年10月16日因疟疾死在广东罗定，年五十三岁。

陆 征 祥

字：子欣

陆征祥（1871—1949.1.15）外交家、天主教神父。1892年他在俄国圣彼得堡驻俄国使馆任译员时开始了外交生涯。1908年任驻荷兰公使，1911年任驻俄公使。中华民国成立后，历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国务总理、驻瑞士公使。1926年他的夫人去世，由瑞士移居比利时，出家为本笃教士。

陆征祥生于上海，父亲陆诚安系伦敦外方传教会助理，因而将陆征祥培养成为一名基督教徒；生母吴金灵生下陆征祥后得水肿病，于1878年去世。陆征祥幼年体弱多病，十一岁才上学，十三岁进江南兵工厂所属广方言馆，从教席阿玻社学法语及法国文学。1888年，他十七岁时因病休学一年，复学毕业后转入北京总理衙门办的语言学校同文馆，从教席查理·华波鲁进修法语，学习外交及国际关系科目。

1892年，陆征祥在同文馆毕业。当时任驻俄、德、奥、各国的公使许景澄需要翻译，总理衙门派陆征祥去俄国，1893年七月，任命陆征祥为四等译员。陆征祥得到许景澄的培植，成为一名职业外交人员。陆征祥在公余之暇，自习英语、俄语及十九世纪欧洲外交史。据陆征祥自述，许景澄“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希望陆征祥能成为一名“欧化”的职业外交家。许景澄说：“不愿过度欧化，而患欧洲精华之未能掌握”。自此以后，陆征祥成为许景澄的得意门徒，同人之间称他为“小许景澄”。

1895年3月，陆征祥递升为三等译员，同年又担任使馆秘书的职务。在许景澄离开俄国时，陆征祥任代办。1896年春，李鸿章去俄国庆贺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陆征祥担任翻译，参与了是年6月签署的中俄密约的谈判。以后，又作许景澄的翻译，参与达成建设中东铁路协议的谈判。

1896年末杨儒继任驻俄公使，陆征祥仍任译员，参与了1898年关于旅大租地条约的谈判，1899年伴同杨儒参加了第一次海牙会议。同年2月12日，陆征祥和一名比利时将军的女儿，又是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亲戚培德·博斐结婚。陆征

祥的上司对他的婚事颇有异议，因为博斐既是外国人，又是一名天主教徒。但是，此事对陆征祥的前程似乎并无显著影响，1900年他继续担任驻俄临时代办，参与义和团事件时进入中国的俄军撤出东北的谈判。

1901年1月26日，陆征祥的父亲去世，他要求准假回国奔丧，但却得到一次小小的提升。1902年胡维德继杨儒为驻俄公使，任命陆征祥为公使馆三等参赞。此时，陆征祥剪去作为效忠朝廷的象征的长辫。1903年末他获准休假回国，但于1904年因为日俄战争爆发，又被召回到圣彼得堡。1905年第三次任代办后，次年被任命为驻荷兰公使。去任之前，俄皇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并授予勋章，表彰他十四年内在俄国任职的功绩。

陆征祥在海牙公使任内最先进行的工作是谈判在荷属各殖民地设立领事馆，但未获成功。1907年6月至10月，他代表中国出席第二次海牙会议，会后去埃及度假数日，回海牙后继续进行有关设立领事馆问题的谈判，但无任何进展。1908年根据他的建议，清廷将他召回以示抗议。

陆征祥在北京时结识了袁世凯，当时袁世凯是北京外务部首席大臣。袁世凯因为陆征祥在海牙第二次会议上能言善辩，要求继续任命他为驻荷兰公使。1908年陆继任驻荷公使后，再次致力于领事条约的谈判，这次谈判的对手是荷兰驻华公使勃罗克兰德。1911年7月28日，中荷领事条约终于在北京签订。接着陆征祥去海牙，与荷兰政府交换条约议定书。之后，陆征祥奉命去俄国，谈判修订1881年的中俄伊犁条约。不久，他被任命为驻俄公使。1911年10月23日，他皈依罗马天主教。

当辛亥革命的胜利已经很明显的时候，陆征祥和其他中国公使从国外联合通电，吁清宣统退位，该电于1912年1月3日到达北京。2月13日宣统退位后的第二天，陆征祥电贺袁世凯，并表示愿受民国政府调遣，3月，他被任命为外交总长。

1912年5月陆征祥回北京任外交总长，他立即着手改组无能的外事机构，排除亲贵冗员，其中有一人是袁世凯的侄子。他修订了一项外交部组织法的总统训令，从而使外事机构成为一个以才取士的全国性机构。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后，六月二十九日陆征祥继任，他力图组织一个超党派内阁，但是遭到同盟会

员占多数的国会的反对。7月29日，国会通过新的内阁成员名单。三天后，同盟会提出一个提案指控陆征祥迟误时机，屈从袁世凯，提案未获通过。陆征祥8月19日称病辞职，9月18日，由梁如浩继任，9月21日，又辞去国务总理职。

梁如浩遇到了因外蒙交涉而引起的中俄关系的危机，于1912年11月13日辞去外交总长职，由陆征祥再次继任。俄蒙签订条约，俄国承认外蒙古享有自立权，陆征祥开始同俄国谈判，1913年5月20日，签订了中俄协议，其中规定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1913年7月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后，陆留任外交总长，但是7月24日，参议院拒不批准中俄协议时，陆深感失望。9月，陆征祥辞去外交总长职，仅接受总统府外交顾问这样一个闲职。1913年十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成为正式大总统，陆征祥亲自主持总统就职典礼。不久，新任外交总长孙宝琦与俄国谈判签订新的中俄协议，此协议于1913年11月5日签署，在这个协议中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

1914年5月，陆征祥成为北京政府国务会议成员，不久去瑞士。1915年1月回国时，正值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二十一条要求。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陆征祥继任。当时国务总理是徐世昌。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虽然由袁世凯和外交次长曹汝霖主持进行，却指派陆征祥于1915年5月25日在最后协议上签字。他向袁世凯提出抗议，表示考虑到自己在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他的签字就“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1915年6月，中俄蒙三方签订恰克图条约。这时，袁世凯图谋称帝，徐世昌隐退去湖南后，陆征祥继任，称为国务卿，相当于原先的国务总理。陆征祥以后对此曾作自我辩解，说他并未赞助帝制，并在1915年袁世凯发布授予贵族称号的文书上拒未签字。1916年3月袁世凯撤消称帝计划，徐世昌又担任国务卿之职。5月，袁世凯死前一个月，陆征祥辞去外交总长职。

1917年初，陆征祥在段祺瑞国务总理任内充任特别外事委员，专为处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问题。2月，他代表段祺瑞与协约国各国代表在北京讨论中国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的问题。8月，中国对德宣战。冯国璋任总统后，王士珍为国务总理，陆征祥又担任外交总长。此后北京政府几次发生动乱，但陆征祥担任外交总长一直到1920年12月。1919年1月，陆征祥任首席代表，率领联

合代表团（包括南方代表王正廷）出席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因山东问题未得解决，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此举大大提高了陆征祥在国内的声誉，在此以前他曾因签订了二十一条而在国内不得人心。1919年5月4日陆就和会对于山东问题的处理办法正式向巴黎和会的三强会议提出抗议，就在这一天，在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9月10日，陆和王正廷签署了圣谟门对奥和约，和约批准后，中国遂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陆征祥回国，重新掌管外交部，在他出国期间，外交总长一职是由陈箴代署。

1920年8月，段祺瑞及其追随者倒台，靳云鹏组阁，颜惠庆任代理外交总长。10月，任命陆征祥为全国服务委员会两主席之一，11月，他声称因家务离职，将其父母及祖母的灵柩移葬北京郊外。12月，他正式辞去官职。

1921年5月，任命陆征祥为全国服务委员会主席。其间，其妻病重，1922年，按照医生的意见，他携妻寓居瑞士洛加诺他所置的别墅。北京政府任命他为驻法公使，后接受他的要求，改任驻瑞士公使，1922年10月，又任命他为驻国联代表。1922—1924年间，他多次出席国际劳工会议。

陆征祥因为妻子病情日重，遂潜心于宗教，企图从中得到慰藉。1925年教皇庇护十一世接见了。1926年四月，他的妻子去世，1927年7月5日陆征祥在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出家为本笃教牧师，取教名比也尔·赛雷斯丁。1935年六月他六十四岁时被授予神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和于斌主教致力于争取国外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为比利时伤员讲道一直到他去世之前。陆征祥始终与国民党的重要官员保持联系，因此正如他出家的那寺院的院长所说，他“象过去一样是中国的一名使者”。1943年，他促成中国和梵蒂冈建立了外交关系。1946年5月他七十五岁时，陆神父被授予比利时圣彼得修道院名誉院长的职称。陆征祥在晚年出版了一些回忆录和论文，其中《孔子和耶稣的道路》一文，反映了他晚年主张信仰调和论的思想。他于1948年底病重，1949年一月十五日在比利时布鲁日修女医院去世，他的最后遗言是：“一切为中华！”

陆 荣 廷

字：干卿

陆荣廷（1856—1927），广西军阀，土匪出身，后成为桂军司令，广西副都督，曾一度支持袁世凯，后又反袁。还担任过两广巡抚使，广州民国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二十年代中，其部队为陈炯明粤军消灭，他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

陆荣廷生于在广西武鸣县，幼年即成孤儿，自谋营生，他在广西东京边界的战略城市龙州时为一名私盐贩谭某收养，他为谭某积极经营家业并娶了他的女儿为妻。有一次，陆荣廷与一名法国人争吵时怒而将其投入河中淹死，乃不得不与谭某一家人避入山林以砍柴为生。1884年中法战争后，边界双方都布置了哨兵警戒。有一天，陆荣廷和几个伙伴袭击了三名法国哨兵，夺取了他们的步枪，于是他们就持枪到中法边境的法方地段内进行抢劫。

陆荣廷逐渐纠集了几百名匪徒出没于法属印度支那的农村地区，法军进剿时，他们就越境到广西，他们在广西境内从未作过案，因此广西当局对他们并不加以过问。1904年间，这一股土匪骚扰得很厉害，以至法方当局竟向北京清政府提出申诉。不久，广西当局奉命收容陆荣廷。陆荣廷的朋友，广西边防督办苏元春的部下陈炳焜建议授陆荣廷军职，将他收容。苏接受了这个建议，将陆所拥有的匪帮编为一个营。此时，陆荣廷还认识了两广总督岑春煊。

1907年，陆荣廷任千总，统率边防军十二个营。1907年秋，本地革命党人黄明堂在镇南关起事，黄兴，胡汉民，孙逸仙来到广西加以支援。边防军统率龙济光、陆荣廷迅速扑灭了这次起义，龙济光升任为广西提督，陆荣廷升为总兵。1911年龙洞往广东任提督，陆成为广西署提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陆荣廷和广西巡抚沈秉堃、督司王芝祥宣布广西独立，沈任广西都督，陆为副都督。1913年革命党人进行二次革命反袁时，陆荣廷助袁平定在柳州的一次大规模起义，并给龙济光以军事援助。陆荣廷曾是袁世凯的忠实支持者，但在1916年却与袁破裂，其原因是北洋军人的傲慢和

提升龙济光等其他军事长官使陆荣廷深为不满。袁世凯把陆的儿子吸收到由袁自己指挥、由袁的亲信组成的模范团中去，此举使陆稍感慰藉。但几个月后，陆的儿子在从北京回广西途中突然死在武汉，陆荣廷身边的人说他是被袁世凯指使毒死的，陆对这种广为流传的说法颇为相信。1915年12月，蔡锷、唐继尧的云南起义已开始，革命党人呼吁全国反袁，指斥他背叛民国。陆荣廷的朋友和副手陈炳焜劝他像梁启超、岑春煊那样支持云南的领导人。1916年初，他在南宁开会，告诉他的亲近助手，他已决定参加西南反袁联盟，但要求他们保守秘密。他致书袁世凯请求以陈炳焜代替他为都督，他本人则率军进贵州，讨伐民军，袁任陆为贵州绥抚使并付以大笔出征军费，袁同时命龙济光率军经广西进入云南。龙陆系儿女亲家，袁世凯希望他们合作，但龙军抵百色时，陆所部将他们解除武装，1916年3月15日陆宣布广西独立。4月，陆率其亲信到广东，革命党人和龙济光在广东建立了不稳定的联盟，因为他们二者谁也不能在该省单独维持秩序。

1916年5月1日，陆荣廷在广州梧州间的肇庆成立护国军司令部，请岑春煊任总司令。不久，在云南起义中起重要作用的梁启超到广西和陆荣廷讨论成立军政府的问题。1916年5月7日在肇庆成立军务院，以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军务院因袁世凯背叛民国，否认其权力，并宣称依据1912年宪法，黎元洪应是国家合法元首。军务院接着声明由于黎元洪尚未使合法权力，先由军务院代行使内阁权力并负责指挥反袁活动。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内阁总理。岑春煊、陆荣廷于是宣布解散南方军政府。当时广东省内人士要求撤换龙济光，黎元洪乃调龙济光去琼岛督办矿务，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

1917年3月，陆荣廷到北京，黎元洪、段祺瑞及其他官员设宴招待。他离广州时，由妻兄谭浩明代行广东督军，陆与段商定，谭浩明任广西督军，陈炳焜任广东督军。陆任两广巡阅使，由于他拥有这两个重要省份的权力，因此他成为南方最有实力的军阀。他的地位如此重要，因此1917年7月张勋复辟时，曾提名陆荣廷任两广总督，以争取他的支持。

1917年夏，孙逸仙发起护法运动，得到陆荣廷、唐继尧的合作。8月31日，非常国会广州成立军政府，孙逸仙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陆荣

虽容许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并参加了它，但他并未断绝与北京政府的一切关系。当时广州的情况很奇特，孙逸仙有非常国会的支持但无军力，陆荣廷有军力而又无人望。陆荣廷一旦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又在1917年10至11月间在湖南取得某些地盘后，他对护法运动就不感兴趣，而与桂系军阀一起阻止孙逸仙建立军事力量。

1918年春，陆荣廷与军政府的关系不睦，乃与南方军人改组广州政府，采取总裁制由岑春煊（主席），陆荣廷，孙逸仙，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懌七人掌权，5月，孙逸仙退出政府去上海，（但到八月才正式辞职），唐绍仪，伍廷芳也离开广州，唐继尧仍在云南并未到广州参加改组活动，只有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懌在广州，因未达到法定人数，总裁制不能行使职权，非常国会乃以熊克武，刘显世、温宗尧为总裁，弥补缺额。

1920年8月，在福建漳州的粤军陈炯明支持孙逸仙在广州另组新政府，他受孙逸仙之命开进广东，由地方民军协助击败桂军，十月二十四日，陆荣廷、岑春煊宣布军政府解散，陆率该部去广西，岑去上海，10月26日，粤军占领广州。

1920年12月，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广东边防督办，一个月后又调任广西边防督办。1921年5月，孙逸仙就任广州新政府非常大总统，宣布北伐计划，命令陈炯明进击桂军，陆的部队未能抵制陈炯明军、粤军于6月26日，7月间先后攻克梧州、南宁，陆军被击溃，九月底，广西归入广州政府的控制之中。

陆荣廷的地位是以他的武力为后盾的，他的军队一旦被击溃；他虽几经挣扎，但他的政治生命终于就此结束了。1923年他曾呼吁唐继尧给予支援，唐派了一支小部队到广西，1924年曹錕曾任他为广西督军，但因无军力支持所以未能就任。陆荣廷在天津和上海安然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几年，1927年死在上海。

鹿 钟 麟

字：瑞伯

鹿钟麟（1884—）军官，冯玉祥的老部下，1929年在南京任军政部长，

1930年北方联盟瓦解，国民军统帅部分解鹿与冯的关系破裂，后在国民政府任兵役部长，以后又在中央人民政府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鹿钟麟出生在河北定州，他的家庭和青年时期的情况不祥，只知道他曾在天津军官学校上学，1915年毕业后，任冯玉祥的第十六混合旅参谋，不久，成了一名营长。鹿钟麟于1921年在陕西的战役和1922年在河南的战役中表现很出色，冯玉祥对他很赞赏，1922年5月10日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时，任鹿为省警察厅长。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在冯玉祥反对吴佩孚及由此而举行的北京兵变中，鹿钟麟起了重要作用，10月23日，他参与占领北京，从总统府拘留曹錕，11月5日，把溥仪逐出紫禁宫，因此，鹿钟麟得到很快的提升，任第二十二旅旅长，北京警察厅长，国民军暂编第一师师长，1925年初，任京师警备司令，警察总监。

1925年底，冯玉祥与张作霖，吴佩孚开战，鹿钟麟率部在天津地区作战，国民军虽攻克了天津，但遭受重大损伤，冯玉祥因此辞职出国，以便与张、吴议和。但战斗继续进行，国民军于1926年3月8日封锁了塘沽，因此造成了三三一八事件，鹿钟麟回北京重任北京警察厅长之职，保护段祺瑞下令逮捕的徐谦、李石曾、顾孟馥、易培基、李大钊，段宣称他们是三三一八事件的肇事人，又称他们宣传共产主义。张作霖、吴佩孚继续进攻，4月15日，鹿钟麟被迫撤出北京。

1926年9月，冯玉祥在绥远五原重新统率国民军，宣布服从国民党，1927年6月又控制了河南，鹿钟麟任河南省政府委员，郑州市政府主任委员，8月，南京成立军事委员会，鹿任委员，又任国民军第一军军长，与何应钦合作在12月攻克徐州。

在北伐最后阶段，冯玉祥的部队改编为第二集团军。1928年4月，鹿在河南前线任第二集团军北路军总司令，在豫北同奉系作战，他的部队在最后的北进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攻克漳河进入北京郊区，而北京则于1928年6月8日为阎锡山的部队攻占。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鹿在冯玉祥手下任军政部次长，1929年1月在编遣会议中，冯玉祥和蒋介石发生破裂，冯离南京，于1929年5月20日

宣布独立，于是被撤去一切党政职务，由鹿钟麟任军政部长之职。1929年秋，国民军与国民政府部队在河南开战，1930年又成立阎冯联盟，这对蒋介石的统治威胁极大，国民政府下令逮捕鹿及其他国民军首领，鹿设法脱逃并投奔冯玉祥。1930年夏，鹿指挥冯玉祥左翼军在陇海路作战，秋天，国民军将领因对战略问题意见分歧，阎冯北方联盟破裂，国民军的指挥机构瓦解，鹿与他的老上司冯玉祥分裂后避居在天津。

1931年12月，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改组，鹿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35年被选为正式委员。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决定起用鹿钟麟，1938年让他担任了当时已被日军占领的河北省主席，冀察战区游击总司令，1944年11月国民政府在重庆设立兵役部，鹿为部长，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1947年任战略顾问委员，1948年受任指挥国民党的一个团。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控制大陆后，鹿决定留在大陆，1954年9月，在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1959年4月继任此职。

卢 汉

字：永衡

卢汉（1891—），龙云的心腹、部下、至亲，1945年龙云去职后，继任云南省主席，1949年12月起义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他一些高级官职。

卢汉，龙云的至亲，罗罗族人，生在昭通，其家庭背景和幼年情况不详，毕业于云南军校，1924年任滇军少校，1926年任上校，1927年龙云投向国民党后，卢汉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九十八师师长。

1929年北伐结束后，卢汉任云南省政府财政厅，后任建设厅长。1930年重回军界，任讨逆第十路军司令，抗击阎冯及李白黄联盟对国民政府构成的威胁。卢汉任此职至1937年。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卢汉任第六十军军长，率部参加台儿庄之役。不久，先后任第三十军团长，第一团军总司令。1940年在薛岳手下任第九

战区第一兵团司令。第九战区设在长沙的司令部以善于制订战略计划和指挥战斗行动而著名，但未能阻止1944年日军的进攻，1944年6月18日长沙失守，8月8日衡阳失守。然后，卢汉任云南绥靖主任。1945年任驻昆明部队第一方面军司令官。

在此时期内，卢汉是龙云的重要亲信和部下。战争结束后，卢汉所部奉命开进印度支那接受该区日军投降。8月底，他调动十六万军队到东北地区，因此龙云手下只剩了九千警卫部队。国民党趁此机会，控制了云南，把龙云逐走。10月，杜聿明指挥军队推翻了龙云，任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为了防止他保持自唐继尧以来云南一直享有的自治地位，云南的部队被调到东北。1946年卢汉任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任云南实业公司经理。1949年1月蒋介石辞职，李宗仁任代总统，卢汉成为国民党在云南总部的负责人，更重要的是，成了云贵绥靖司令部的主任。

在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节节胜利，国民政府日益崩溃，卢汉逐步断绝了他与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关系。不少人认为他在力求使云南成为独立地区。当时，李宗仁想采取某些措施保持国民党对中国南部的控制，但又为蒋介石所阻。由于对卢汉的忠诚感到怀疑，1949年9月，蒋经国和蒋介石到昆明与卢汉会见，但未能得到卢汉的保证，国民党希望组成西南地区联合防线的计划被迫放弃。中国共产党继续获得胜利，11月3日，李宗仁飞往昆明，与卢汉计划成立川黔滇联防，11月11日又飞往桂林与其他军界领袖会商。中国共产党继续前进，11月底，国民党在川黔的失败已成定局，云南陷于孤立。

1949年12月初，蒋介石为防止卢汉脱离国民党作了最后努力，派张群去云南和卢汉会商，12月11日，卢汉宣布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拘留了张群等人一直到12月23日，国民党在西南的抵抗即告结束。

卢汉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1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1952—1953年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政府改组时，卢汉被免去在云南的政务而担任了一些清闲的职务，10月，任国防委员，11月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2月任全国政协常委，他在1949年的贡献使他于1955年9月获得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2月

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全国政协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云南代表，1959年4月，继续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国防委员会委员。

陆 伯 鸿

陆伯鸿（1875.3.27—1937.12.30），上海实业家，著名的天主教徒。

陆伯鸿生在上海，他的先祖在十七世纪初从四川迁来，经营造船业和棉丝贸易，后加入了天主教。十九世纪初，天主教传教士是他家的常客，他们从陆家学习中文并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陆伯鸿除接受旧式教育外，又在由他祖父修建的董家渡天主教学校中接受宗教教育，1893年成秀才，此后考举人两次落第，乃由一名中国天主教士教以法语，1894年在上海充任一名法籍律师的秘书。

陆伯鸿于1896年和一个闻名而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的曾玛丽结婚，生育了五个儿子。1905年，陆伯鸿的妻子和一个儿子死去，他深受刺激从此从事于慈善事业，常去医院、监狱中探望，给身患不治之症和传染病的病人捐款。

陆伯鸿早期的实业活动不详。1911年他任当时经费支绌的南通发电厂的经理，他获得英日借款改进公司设备，并由公理会资助，归还了这些借款。此后他在经济上常与天主教团体有来往。1914年，他又得到西门子的支持，办了由上海到南通的电车事业，以后该项业务与电厂合并，业务兴隆。同时，他又创办了大通申记航运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缺乏钢铁，陆伯鸿和一些财政家一起办了一所铸铁厂，战争结束后，国外的竞争迫使该厂倒闭，后经西门子的支持得以于1925年复业，陆伯鸿继续在上海经营航运及公共事业，他购进了一部份黄浦码头，办了黄浦码头仓库公司。翌年，又购进了闸北水电公司，1928年任上海内陆水运公司经理，1929年又创办大成公司，经营内河航运。

在此期间，陆伯鸿还从事慈善事业，其中大部分是用来发展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1911年他主持上海市当局经办的普育堂慈善医院，不久他认为需要筹

款买地新建一所医院以代替该院，并获准从上海旧城墙取砖用于新建工程，1913年新普育堂开张，同年，陆被选入上海市工部局。他在新建的医院里造了一所教堂，经常在那里给病人讲道。新普育堂成了天主教在华行动会训练教徒的中心，此会由陆在1913年建立用以补充天主教会。这个组织以后在上海郊区进行传教活动。陆伯鸿又以公开辩论的方式吸引知识界对天主教发生兴趣，1915年他在上海郊区办了一个诊疗所，1917年又在松江办诊疗所。1917年他与另一些人办了一所北京中心医院，1923年在上海办了圣心医院，并扩建普育堂，1934年为精神病人办了一所上海慈爱医院，在南通办了一所传染病隔离医院，他在创办了这些医院以后，还经常捐款。

上海的教育事业亦受益于陆伯鸿，1914年和1916年他在董家渡教堂附近和杨树浦诊疗所附近先后各办了一所小学，他又打算在上海办一所由美国天主教徒主持的英语学校。他的这个计划，是他于1925年作为上海总商会代表去美国参加在西雅图召开的国际贸易会议提出来的，1926年他去芝加哥参加圣餐会议时与各方讨论，得到他们的支持。1926年他去罗马，又得到教皇庇护十一世的支持。于是在1928年在上海开办了圣路及学院。同年，他还建议办一所圣格利哥里中小学校，1937年他又办一所天主教女子学校。

1937年中日战争发生后，他创办的医院收容了数以千计的伤兵和难民。同年，他成了由梵蒂冈任命的第一名中国籍教廷大臣。日本占领期间，他把宗教慈善事业置于爱国主义之上。他不满国民政府把他主持的医院认为系日设产业。国民党增加对他的压力，他虽不能公开活动，但拒绝离开上海。1937年12月30日他被两个不知名姓的恐怖分子暗杀。

陆伯鸿和他的先辈一样，既具有经营实业的才能又有宗教的热忱。他经办八家大企业、七所医院、五所学校所取得的成功，说明他是有才能的银行家和乐善好施的人。一个耶稣会教士马森写了一本他的传记《一个为人类服务的百万富翁：陆伯鸿》于1950年在巴黎出版。

鲁 涤 平

字：泳安

鲁涤平（1887—1935.1.31），湖南军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28年任湖南省主席，1929—31年任江苏省主席，1931—34年任浙江省主席。

鲁涤平出生在湖南宁乡的一个小康之家，在兄弟两人中居幼，他在清末那几年中，不愿接受旧式教育而离家进了长沙一所号称教授近代军事科学的初等军校。毕业后入清末新军。1911年革命时，任湖南新军管带，1912—16年期间情况不详，只知道他于革命发生后不久即离开了新军。

1916年夏，谭延闿重任湖南都督，任鲁涤平为湖军第六团团长，1917年8月谭去职后，鲁仍任原职，翌年升为第三旅旅长。1920年，他参与了驱逐北京政府任命的督军张敬尧，湘军改组后升任为第二师师长。新任湖南督军赵恒惕命鲁涤平率部驻于岳州。

1923年中期，驱除赵恒惕运动发生，南京广州政府企图利用这个局势，任命谭延闿为讨赵军司令，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直至9月1日鲁涤平部下的团长朱耀华在长沙发动兵变，迫使赵恒惕向北撤退。赵恒惕抵达可以取得吴佩孚的援助的地区，鲁涤平遂即倡议并安排赵恒惕和谭延闿在湘潭附近举行“和平谈判”，两周后谈判破裂，此时，赵已得到吴佩孚的援助。而鲁涤平与赵恒惕的关系由于团长朱的行动和谈判中采取暧昧态度而受到损害，因为鲁转向谭延闿，并被任命为讨逆军湘军第二军（实即鲁自己的第二师）军长。11月中，赵恒惕把谭延闿和鲁涤平逐出湖南，他们退到了广州附近一带，协助打退了陈炯明的进攻。

1924年秋，孙逸仙宣布北伐反对曹锟、吴佩孚，命令谭延闿统一指挥由湘军及其他部队组成的建国军。1925年3月，孙逸仙去世。后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建立时，湘军成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鲁涤平为副军长。北伐时，谭延闿因担任政府职务留在广州，遂由鲁涤平在前线指挥第二军。1926年9月，

第二军与孙传芳作战，鲁涤平的四个师中有三个师进入湖南萍乡，10月5日攻占樟树，10月23日攻占进贤，削弱了孙传芳在南昌的地位。最后，于11月8日攻占南昌。

1927年3月24日，鲁涤平的第二军与程潜的第六军攻占南京，他们进城以后，采取排外行动，致有一些外国人生命财产遭到损失。起先，把这一行动归罪于鲁涤平的第四师师长张辉瓒，并开始注视鲁涤平的党代表共产党人李富春，最后归罪于第六军，其党代表系共产党人林伯渠。

从1927年4月开始的宁汉分裂于8月结束，蒋介石为国民党的统一起见暂行辞职。鲁涤平在这个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十月，国民政府讨伐唐生智，驻守宜昌的第二军参加了这次战役，但鲁涤平本人却在上海，原因不详。但是当年他受命负有指挥二年的全权。1928年春，他出任湖南省主席，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他施行了经文官考试任命县长的制度，并改进了省的财政机构。不久，鲁涤平与武汉政治会议的首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发生冲突，1929年2月21日，政治会议撤消了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务。不久，鲁涤平任讨逆第五军军长，率领所部和其他由南京派来的军队一起在武汉地区攻打桂系。4月初，战争取得胜利，鲁涤平任武汉警备司令，同时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9年9月，鲁涤平出任江西省主席，该省是共产党人活动的中心。1930年中后期，国民政府陷于阎冯北方联盟混战所造成的困境，共产党人彭德怀率部袭击并攻占长沙，朱德和毛泽东所部进逼南昌。是年秋，鲁涤平出任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一次围剿的总司令，他的部队深入到江西山区，但当他的所属的第十八师张辉瓒遇到伏击被打垮后，他退出江西。他虽然丧师过半，但仍参加了1931年4、5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底，蒋介石暂行辞职，政府改组，鲁涤平任浙江省主席，他立即着手增强省防，修建公路和电讯设施，发展工商业，改革省政，他的长期军事和公务生活使他身心交瘁，于1933年中风。尽管他身体不好，继续患病，但一直到1934年12月前，国民政府没有批准他辞职。此后，他去南京，就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闲职，但1935年1月31日他再次中风死去。

鲁涤平遗有妻丁氏，儿子及侍妾沙氏所生的两个小儿子。他们都死了，有的病死，有的是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不久被处死的。

卢作孚

卢作孚（1894—1952.2.8），实业家，创办航运业民生实业公司，1938—1943年在张嘉璈手下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1949年逃到香港，后因中国共产党人应允给予民生实业公司以财政援助而返回重庆，这些许诺没有实现，卢于1952年自杀身死。

卢作孚是四川合江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他早时的生活不详，只知道他曾设法上学，希望成为一名数学教师。他在合江小学和江岸中学教书，1919年任当地报纸的记者。不久，在川南府署学使任录事，后升任学使，进行教育改革，聘请了如恽代英这样的教师入川任职。四川自本世纪以来经常遭受内战之苦，他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是很可观的了。

1925年四川督军刘湘任卢作孚为顾问，卢在刘的支持下，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与外资在四川的航运业竞争。1925年民生实业公司在合江初办时只有资金八千元，1926年中期筹到资金五万二千元，购进七十吨航船一艘，命名为民生轮，航行于合江重庆之间。为了改善公司的财政情况，卢作孚曾亲任售票员和总经理，他还经常搭乘英商怡和，太古轮船考察其经营管理和操作技术。他认为要收回中国内河航行权，必须在重庆宜昌之间这个困难而获利甚厚的航段上开航，1931年他把民生实业公司总部迁到重庆。1935年在四川境内长江上航行的船只，约有半数为民生公司所有，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民生公司拥有船只四十六艘，总吨位为二万二千六百吨。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民生公司已垄断了四川航运，控制了所有外资经营的轮船。

战争发生前，卢作孚建议在四川省当局与国民政府之间建立密切联系，1936年他说服当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去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为了实施会谈中商定的双方合作措施，卢作孚出任四川省政府建设厅长，他倡议修建成渝铁路。

民生公司在协助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中起了重要作用，沿海地区的兵工厂、

工厂，日用必需品，难民，都需要随政府撤退，先到武汉再到重庆。民生公司还从上海载运了二十万吨工厂设备到重庆及其他内地安全地区。战争期间，它拥有的船只运送军粮到几个战区。倘若没有卢作孚的精心筹划和民生公司提供的不可缺少的各种设施，战时的有效运输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1938—42年间，卢作孚在张嘉璈手下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1940—42年兼任粮食局长，负责采办民用军用粮食的繁杂艰难工作。他还继续管理民生实业公司，该公司在战时工业中的地位更为重要了，其附属单位和分支机构有大明纺织厂，民生机器厂、天府煤矿公司。其机器厂在战时建了二十四艘内河轮船，到1942年，民生实业公司拥有资金七百万元，船只一百艘，航行于四川境内的各航道。

卢作孚在成名之前很久，早就想把他的家乡建成为一个模范县。1926—31年，他任嘉陵江防卫局长时就着手建设合江附近的北碚，几年间，已可与张謇所建的南通媲美，这里风景优美，又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温泉，再加上新建的电厂、学校、博物馆、戏院、富有吸引力的住宅和办公建筑。这成了战时的一个名胜之区，国内各个观察家声称，在一个偶然到此的游客来说，这里简直是沙漠中的一个海市蜃楼。

战争结束后，卢作孚和国民政府的战后经济复兴计划密切配合，力图大规模扩充民生实业公司。他为了增加公司的船只吨位，从美国购进十六艘登陆艇（每艘为一千五百吨），又向加拿大政府借款建造九艘内河轮船，又与金城银行合资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进三艘远洋轮船。到1948年时，民生公司拥有船只一百一十一艘，总吨位为六万三千一百七十四吨。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控制大陆时，卢作孚飞往香港，想以香港行为基地继续经营民生公司，以便交付银行及加拿大贷款。卢作孚由于负有清偿的义务，他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给予财政援助的提议回到了重庆。他到重庆时得悉西南军政委员会已没收了民生公司中的“官僚资本”并已派出公方代表接管该公司。他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没有什么发言权，也无力清偿借自加拿大的款项。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被选入重庆一个人民法庭的主席团，公审时旁听席中他的一个多年的秘书指控卢犯有罪行，人民法庭决定于次日审理此事。2月8

日夜，卢作孚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死。

龙 济 光

字：子诚

龙济光（1860—1921），云南军人，1908年任广西提督，1911年任广东提督，他支持袁世凯，从1914年中期到1916年中期控制了广东，后来调任琼州矿务督办。1917年12月，他奉北京政府之命攻击孙逸仙所率部队，但于1918年初全军崩溃。

龙济光，云南蒙自人，是一个土司家中的第二个儿子，幼年时就决心从军，与兄龙觀光投身于云南岑毓英部。1905年兄弟两人投身岑毓英之子岑春煊部，不久龙济光任桂越边防司令，同事中有原系土匪出身的陆荣廷。1907年秋，龙陆两人，镇压镇南关革命党起义，此次起义虽有黄兴、胡汉民、孙逸仙进入广西予以支持，终归失败。龙因功升为署广西提督，陆为总兵，1908年两人又去河口扑灭了另一次起义后，龙成为提督。

1911年署广东总督张鸣岐命龙济光率部去广州，并任命他为广东提督。龙赴广州就任之前，民国革命已爆发，革命党人控制了广东，龙遂驻师惠州。

1912年冬，袁世凯任命陈炯明为广东护军使，龙为护军副使，不久，龙因所率部队的军需发生困难，取得广东都督胡汉民同意将部队开回广西。他到梧州时，收到袁世凯的信件并大批金钱贿赂，乃驻师梧州待命。1914年夏二次革命时，陈炯明于6月14日代胡汉民为都督，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袁世凯立即任命龙济光为护军使令他率部进军广州。龙轻而易举地逐走陈炯明，自为广东将军，并于8月13日攻占广州。此时岑春煊到广州，劝龙济光参加反袁，未获成功，岑仅以身免。广州地区的地下革命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并采取恐怖手段。在马超俊领导下的行邦成员起而组织暗杀队企图寻找时机暗杀龙济光。1914年6月，他们杀死了龙济光的副手马有发。龙的特工人员追踪此事，马超俊逃走。以后又发生几次爆炸事件，但均未危及龙济光。

1915年五月袁世凯接受21条并准备称帝，因此激怒了全国国民党人士再一次

起而反袁。龙济光此时已是袁世凯的亲信之一，又因在广州组织提灯举行庆祝外交“胜利”而进一步激怒了广州市民。7月17日，广州发生水灾，龙济光前去探望他的哥哥，工人暗杀队向他投掷炸弹，炸死龙济光的警卫人员十七人及刺客本人，龙本人仅伤一足。此后，龙济光戒备更严，加紧搜捕革命党人，但并未减弱他对袁世凯的支持。1915年12月21日，袁世凯为准备称帝而发布了一份册封名单，龙济光名列少数几个公爵之一，以后又被提升为郡王。

1915年12月，蔡锷、唐继尧在云南起义，宣布云南独立，这是全国革命党人士兴起护国运动的先声。陆荣廷投身革命党，1916年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反袁运动迅速开展。早在年初，袁世凯已下令龙济光率部经广西开入云南，他的部队由龙觐光率领，到百色时被陆荣廷的部队解除武装，袁世凯对此大为惊骇，他原以为龙、陆系儿女亲家当能合作。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但西南军人的反袁运动并未终止，由于广东所处的战略地位，他们对龙济光进行劝说，均为所拒。广东的革命党人控制了许多重要地区，广东水师起义，要求广东独立的呼声更高了。

1916年4月初，龙看到对革命党人再行抵制已属无望，他接到袁世凯命令后，宣布广东独立，并邀请革命党领袖于4月12日在广州附近开会，准备在会上将他们逮捕。少数几个人接受了邀请，参加会议的人被害。这一事件，引起广东市民的愤慨，激怒了陆荣廷、梁启超，因为他们的代表亦同遭杀害。陆荣廷决定进军广东。龙济光为了避免事态扩大，把袁世凯派来的蔡乃煌当作替罪羊处死，龙济光仍在广州保留他的位置，与革命党人成立了联盟，因为他们双方却无能力单独维持广东的局面。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就任总统，西南军人的联盟遂告瓦解，内阁总理段祺瑞为了防止革命党人势力，任命龙济光为广东省长兼督军，南方首领起而反对，黎元洪不得不将龙济光调任为琼岛矿务督办，陆荣廷为广东督军，龙济光率其部队去海南岛。

1917年12月，孙逸仙发动护法运动，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北京政府任命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他立即率师从雷州湾到大陆，但这支反孙的部队立即覆没，他退居在法属广州湾。后来他去北京，1918年7月，参加了各省督军和北

洋军人的会议。他既无军队，于是在政治和军事上也无所作为了，遂退出政界住在上海，1921年死前，北京政府赐以将军之衔。

龙 云

原名：龙登云

字：志舟

龙云（1888—1962.6.27），1928—1945年任云南省主席，1945年免职。1945—1948年先后在重庆、南京违反自己的心愿充当了国民政府的宾客，1949年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一些名义上的高级职位，1957年成为右派，1958年2月免去政府各职。

龙云是彝族中的贵族，生于云南昭通，早年情况不详，曾在川滇边境参加过秘密会社，最后得到唐继尧的赏识，将他安置在云南武备学堂。1912年毕业后，进了唐继尧的私人卫队，由此参与了1915年的云南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起义中唐继尧被举为宣布独立的云南的督军。龙云一直在唐继尧的私人部队中服务，1924年任滇军第五军军长，

1927年云南兴起反对唐继尧严酷统治的斗争，2月，龙云和胡芳愚以及另两名军界领导人实行兵变，要求唐继尧采取改革措施，云南省当局因而改组，龙云得以掌权，唐继尧成为省政府总裁。5月，唐继尧去世，龙云宣布支持国民政府，并决定派兵参加北伐，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1928年，国民政府又进一步承认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三路军总指挥，龙云趁此巩固了他在云南的统治，并得以避免了虽经国民党统一而在许多省份仍不断发生的内战的骚扰。龙云与国民政府保持泛泛的联系而在云南自行其事，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当选为正式中央监察委员。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云南省人民对国事不再置若罔闻，龙云应将介石之邀与其他军界领袖一起在南京开会。滇缅公路在一年内建成，在一定程度上系得力于龙云的努力。日本的进袭，使云南的地位更为重要，因为它地处边陲，是与外界联系的通路。大专院校的迁入，使云南的政治气氛颇为复杂，因

为那些学校的教职员包括了各种政治见解的知识分子。战时各派系都力求取得龙云的支持，而龙云仍与国民政府合作，以取得云南的稳定。龙云本人和国民政府都没有忽视在这个半独立的云南固守着省主席的微妙地位。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不少单位要利用滇缅路，龙云感到对外来部队已不能拒而不纳了。当时，蒋介石在昆明设立行营，龙云为主任，对外来军队享有指挥权。此举虽对龙云有某些安抚作用，但他却拒绝中国或外国的战斗部队进入昆明市区。

1944年，陈铭枢、谭平山等人组织了一个反对国民政府中领导集团的团体，1945年在重庆正式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会，主张恢复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逸仙提出的政纲，据说龙云是其中的一名成员。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当局迅速采取行动控制了云南，把滇军调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1945年底，杜聿明在昆明举行兵变，把龙云护送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军事参议院取消后，龙云当了一名战略咨询，云南省主席由他的至亲和副手卢汉继任，龙云则一直受到监视和软禁。1948年底，他化装趁飞机逃到香港，与其他的反对人士如李济深等来往，1949年他未随同他们前去共产党佔领的华北地区。他拒不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初，龙云离香港到北京就职，1954年任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云南省代表，他在会上发言赞成新宪法规定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两年后他成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名副主席，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7月，他出席全国人大。在会上发言时承认自己未能进行思想改造，批评了苏联，辜负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爱护。他承认错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人对他进行攻击，谴责他掠夺了农民的三千多亩土地。1958年2月，免除了他在政府中的职位，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要他继续学习，改造思想。他虽被免除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之职，但仍任常委。

龙云于1962年6月27日死在北京，遗妻顾映秋。

马占山

字，秀芳

马占山（1885—1950，11、29），1931年底任黑龙江省主席，他率领东北军于1931年11月进行嫩江之战而举世闻名。

马占山的家庭及早年情况不详，生在辽宁怀德，1907年投身奉军第二骑兵旅，升任营长，1927年调往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部。他在剿灭“小白龙”胡匪和蒙匪中一显身手，升为旅长，指挥第二骑兵师。1928年6月，张作霖遇炸，吴俊升同时身死，北伐军占领北京，马占山在黑龙江负责剿匪。1929年夏，国民政府和张学良策划在东北的反苏行动时，马占山由海兰泡回黑龙江任大黑河司令。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入东北，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当时都不在，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和张学良去北平，由他那个无能的儿子万国宾负责黑龙江事务，洮辽镇守使张海鹏遂与日本关东军约定，由日军支助军械及给予政治支持。十月初张海鹏自封为蒙古边防使并沿洮南、昂昂溪铁路进军首府齐齐哈尔，马占山进行阻击，破坏铁路桥梁，包括在嫩江上的一座。两军沿河对阵，1931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任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十天后，他在齐齐哈尔就任。

日方因投资建造洮南昂昂溪铁路而拥有路权，要求马占山尽快修复嫩江上的桥梁以便向辽宁地区运输军用物资。马占山未应允，当一些铁路员工于10月20日前来察看桥梁破坏情况时，马部当即开枪。10月28日，关东军驻齐齐哈尔代表日军少校林义秀下令必须于11月3日前修复桥梁，否则将由日军保护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修建。临近限期时，林义秀下令马占山军及张海鹏部各在原地撤退十公里，马张表示同意。11月4日晨，日军保护了一些修路人员开工，但日军一个步兵连却过桥向由中国军队据守的大兴车站进军。马占山的部队将他们击退，次日日军复来，又被击败，这就是嫩江桥战役。经过两天战斗，日方伤亡一百八十人，中国方面伤亡二百人。当时，国联正在调查日本人在东北的情

况，报上又常报道东北地区情况，因此嫩江桥之战得以闻名于世界。

林义秀下令增援，关东军遂于11月6日占领了大兴，此后经历了不断的小冲突，和日方提出要求中方加以拒绝的过程，日军终于在11月间占领了齐齐哈尔，马占山撤到海伦，聚集部队，并在该地设立省政府，不久，他被任命为黑龙江省主席。

1932年2月，马占山取得外界援助的通道全被切断。他孤立无援，缺少弹药。他后来说，当时唯一的出路是延缓敌军进攻，保存实力，以待时机。2月14日，他在哈尔滨同意与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长会谈，同意与日本方面合作。此后他参加了几次筹建满洲国的会议，3月，满洲国成立后，他出任陆军部长。为了答谢马占山的合作，日方同意他留任黑龙江省长，许其掌管省政府中的关键性部门三个月。马占山等候时机，然后于1932年4月1日在黎明前从新近充实的黑龙江财库中取出贵重财物和大笔钱钞用货车载运离开了齐齐哈尔。天明发现时，他已远至泰安镇了。他又发了三个前后矛盾的电报给日军说明离去的原因以迷惑日本人。4月12日他从大品河发出通电，说明其所以表面上背叛国民政府的理由，并报告了他对日方活动的观察所得，宣着决心抵抗日本侵略。

1932年4月29日，马占山在海伦附近进袭日军，5月18日，据称他的部队已逼近离哈尔滨几公里处，但到5月底又被关东军第十四师团击退，于是他们采取游击战术并在齐齐哈尔附近坚持到11月份。当时日军对东北各地忠于祖国的部队发动攻击取得成功。马占山等人遂逃往苏联，又经德国，于1933年6月回到上海。6月22日他任职于军事委员会，他在东北的英勇作战受到赞扬。但他因反对塘沽协定，不去南京而住在天津

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后，马占山在朱绍良第八战区任职，1937年底受命抗击包头以西进袭内蒙的日军，是年冬，他在绥远五原与日军激战，阻止住了日军的前进并保证了苏联军援物资经陆地运来中国。1941年他再次被任命为黑龙江省主席，不久，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战争结束前，曾一度任第十二战区副司令官，以后回东北任松北挺进军副司令，但国民党不许他和其他当地人在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起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占山到了北京，于1950年11月29日去世。

马超俊

字：星樵

马超俊（1885—），革命党人，孙逸仙的信徒，国内劳工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历任国民党、国民政府要职，曾前后三次出任南京市长，1949年后住在台湾。

马超俊生在广东台山的一个贫苦家庭，兄弟两人中居幼，幼年丧父，放牧砍柴以济家用，八岁时上学，几年后，他哥哥去加拿大营生寄钱回家赡养马超俊及母亲，使马超俊得以专心致志地上学读书。十五岁时中秀才，因未贿赂主考人员而于发榜时落第。马超俊对这种贿赂行为深为不满，不愿再考取功名。

1900年，马超俊在九龙码头的一个马王记机器厂当学徒，夜间他在少年学社办的夜校学习中文英文，其主要教师为太平天国史的编纂人，他向马灌输了革命思想。两年后，马学艺满师，比通常的四年期限提前两年，1902年马超俊离香港去美国。

马超俊到旧金山后在码头工作，加入了反满的革命组织致公堂，他又从兴中会会员中得知孙逸仙，1904年与孙会见。1905年夏，马超俊离开旧金山到日本投奔孙逸仙，由孙亲自介绍加入同盟会，并送他进了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

1906年末，孙逸仙派马超俊去香港组织劳工支援革命，他先在以前他做工的工厂中发现同伴，马超俊在美国的经历和在日本所受的教育，很得他们的赞赏，他们听了他宣传革命和工人自助的道理后，决定建立一个劳工团体，以此为核心在香港从事组织劳工。几个月后，他又去广州，组织工人；又去武汉组织汉阳兵工厂工人；后又去上海成功地组织了一些产业工人。然后他回到广州与石井兵工厂工人组成了一个秘密团体支持孙逸仙。马超俊在这些城市里唤醒工人（大多数是广东人）使之愿意组织起来支持革命。以后又回到香港，但仍常回广州指导工人运动。1907年12月，孙逸仙邀马超俊和一些工人到香港准备镇

南关起义，起义失败后，马回到香港举办中兴公司经销头发，实际上是革命党集会的场所。

马超俊和一些工人输送军火到广州准备1911年4月的起义，他在安排运输工作时，遇见了沈慧莲，以后与她结婚。马超俊的一些同伴参加了这次起义，其中有几人成了“七十二烈士”，中的人物，他们一起被安葬在黄花岗。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开始后，黄兴令马超俊率工人武装来武汉地区，并要他鼓动其他地区的工人支持革命。马超俊组织了七十个工人，经上海到武汉。11月10日他们到达后，黄兴指定他们进入汉阳兵工厂，11月20日，冯国璋猛烈进攻汉阳，但马超俊以及他所率领的工人武装，坚持五天以后才撤离兵工厂。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马超俊任议员。1913年袁世凯反对革命党人，他辞去议员之职。1913年夏二次革命时，广东在袁世凯的亲信龙济光统治之下，马超俊奉命去广州设立海门针织厂作为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基地。马组织了一个暗杀队，1914年6月暗杀队一个成员刺杀了龙济光的副手马有发。此举激怒了龙济光，他加紧搜索革命党人。马超俊被迫逃离广州。1914年受孙逸仙之命去日本学习航空，1916年毕业于，在山东居正手下工作。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反袁运动终止，马超俊作了几个月的飞行表演并为创办航空学校募款。

1917年广州成立军政府，孙逸仙授命马超俊拟订开展全国劳工运动的计划。他提出的八点计划得到孙逸仙同意，马即着手实施这个计划。1917年底全国机器工人联合会成立，设总部于广州，并在广州实行纪念国际劳动节。1919年广州机器工人罢工，1920年香港工人亦随之罢工，马超俊参与组织了这两次罢工。

1920年，陈炯明率粤军从福建回广东驱逐桂系军阀，马超俊率领游击队在东江地区进行活动抗击桂系的后卫部队。1921年孙科任广州市长，马超俊担任他的特别助理，翌年任广州市政府委员。1922年中，陈炯明反对孙逸仙，马超俊组织工人怠工，陈炯明下令逮捕马超俊，他不得不逃离广州。1923年4月，陈炯明被驱逐出广州，马超俊任石井兵工厂副厂长，后因保卫该厂抵制陈都有功而被提升为厂长。1922年间，该工厂曾蒙受重大损失，但马超俊使它很快恢复正常。1924年他离职去上海，向国民党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报导孙逸仙即将前往

北京。孙逸仙一行路过上海时，马即随行，陪同前去日本、天津和北京，1925年3月孙逸仙在北京去世后，马超俊回到广州。

当时，马超俊因为经常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受到他们的敌视，全国机器工会及所属组织信从和支持马超俊。因此，1925年在广州召开由共产党占优势的全国劳工大会时，马超俊对大会实行抵制。大会通过的一个决议称马超俊为“劳工运动的叛徒”。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要求将马超俊开除出党，因有邓泽如、萧佛成等人的干预而未获通过。

1926年，马超俊去美洲访问，考察工人运动并向海外国民党员报导国内政治情况，1927年回国任国民政府劳工局长，1928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农工厅厅长，12月辞职。1929年代表中国工人出席日内瓦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劳工大会，这是中国派到国外的第一个包括有资方、劳方及政府代表的代表团。回国后，被选入立法院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主任，1931年11月任南京市长，1935年任国府委员。

中日战争发生后，马超俊随同国民政府到重庆，1938—40年任国民党社会部副部长，此后任组织部副部长。1945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再任南京市长，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后，马超俊去台湾，1950年，蒋介石私人谕议。1961年任中央银行监理。

马超俊的著作有《中国劳工运动问题》，于1927年出版，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一册，又任五卷本《中国劳工运动史》主编，该书于1959年在台北出版。

马 仲 英

马仲英（1911—），回族军事领袖，1931年在新疆率领回族起事反对汉族统治，1933年他所部骑兵再次起事反对汉族当局，但为白俄部队赶往南疆，1934年7月逃入苏联境内，以后不知所终。

马仲英籍贯甘肃临夏，他与马步芳、马步青出同一曾祖。马仲英早年情况不详，1924年从军，1926年十七岁时在他叔父马廷忠部队中当一名小军官。

1926年，冯玉祥的部下刘郁芬任甘肃省长时着手征伐回族，马仲英包围并攻占了临夏，刘郁芬令马麟进剿，为马仲英所击败，乃获得了“小司令”的称号。他叔父不容他目无法纪，将他开除，马仲英乃去西宁一带，自行募兵建军。

当冯玉祥决心参加北伐战役，从西北调出军队后，甘肃军事情况即行恶化。全省既不统一，又遇水旱灾荒及回汉族之间不断扩大的纷争，马仲英趁机于1928年下半年率军回甘肃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1929年春，马仲英屡战屡胜后，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请承认他所编训的驻内蒙西陲宁夏绥远的边防军。当时，冯玉祥宣布脱离国民政府，韩复榘、马仲英及其亲戚马鸿逵则倒向国民政府一边。马鸿逵的行动加强了马仲英与国民政府联合的决心。1929年冬，刘郁芬下令处决了马仲英的父亲，促使马仲英进一步反对冯玉祥，但他想进行报复的计划却受阻于冯玉祥和山西阎锡山的联盟。马仲英然后去南京，进南京军校，并于1930年底返回原地任甘州（张掖）警备司令。不久他开始招募军队，企图使该地成为拥有实力的自治地区，国民政府西北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于是派兵进攻他的基地，迫使马仲英向西撤走。

1931年，马仲英率部向新疆的金树仁挑衅。当时，哈密回族首领沙亲王于1930年11月死去，金树仁想趁此控制这个半独立的回回地区。1931年3月，哈密回回起事并派代表去甘肃向共同的宗教信仰徒东干族求援。马仲英响应这个要求于6月率骑兵开入新疆。当年秋天，新疆的部队，其中主要的是俄国革命时逃到新疆的白俄，进行了残酷的战斗，把马仲英从哈密逐回，马仲英转向西南，他在战斗中受伤，退回甘肃西部，马步芳把甘肃西部的四个县交马仲英管辖，设总部于肃州（酒泉县）。

1933年春，马仲英重整旧部约三千人开入新疆，当时金树仁已逃离新疆由盛世才掌权，马仲英部当即控制了新疆中部的十三个县，其中包括主要的绿洲地带吐鲁番，该地掘进乌鲁木齐的通道。6月初，盛世才派出以吴霭辰为首的代表团去马仲英总部讨论举行和谈的可能性。几天后，国民政府新疆宣抚使黄慕松到达乌鲁木齐，他所作的努力只是增加了局势的严重性，马仲英和盛世才又在战场相见。9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去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但未能导致新疆地区的和平，

1933年下半年内，马仲英及其部下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加强活动，他们的掠夺抢劫激起了突厥族（缠族回）的反抗。1933年12月，马仲英发起向乌鲁木齐的进攻，1934年初的几个星期内直逼该地，然而苏军于此时开入新疆支持盛世才，一举击败马仲英所部，迫使西逃至克什喀尔。1934年7月，马仲英将残余部队交给他的妹夫马虎山指挥，自己带了几个高级官员经伊尔库斯克边境逃入苏联境内。据说同行者有驻新疆的苏联军官。马仲英出亡的情况至今不详，1934年夏，有报道说苏方将他拘留于塔什干，并拒绝新疆政府的引渡要求。1935年伦敦《皇家中亚研究会杂志》有篇文章声称马仲英“到达莫斯科后即行死去”。又传说，盛世才于1938年访问斯大林时，要求消灭他的这个敌手，马仲英乃于1939年春被处决。

有关马仲英的记载及其活动情况的报导颇多差异。瑞典探险家斯大林定，虽从未见过马本人，但在他1936年出版的著作《大马的逃亡》一书中，活灵活现地叙述了马仲英的活动及其在东疆的败亡。其他的作家把马仲英说成是一个十分英勇的人，一心想在中国西北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回族国家，同时又非常害怕外国的入侵，他的头脑经常为这两种思想所纠缠。

马 福 祥

字：云亭

马福祥（1876—1932.8.19），回族首领，1913—20年曾统治宁夏，1921—24年统治绥远特区，1924年与冯玉祥同为西北边防使，1929年脱离冯玉祥，后为国民政府效劳，担任过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马福祥出生在甘肃洮河韩家集，他所属的回族，是该地唯一没有参加1862—77年的回民起义的一支。据说左宗棠于1872年在兰州设署后，他父亲曾同左相识。马福祥在兄弟四人中居幼，早年即从军，钦佩长兄马福禄并加以仿效。1896年趁循河之乱，招募志愿人员支援正规部队。

1897年参加乡试中式，投奔董福祥甘军，在其兄马福禄的骑兵中服役，不久董福祥所部调往直隶，编为荣禄所统五支禁军之一，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

董福祥军调往南苑，旋即进入北京，与外国军队作战，袭击使馆，参与劫掠。马福祿率部在黄村、柳林、柳村作战，后在北京被杀，所率部队由马福祥接管。光绪、慈禧逃离京时，马福祥随从去西安。后任西宁、库库诺尔，巴里坤等地总兵。大约在1910年时，任巡防统领，驻扎兰州。

1911年革命时，马福祥与省内其他官员宣布甘肃中立，1912年任库库诺尔民政长，阿尔泰总兵。外蒙宣布独立时，鄂尔多斯蒙族发生骚动。1913年9月马福祥出任蒙甘总兵，驻扎银川，不久，在包头捕获达位特旗领袖王德呢玛，晋升为中将，就任银川护军使，控制了以后称为宁夏的这一地区达七年之久。1920年12月31日，北京政府任命他为绥远特区都统。他自1921年初起任职至1924年底。1924年11月，冯玉祥在北京实行兵变，马福祥调任，与冯同为西北边防督办，绥远都统由李鸣镝继任。

马福祥在1925—1927年间的活动不详，但仍在冯玉祥手下任职。1928年他担任北平，开封政治分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府委员。1929年，冯玉祥反对国民政府，马福祥遂与冯玉祥分手，并指令其子马鸿逵与韩复榘联合投向国民政府。1929年底，马福祥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青岛市长。1930年，继石友三出任安徽省主席，并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30年，扩大会议运动失败后，马福祥和张之江收集国民军余部改编为国民政府的部队，1930年中至1931年底他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又着手改组甘肃省政府。1931年12月，他成为国府委员。几个月后，他去探望在河南鸡公山休养的儿子，忽患重病，即由专车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抢救，但在1932年8月19日，在行车途中，死于河北琉璃河车站。

马叙伦

字，夷初

马叙伦（1884.4.27—）教育家，革命党人，政府官员，1916—1936年在北京大学任中国哲学教授，中日战争期间开始同情共产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教育部长，1952—1954年任高等教育部部长。

马叙伦籍贯浙江杭州，出生在一个破落的读书人家，从当地的教师学习古典礼籍，父亲去世后，无力继续，从塾师受业，1899年进杭州养正书塾（即浙江第一高等学校的前身），从浙江名学者夏曾佑受业，奠定了对中国哲学和语言学的深厚基础。当时，他与同学汤尔和、蒋方震、许寿裳一起从事革命活动。1902年毕业前夕，马、汤、人获得去日本留学的名额，但因省当局发现他们倾向革命而被取消。

马叙伦曾在上海为一些革命党刊物撰写文章，不久回浙江当教师。1906年，他的老师带他去广州在一所语文学学校教书，马叙伦在广州遇见了朱执信等同盟会领袖，1909年回原籍，就任浙江咨议局长，马在杭州师范学堂教书，参加了当地的革命活动，他与夏曾佑发起召开一个沪杭甬铁路股东大会，反对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将该铁路国有化的计划。1910年，他参加了柳亚子创立的诗人组织“南社”。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他与沈钧儒、蔡元培在浙江发动起义，革命党人控制了浙江后，汤寿潜任都督，马任秘书，不久离职，在上海短期担任《大共和报》主笔，以后重新执教。

1913年，汤尔和创办北京医校，请马叙伦去教中文，袁世凯专制活动日益明显，马叙伦回浙江从事反袁活动，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又重新教书。当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叙伦不久去该校教授哲学，主要讲庄子和程朱理学，他学识渊博讲课生动很受学生欢迎，但却不为他的一些同事所喜爱。他常与章炳麟的门生黄侃以及胡适发生冲突。由于他与胡适有分歧，使他成了白话文运动的强烈反对者。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马叙伦表现了他的活动能力，当时他担任北大中学校教职员工会联合会秘书，领导教师罢教支持学生运动。北京当局逮捕学生领袖后，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由蒋梦麟代理，有人建议将学校迁到上海，马叙伦遂召开教职员和学生，开会反对此举，说明迁校将使北京大学沦为二等学府。1919年9月，蔡元培重任校长，学校进行了改组，校政置于教职员管理之下，马叙伦因参加了五四游行，处境危险，遂于1921年初回到浙江，任浙江师范学校校长，1922年任浙江省教育厅长。

1922年9月，马叙伦回北京在王宠惠内阁任教育部次长，11月内阁倒台，

马又回北京大学教书，1924年又任教育部次长，1925年任代教育总长，不久辞职又回校教书。其辞职的原因是当时他已当了国民党北京党部宣传部长，因此不能安然地在北京政府内任职。1926年有关大沽被围的三一八事件发生后，段祺瑞指责国民党组织了这次游行，马叙伦乃离北京去南方。

1927年初，北伐军攻占浙江，张人杰成为浙江省主席，马叙伦任民政厅厅长，1928年底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因与部长蒋梦麟发生冲突而于1929年底辞职。1931年1月，又回北京大学，同年年底，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马不得不在他手下工作。日本加紧侵略华北，马叙伦参加游行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此期间，马叙伦与其同事，特别是与胡适的关系更为不和。1936年，他请假一学期，学校却给他一年假期，他由此了解到学校当局不愿再聘请他。

1936年马叙伦迁居上海，中日战争期间他留在上海，这是他一生中处境困难的时期。他的老朋友汤尔和投身华北日伪政府当了文化部长，邀请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马拒不接受，并断绝了与汤的友谊。1940年，他从前的学生陈公博参加南京汪精卫政府，马叙伦拒绝与他见面，也不接受他给的金钱。1944年2月他最终同意与陈公博会见，意图劝说他与日本人断绝关系。马叙伦的这些高尚品德促使他从前的同事对他怀有敬意，有些人打算为他筹措研究基金。1945年战争结束后，不少政府领导人拜访了他向他表示赞赏和安慰之意，但却无人给予实际资助。在战争期间，他增长了对国民党的不满，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之举，使他对统治中国的政党的不满更为增强。他不久成为一名公开反对国民党的人士。

1945年底，马叙伦参与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他担任了国际保障人权同盟中国委员会的秘书。1946年6月23日，他率领了一批代表由上海到南京要求停止内战。到达目的地时，马叙伦等人为一群“农民代表”所阻，他们先是故意刁难，然后大打出手，马叙伦被严重殴打卧病一月余。1947年国民政府禁止各种民主党派和社团后，马叙伦作为这些社团的著名领袖之一，逃往香港。1949年初他经东北解放区到了北平，并担任了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常委，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促进会高级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马叙伦任教育部长，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1952年教育部分为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马叙伦任高等教育部部长至1954年。1954年，1959年、1964年他都作为人大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是民主同盟副主席，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1960年以后因年老多病，不得不放弃大部分活动，但仍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之职。

马叙伦以有关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而知名，1924年著有《老子校话》，1930年著有《庄子义证》、1931年著有《谈吕氏春秋记》。他还发表了语言学方面的著作。他也研究西周石鼓——作了笺释。于1935年出版《石鼓文疏记》。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对许慎《说文解字》所作的研究，1957年出版了他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一书。1958年出版了《马叙伦学术论文集》。

马 鸿 逵

字：少云

马鸿逵（1893—），马福祥之子，1933—1948年任宁夏省主席。

马鸿逵，籍贯甘肃洮河县韩家集，幼受军事教育，1910年毕业于兰州甘肃军校后，在他父亲的部队中任营长，参加了平定“白狼”之役，1915年升任甘陕蒙边剿匪司令。1922—24年任马福祥部第五混成旅长。

1925年，马鸿逵投身冯玉祥部队任绥远西部剿匪司令，其所率第五混成旅改编为冯部第七师，先后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第二集团军暂编十七师，他参加了1926—28年冯玉祥进行的历次战役，1928年6月北京被占，北伐结束，马鸿逵部队由韩复榘统率，负责鲁西剿匪事宜。

1929年5月，冯玉祥反对蒋介石，马鸿逵、韩复榘、石友三倒戈率部数千人投奔国民政府，马鸿逵由此被任命为第六十四师师长，第十一军军长，回击冯玉祥、阎锡山，并兼任河南省政府委员。1930年第十一军改编为第十五路军，1931年继其从兄马鸿宾任甘肃省主席，但未就任。他此后的经历有与其父相似之处，1932年任蒙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宁夏省主席。

宁夏省政府能控制的地区仅有十三个县，但地处绥远入甘肃的要道，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余地区则由阿拉普旗、额齐格旗蒙古族所控制，马鸿逵统治宁夏的办法是：将剿匪的责任分别委派各支部队，整理户籍发行身份证，施行保甲制，以保持社会治安，建立居民保安组织，他所管辖的宁夏地区不久成为一个严密控制的地区。

1934年初，前国民军军官孙殿英由绥远进袭宁夏，与马鸿逵部发生冲突，南京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战，亦被置于不顾。2月，国民政府下令调绥远，山西、青海军队一起攻打孙殿英，3月，孙宣布下台，其部队解除武装，实行改编。去除了这一威胁后，马鸿逵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和社会建设，他还实行青年应征服役十年以上的制度，企图以此加强部队。但这种办法，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因年老农民缺乏青年子弟的帮助力难以单独耕植，然而，马鸿逵通过减轻田赋，扩大灌溉设施，推广植树造林，部分地解决了农业劳力不足的问题。他在小范围内施行的这些方案，与马步芳以后在青海所做的有类似之处。1935年，马鸿逵的成绩为国民党所赞赏，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西北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1938—1945年，马鸿逵除任宁夏省主席外，又任第八战区副司令，司令为朱绍良，马鸿逵所部改编为第十七集团军，当时，设在安远营的阿拉鲁旗政府与宁夏政府之间关系紧张。马鸿逵与阿拉鲁旗首领达王因系世交在1938年前关系良好，但自达王成立了日伪内蒙政府以后，关东军土肥原又访问过达王，马鸿逵深恐阿拉鲁旗依此例成立伪政府，因此，派兵到定远营，占领该地并拘捕了达王，监禁在兰州，一直到1944年。其间并未发现他企图与日本勾结的证据。当时马一直以“防匪患”为名派了一营兵力驻宁夏定远营。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马鸿逵任西北行营副主任，1948年国共内战达于高潮，马鸿逵由宁夏调任甘肃省主席，1949年继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马步芳则改任兰州西北行营主任。两马曾飞往广州与李宗仁商谈守卫甘、青事宜，回西北后不久，马步芳去了香港，9月中旬，西北地区已为中国共产党控制，马鸿逵去美国，在南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以办畜牧场饲马为业。

马 鸿 宾

字：子寅

马鸿宾（1883—1960.10.21），回族将军，1930—31年任代理甘肃省主席，1948—49年任宁夏省主席，1949年9月起义投向中国共产党，尔后在新政府中任职。

马鸿宾，甘肃临夏人，马福祥的长兄马福祿的儿子。他早年的经历不详，自幼即从军，大约在1904年在西宁任骑兵连长，拓荒开垦委员，矿务委员，1911年任甘肃西路巡防骑兵营长。民国成立后，外蒙宣布独立，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蒙族表现不稳，马鸿宾率部进驻内蒙的五原，临河，实施改革，从而安定了蒙族人士。1914年任骑兵七营统领负责守卫河套，他在该地区取得正式官方身份，此后一直在该地区剿匪，1919年消灭了冒充满清大阿哥伪皇帝的达尔留吉，1920年冬，升为陆军中将，任镇守使。

1926年，马鸿宾任陕甘剿匪司令，1927年归从冯玉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二十二师师长。1929年10月，冯玉祥反蒋之役失败，马鸿宾投向国民政府而被任命为宁夏省主席，第七师师长。1930年冯阎扩大会议失败，马鸿宾任甘肃省政府委员，代理甘肃省主席。1931年8月，师长马文车、雷中田在兰州兵变，拘禁马鸿宾。9月，马文车被捕，马鸿宾获释，辞去甘肃省主席之职。其从弟马鸿逵受令继任，但拒不就任。其后邵力子任甘肃省主席，马鸿宾任甘凉边防司令，驻肃州，1933年防卫宁夏，平定孙殿英的叛乱。1934年任第三十五师师长，负责陇东剿匪事宜。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马鸿宾任第八十一军军长，第十七集团军副司令，同年冬，兼任绥西守备司令，率部北上抗击日军，固守固阳安北一带地区达一年多。1940年任伊克昭盟警备司令，并负责包头、萨拉齐一带的军事活动，他在上鄂尔多斯地区袭击日军数月并收复了黄河南岸部分地区，国民政府因此授以勋章，但自1941年春他的部队调往甘宁边界地带后，他并未得到新的任命。在以后的战争年月里，他的职务只不过是国民党的一名中央监察委员。

1948年，国共内战接近尾声，马鸿逵调任甘肃省主席，马鸿宾继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1949年9月中旬，他起义投向中国共产党，由此瓦解了马鸿逵、马步芳防守西北的计划。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马鸿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副主席，1953年任改组后的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是全国人大的甘肃代表，当选为民族事务委员，同年被选入国防委员会，并继续当选为甘肃省副省长，1960年10月21日死在兰州，年七十七岁。

马 良

字：相伯

马良（1840.4.7—1939.11.4），耶稣会司铎；政府官员，教育家，震旦学院、复旦公学、辅仁学社创办人，震旦、辅仁后改为大学。

马良生在江苏丹阳，他的家庭自十七世纪以来就信奉天主教，马良是马松严（死于1872年）的次子，马松岩精通中医。马良五岁时就习读圣经、基督教教义及中国古文典籍，1851年十一岁时进在上海新创立的依纳爵公学（即徐汇公学），兼学拉丁文、法文，七年后，又学天主教神学，1862年入耶稣会，1864年初学期满，1870年三十岁时祝圣为司铎。

1871年，马良由耶稣会派往南京传道，但他不喜欢这项工作，1872年回上海，任徐汇公学校长，当时，他对西方科学感兴趣，1874年开始翻译西方数学教科书，取名为《度数大全》，两年后译竟，但上司未允出版，也不准他出资作教会救济工作。这两件事情使他深为不满，他遂于1876年放弃司铎职还俗。

马良由于兄长马建勋的关系，为山东臬司余紫垣办理西洋科技文案，1877年调任山东濰口机器局差事，一年后辞职。他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派去山东调查矿务。1880年为刘铭传作奏本请办清江浦至北京的铁路防止俄人入侵。

1882年初黎庶昌出使日本，马良作为参赞随行。他在东京会见了伊藤等政界领袖人物，并学日文，不久调为神户领事，辞不就职，回国入李鸿章幕府。

当时，马良之弟马建忠奉令协助朝鲜政府改革行政，编练新军，但李鸿章要马建忠留在国内，乃派马良去朝鲜。1882年7月23日，朝鲜大院君政变，吴长庆、马建忠、丁汝昌率水师前往平乱，当时袁世凯也在吴长庆幕府，年仅十八岁。1883年回北京前，马良推荐袁世凯为驻朝鲜商务委员。

马良回国后，辞去官职，致力于研究西方科学，1884年李鸿章任马建忠为招商局总办，并命马良为稽查，去南方考察招商局业务。他当时又是招商局的商务委员。

1885年10月，清政府设台湾总督，刘铭传任此职，刘聘马良为顾问，马不久去了台湾。1886年马良建议借外债开发台湾，但为清廷所拒。不久他回到天津，仍入李鸿章幕府，奉派去美国为清廷借款。马良虽以李鸿章代表身份在美国受到热烈欢迎，商得借款，但清廷又拒不支持。马良离美去欧，访问了伦敦巴黎，并在罗马由教皇利奥十三世接见，1887年回国。

1887—1896年间马良的活动不详，他大部份时间致力于研究科学，约在1887年后他结婚并得了两个孩子，1893年他的妻子去世，次年，他的母亲又去世。据说他母亲临死前曾说过：“吾子应为司铎，尔非司铎，故非吾子”。1896年马又皈依天主教，把孩子们送进天主教学堂，嘱咐他们以后称他为“叔叔”。

1896年马良和《时务报》主编梁启超合作，经马良建议，梁启超从马建忠学拉丁文。此时，马氏兄弟正在合写一本论述汉语语法和句子结构的书籍《马氏文通》，该书于1904年出版。梁启超之成名与马氏兄弟的推举有关，他们介绍他与外事专家，改良派如严复，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结识，1898年百日维新时，梁启超提议由马良主持在上海创办“译学馆”。维新运动很快失败，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1901年马良去徐家汇天文馆，教少数学生学拉丁文并翻译圣经。不久把这个非正式的学校变成一个正规的高等学府。1903年，大部分经费由马良私人捐献，正式创办了震旦学院（后改为大学），马自任校长，校内实行学生选举职员，进行自治的办法。其课程着重中西文学和科学。1905年马良请了一些耶稣会教士来校教书，后因外国教士对学院干预太多，马辞去校长之职。其后，他

与严复在吴淞创办复旦公学，自任校长。

1906年，马良应两江总督之请为其部属讲解“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他本人则赞成民主。同年秋，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梁启超在日本成立政闻社，促进国内的立宪运动。梁原拟请康有为为社长，但康既失宠于清廷，乃以马良为社长，马遂去日本。他在东京、横滨、箱根、京都等地受到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不久前这些学生曾掀起学潮反对清廷官吏的压迫，马良到处演讲对学潮起了平息的作用。1908年3月，政闻社迁往上海，继续由马任社长，当时，政闻社曾与清廷重要官吏秘密来往，准备创办学校训练立宪政府中的人员，引起了袁世凯的反对，结果，几个同情政闻社的官员被免职，1908年8月13日清廷下令查封政闻社，马良乃又重新执教，但仍继续担任梁启超在上海的代表。

1910年，马良再任复旦公学校长后，当选为北京资政院议员，1911年加入宪友会。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复旦公学迁往无锡，不久又迁回吴淞。1912年民国成立，马于南京任职。1912年10月到11月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同年，他呈文教皇庇护十世，请求在北京创办天主教大学，1913年，他们二人亦办了辅仁学社。

1913—1916年，马良致力于阻止袁世凯称帝，他劝说袁世凯，结果其居室为袁世凯密探所包围。1916年在袁世凯称帝之前，马良乔装为菜贩，逃离北京，6月，袁世凯死后，回北京，10月出版小册子《宪法的目标》，强调法治对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的重要，并提倡主权在民的思想。与此同时，马良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与宗教活动。1916年他发起在北京召开天主教徒联合大会，反对以孔子儒教为国教，并出版《新史合编直讲》，这是一本载有四福音书译文和评论的书。1919年发表了与《宪法的目标》类似的《国民照心镜》一文，此文分析军阀问题，并主张在全国民选的民主政府下实行地方自治。

1922年，江苏省长韩国钧辞职，马良去南京，担任江苏财政核算委员会会长，该会是调查韩的财政而设立的。孙传芳攻占南京，马良回到上海。《申报》五十周年时，马良为该报撰写《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一文，认为科学与宗教并非相互排斥。1925年，请马良担任新建立的辅仁大学校长，马未接受，但允协理校务。次年，上海天主教徒创办《天民报》，聘马良为主笔。

从1927年起到他逝世时，马良不问时事，致力学术研究，宗教活动及爱国的写作活动。1927年他和司铎徐元希合译《灵心小史》，同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这是马良在1913—14年曾提出的建议。1931年9月沈阳事变后，马良十分关心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及其后果，1931—32年他多次撰文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动，并作广播讲话呼吁国人奋起救国。这些短文章收集在1933年出版的《马相伯先生国难论文集》中。1934年，明代天主教徒徐光启逝世三百年，马良为《国学》杂志撰《徐文定公与中国科学》一文。1936年丹阳乡友创建相伯图书馆，马良捐赠中西文图书八千七百种。同年冬，于斌主教请马良去南京，1937年3月，任马良为国民政府委员。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马良迁居桂林风洞山，1939年1月，他已达百岁高龄，自3月至4月间，全国不少地区为其举行祝寿典礼，后应其前学生于右任之请前去昆明，途中患病，1939年11月4日死在越南凉山，遗有女马宗文。

马良的著作有两种集子：《马相伯先生文集》、《马相伯先生文集续编》先后在1947年，1948年于北平出版。

马步青

字：子云

马步青（1898—），回族将军，马步芳的长兄。

马步青，马步芳的长兄，生在甘肃临夏，他初受旧式教育，后来进了甘肃省立第一中学，约于1916年从军任宁夏巡防马队第一营管带，不久升为宁夏的全部骑兵步兵的指挥官，1922年任绥远第四路警备司令，1923年升为少将，任第五混成旅骑兵团长，不久任宁海暂编骑兵旅长，负责在甘肃廓克诺尔剿匪平乱。

1928年，马步青投奔国民革命军，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二十六师七十七旅旅长，翌年，冯玉祥任其为二十二师六十五旅旅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马步青参加了1929—30年冯玉祥反南京的战争。1931年改编冯玉祥的部队时，他并未被免职，反而被提升为二十六师中将师长，1932年回甘肃任甘肃第一骑兵师师长，后改编为骑兵新第二师，驻河西负责剿匪绥靖事宜。

1936年，马步青任第五骑兵师师长，驻宁河西防止共产党军队于是年底进入该区，除军事外，他还在当地从事植树造林和发展教育事业，据说1937年他还在那里查禁鸦片，禁止生产酒类。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其部队改编为骑兵第五军，同年任甘新公路督办，将驼运商路改为沥青公路以便运送苏联运来的军用物资，这项工程三年内完成。1942年任柴达木屯垦要职，他的弟弟马步芳任青海省主席，两人密切合作。1943年在其弟马步芳手下任第四十集团军副司令，同时又是蒙藏事务委员会委员。

战后，马步青的时运不济，他的骑兵第五军于1945年调往新疆平叛回之乱，到新疆后即行改编，马步青的军长之职亦被解除。次年，第四十集团军番号撤销，马不再有军职。1949年，马步青随同国民党人去台湾，任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顾问。

马步芳

字：子香

马步芳（1903—）回族将军，1938—49年任青海省主席，后任台湾国民政府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1年辞职。

马步芳生在甘肃临夏，是马步青的弟弟，1929—31年任青海省主席马骥的儿子，马骥死后由其弟马麟任青海省主席。马步芳起初接受当阿訇的教育，后决定从军，他在宁海军官训练团毕业后，1920年入宁海军当副营长，1930年底，在顾祝同部队当暂编第一师师长（后改为第九师），以后又当了西北绥靖主任，顾任命他为青海南部警备司令，命令他进攻准备以甘肃为基地谋求独立的马仲英、马步芳，击溃了他的部队，把马仲英赶往西边，回玉树当警备司令。

1932年初，马步芳和刘文辉合作准备解决1930年在甘孜发生的大清寺汉族士兵同藏族喇嘛发生冲突事件。他们收复了甘孜、瞻化，是年7月，所部到达金沙江。1932年10月，刘文辉与藏族签订协定，马步芳签订了青海西藏和平条款，1933年7月提交国民政府批准。

1931—38年青海省主席名义上是马麟，实际上由马步芳代行。他兼任八十

二师师长，1938年马骥当上了国府委员，马步芳被正式任命为青海省主席。此时，中日战争已爆发，八十二师改编为八十二军。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西北的战略地位更见重要，马步芳为加强其在青海统治，防阻日军在西北回族中进行挑拨，采取“六项重要措施”：编组保甲、训练壮丁、厉行禁烟、推行识字，修筑公路、营造树林。

马步芳的行政效率当时在国内居于前列，他在省内推行西医，兴修水利、创设工厂生产陶瓷、化学用品及火柴等，省政府还下令，省内每个人不管是官吏、喇嘛还是学生，每年必须种几棵树，以实现造林计划。西宁的居民必须定期消灭一定数量的苍蝇，以完成马步芳的卫生计划。他还特别注意教育，年令在十五岁至二十多之间的居民必须参加专门的文化班、认识一千个汉字，因此到1942年时，约有十多万人已具有阅读能力。省当局在全省设立了小学、中学，全体学生免费供应制服、书籍、文具，马步芳还给名为昆仑学校的私立学校以有力的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持，这类学校是为了向回族学生进行综合性教育而开办的。马步芳的统治虽然是高度专制的，但不失为一种开明的专政。此外，这些改革和发展计划的经费来源主要得之于省府专营的工商业，因此并未加重人民的税收负担。

1943年，马步芳任第四十集团军令司，马步青为副令司，两年后，他就任西北行营副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几个月，第四十集团军撤销，马步芳任驻兰州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1949年，张治中投向中国共产党，马步芳继任西北行营主任，7月，他去广州与李宗仁及国民党委员商谈后，回青海携带家财迁居香港，不久中国共产党攻克西宁、兰州。

五十年代初期，马步芳去埃及，一直到1957年埃及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止，以后任国民党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1年5月，台湾国民政府宣布他被控有贪污行为，办事无能，外交部准其辞职。但此后马步芳仍居留在中东。

马 寅 初

原名：马元善

马寅初(1882—)，受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专长实用经济学，长期批评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后在中央人民政府任职，1951—6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因其经济观点具有政治上的异端倾向而去职。

马寅初，浙江嵊县人，是一个富裕的绍兴酒坊主的儿子，幼年在嵊县初受旧式教育后到上海进了一所教会中学，后又进天津北洋大学学冶金学，1907年毕业后去美国在耶鲁大学主修经济学，1910年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再进哥伦比亚大学作研究工作，专攻实用经济学，1914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纽约城的财政》于同年发表。

1915年马寅初回国，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不久，应张嘉璈之请进中国银行研究部，进而任纸币发行部主任，1920年，马寅初向北京大学请假一年考察上海工商业，他与上海的工商业家建立了密切联系，因而能对中国的这个经济中心的实际状况有更多了解。他是一个实用经济学家，尤其注意货币银行等问题，因而认为深入了解上海的情况是在中国运用西方经济原理和方法的先决条件。1920年，他又帮助郭秉文创办了上海商学院，并同意担任中国商业银行顾问。

1921年，马寅初回北大重新执教，1923年创立新经济学会，任主席。1923年、1925年、1926年、1928年，出版了他的演讲集，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劳动价值论过于简单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管它对西方社会多么适用，但在中国却行不通，因为中国缺乏集中的资本、高度的生产力，阶级差别不明显，又缺乏联合一致的城市无产阶级，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缺乏资本。他同意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对弱小的工业应加以保护的观点。这些观点，他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关税问题》和1935年发表的《中国经济改造》中重新加以阐述。后一本书，广泛探讨了斯藩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适合中国，而应采取某些德、奥学者所主张的世界主义。

1927年，年马寅初离北大回浙江，在浙江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又任浙江省政府委员，次年进交通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兼研究部主任，又任上海商学院教授，以后兼院长。1929年他出版《中华银行论》一书，此时，他又任立法委员并担

任此职一直到1947年。他在任内起草了银行法，经常应陆军大学邀请去作经济学的讲演。三十年代中，中日关系恶化，蒋介石两次在庐山召开会议，商讨中日开战应采取的紧急措施。马寅初两次均与会。第二次会议期间，中日战争于1937年7月爆发。

1938—40年，马寅初任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商学院院长。1938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军事学校着手编写一系列教科书，马寅初负责编写一本经济学通论。他越来越感觉到一些政府机关的腐化无能，1939年他开始抨击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声称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官僚资本主义”正在破坏国家的经济。他在重庆大学，国民参政会讲演时提出了这些批评，又在《中山月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等杂志上发表这类文章。他对国民政府对他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在1940年末被拘禁在贵州息烽达二年之久，他虽于1942年获释并准予回到重庆，但被禁止在任何国立大学教书，不准作公开讲演，不准发表除专门谈论经济理论以外的文章。

战争结束后，马寅初回到浙江，1947年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并任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教师。1948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他并作演讲指出发行金圆券必将使中国经济崩溃。同年末，他在杭州、上海参加了学生的示威游行，以后他去香港得免于被捕。

1949年初，马寅初应周恩来之请去东北解放区，4月出席布拉格世界和平大会，回国后在北京参加创立新经济学会，9月，以无党派人士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马寅初任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和平理事会副主席。1950年2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1950—51年又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银行官方代表的理事。

1951年夏，马寅初离浙江大学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公布他的个人十年计划，准备以四年时间学习俄文，以六年时间从事著作，希望能由此深入理解共产主义，并使自己的思想“共产主义化”。但是他并没有因这个打算而耽误公务。1952年他就任国际经济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对外贸易促进会副主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政协全国委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全国人

大常务委员，中国银行常务理事，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五十年代初期，他常去欧洲访问，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1950—54年间，先后到过华沙、维也纳、柏林、索非亚、斯德哥尔摩等城市。

按照马寅初个人的计划，1955年是其开始著作的一年。4月，他写成《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但此文于1957年才发表，因为有人认为该文是为资本家作了辩护，他的《新人口论》准备在1955年7月递交全国人大，但被批评为不过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扩充后，他把它撤回了，并对此文作了修正，在1957年7月3日递交全国人大，他认为人口过多将影响资本的积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需要控制人口，并建议经常统计人口增长率。他用很大力气以“团团转”和“螺旋形上升”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经济实行综合平衡的必要性。1956年12月，1957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在1958年出版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中，载有上述两篇文章以及有关人口问题和私人企业问题的文章，又加进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论文。他认为依据辩证唯物论，世上一切事物都有内在联系，因此一切事物都在圆圈的运动中互相联系在一起。他作图说明，他的理论是，代表各种经济成分的一系列相互联结的“环子”构成一个不断运动的圆圈，任何两个“环子”之间都存在着一个正确的数量比例，这些比例必须合理分配于所有各个环子，才能使各个经济成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又认为按照辩证唯物论，这种圆圈运动是螺旋形不断上升的运动。

1958年4月到1959年10月间，在中国国内发表了两百多篇论文批评马寅初的理论，马寅初多次写文章进行批驳，1959年11月在《新建设》上他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他在文中说，有些朋友如周恩来曾劝他收回他的意见以免影响他的政治地位，他不能接受他们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纯系学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他说：“写文章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但也要坚持真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即使对自己不利，甚至会危及自己的生命。现在我并不给学生讲课，和他们也没有直接接触，但我希望以我自己的行为来教育他们。”《新建设》在1959年12月号 and 1960年1月号上，继续发表对马寅初进行

批评的文章。1960年4月，他被免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但他 在1959年仍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1964年再次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 王时风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作者=

页数=

SS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